

特區政府一手催生的暴力漩渦
六四燭光晚會 民眾熱烈參與
落實最低工資，續爭保障勞工權益



立即無條件釋放艾未未和維權異議人士

日本核災難對中國的警示

非洲革命特輯

歐內斯特·曼德爾全傳

印尼：記住大屠殺

特區政府一手催生的暴力漩渦

仲明

特區政府的施政每況愈下的趨勢，在曾蔭權政府進入換班在望之際，竟然更趨亂哄哄。令人不禁想起，這位自稱政治家的特首，領導著一個以行政為主導的政府，竟然推行一些導致天怒人怨的措施，令社會人士大力反對，招來不同程度的衝擊。當中，以八、九十後的行動較為矚目，因為他們毫不理會有關當局，特別是警方的警告。

特區政府採用跡近高高在上、霸道、任意妄為的施政態度，不難激起市民的憤慨，特別是年青一輩的社會運動參與者。

就拿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五月十八日出席兩個電台節目的講話為例，不單表現其一貫的傲慢，更甚的是，他表現了對普羅大眾市民的權利視如無物。

政府在五月十七日宣布就立法會議員辭職或因其他情況而出缺的議席提出建議替補安排。「地方選區及新設的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議席如在任期中出缺，會按上一次換屆選舉的選舉結果定出人選以作替補，人選為在上一次換屆選舉，獲最大餘數得票的候選人名單的首名未當選候選人。這些選區或界別均採用比例代表制的名單投票制。這建議的替補機制符合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亦能反映選民在上一次換屆選舉中所表達的整體意願。」（政制及內地事務局2011年5月17日新聞公報）

翌日，林瑞麟在一個電台節目，講解新安排將會在二〇一二年實施。稍後會將修訂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有關建議不會作公眾諮詢，因為去年五月的立法會補選，投票率只有17%，比區議會一些補選更低，清楚顯示市民期望選出的議員完成四年任期，不應中途無故辭職，政府有責任堵塞法例漏洞。

林瑞麟又重申，由取得最大餘額票數的候選人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人，而非由同一名單候選人替補，較能代表民意，亦堵塞漏洞，以防有知名度的政治人物當選後辭職，傳位給新人云云。

就立法會議員辭職或因其他情況而出缺的議席提出建議，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單方面宣佈的。作為一個特區政府的行政部門，竟然可以頒令事關選舉制度的改變，而又同時說：「不會作公眾諮詢」，直接交到立法會審議。這是甚麼貨色的管治方式！

市民被諮詢的權利也剝奪

市民大眾連被諮詢的權利都被林瑞麟及其一伙剝奪了！

這種就正是最赤裸裸的暴力！是特區政府施加於全體市民的暴力！

特區政府這種關起門來制訂政策，然後再到立法會，藉著立法會內分組點票等手段作橡皮圖章式通過法案，早已激起反對的聲音。早年有廿三條立法；近則有高鐵撥款、財政預算案的六千元派糖方案等。那種行政強權主導的行事模式，何其醜陋。但正正由於這個畸形的政治制度源於不民主的基本法，致使一眾大小特區政府的官員可以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視人民如草芥。

「暴力的漩渦」

這個局面令筆者不期然再次想起在七十年代讀過的一本書。

那是一本寫於越戰年代，由一位巴西籍大主教兼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於一九七一年提出的，名為「暴力的漩渦」。

這本書因應當時世界不同地域的不平衡發展、東西方集團的冷戰和各個國內的不同程度的不公義狀況，指出了一個威脅人類的景況：在世上任何一處地方，不公義的情況就是一種暴力的

形式。這就是任何社會形態都會存在的基本暴力。

沒有人生而為奴，亦沒有人願意處於不公義、被人屈辱、被人規限的情況下。若一個人被局限在一個次等的狀態下，其實他的生存狀況就如一頭動物。事實上，社會上正正有這樣那樣的特權社群，把另一些人趕進這樣一種下等人、甚至更差的生存狀況中，令他們處於不公義、屈辱、被設限，沒有前景、沒有希望的生活中。

這種在建制中存在的暴力，是社會上存在的最根本的暴力形式。

這種最根本的暴力，必然會引致跟隨之而來的反抗。它可以來自被壓迫者本身的反抗，亦可以是社會上的年青人看不過眼，誓要為建設一個更公正、更合乎人性的社會而反擊。

這種來自反抗的暴力，在世上任何一個社會，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因為被壓迫者不斷地瞪眼看清這個社會的真面貌。

同一時間，社會上的執政者、特權階級感到極度震驚，視這些反抗者為激進分子、煽動者、破壞者等等。執政者和特權階級，通常都會針對這些「激進分子、煽動者、破壞者」，他們欺人自欺地認為，只要這些人不搞事的話，被壓迫者就不會知道社會上有不公義的狀況，他們就會乖地繼續做其順民。

時至今天，在資訊發達的社會，根本難以想像這種愚民政策還可以立足於世上。

當被壓迫者和年青人起來反抗在社會上存在的根本暴力的時候，統治者就認為，他們不得不維持社會秩序而出動形形色色的武力鎮壓。他們會奉社會安寧、果斷制止破壞秩序之名而行事，誓要把這些激進分子、煽動者、破壞者繩之以法。

當然，這只是「暴力的漩渦」的開始。

這是一個不公義的社會

對比當下的香港，上引的論述幾乎完全在香港可以引証。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這是一個不公義的社會。立法會通過的2012年政改方案，仍然是由小圈子選舉選出特首和功能組別議席，使既得利益者、特權階級可以繼續延續、維護各大小集團和個人的利益。這種源自基本法的政治制度，早就應該扔到歷史的垃圾堆，但偏偏卻讓它扼殺了好幾代人的民主追求，使人們愈加懷疑十年後是否有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

這是一個不公義的社會。過去，由港英年代的三高政策開始，已令市民一直對樓價大幅飆升表現不滿。特區政府為了應對金融風暴的危機，救市不救人，不單停止賣地、停建停售居屋等等，它更不正視樓宇供應被大地產商操控的情況。特區政府不單對樓宇供應量、樓價大幅飆升等情況束手無策，近年，大量資金流入本港炒樓，直接間接促成樓價和租金大幅攀升，各行各業和升斗市民均大受影響。地產集團更將壟斷勢力伸延至零售、能源、運輸、物流等行業，令全港市民的生活所需幾乎全面落入地產集團的掌控中。

這是一個不公義的社會。特區政府推行的種種社會建設，如貧窮人口、安老、住屋、教育、醫療、交通、文化等等民間的訴求，均擺出一副夕陽政府的嘴臉。當年青一輩的八十後、九十後指責這一切一切都是向有產者傾斜、令弱勢社群更無助的時候，特區的高官可以厚顏無恥地維護大地產商，叫人學學做李嘉誠云云。至近日，更爆出資訊科技部門的官員，收到長官指示的「政治任務」，要明益建制派有關社團的疑案。

在在顯示，這個特區政府已經由充斥親疏有別的霸道，發展至全面忘掉大眾對公義、關懷的社會的追求。換句話說，特區政府愈是傾向有產者、愈是融入中共官僚體制之內，它就愈是站在人民的對立面、與人民為敵矣。

還我二零一二年雙普選！

為全面普選而奮鬥！

權力歸於人民！

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六四燭光晚會，民眾熱烈參與！

振言

港人悼念六四廿二週年的燭光晚會，又像前兩年的晚會一樣，坐滿了維園六個大足球場和旁邊的草地，人數超過了十五萬人，再一次表現出民眾悼念六四死難同胞、要求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的堅定意志，有如無數由於各種原因，不能出席晚會的市民一樣。

今年的悼念晚會，第一次缺少了一直領導支聯會和六四晚會的司徒華叔，他因年邁患病而不幸剛剛逝世，不少戰友知交懷著多一重的悼念而來參加晚會。

由於香港和澳門是中國大陸國境內能夠公開舉行悼念六四集會和大遊行的地方，因而吸引了許多同胞，包括遠道特地來香港的青年、學者等，藉著自由行等機會前來參加，感受到自由民主的氣氛，親嘗到這種氣氛的可貴，從而加強了要在大陸也能爭取的意識和信念，並把這些體會帶回國內，傳給其他人，這是非常廣泛難得的途徑，把香港的自由和有限度民主的實例在國內傳播開去。

他（她）們中的許多人，更可能把香港和台灣等地同胞所享有的自由和有限度民主與國內的一黨官僚專政下人民沒有言論、集會、遊行等自由作一比較；同時與近幾年許多異議人士（如劉曉波、黃琦等）和維權律師（如趙連海等）以至藝術家（如艾未未等），祇因發表不同政見或為毒奶寶寶們爭取合理賠償便慘遭監禁，從而具體了解到國內現行政治制度之必須徹底改革，並把這種體會告訴國內的友好。

在晚會上到處可見的還有無數的80後、90後年青一代，他（她）們積極踴躍地參加，有些代表更站在晚會講台上，具體顯示出薪火相傳、後繼有人的願景正逐步實現！

但令人遺憾的是，大量市民在東面正要入場時，橫遭警員阻撓，意圖減少入場人數，暫時關

閉兩個大入口，着令他們不必要地繞過長長的路，走經只容3人並排且上下梯級前往會場的黑暗小徑，致使參加者要排長龍多等近一小時，許多人憤而放棄入場的意念，導致不少人不能參加晚會。這也顯示出警權過大膨脹的惡果，而支聯會指警方關閉大入口是違反事前協議的。

在每次大型集會或大型遊行之後，幾乎都有「餘波」盪漾，那就是緊接到政府總部抗議示威，特別是到西環中聯辦抗議、請願（如要求中聯辦轉達中央釋放被捕繫獄的異見人士）示威等，這幾乎已成為一種常態。即在這次維園晚會後，有約100人遊行到中聯辦，又有200名示威者由維園出發，遊行到北角警署，要求警方取消今年3月中環的預算案示威而一度被捕的保釋。他們後來在路上有53名人士遭到拘捕，但他們堅決拒絕保釋，後來在不用保釋下全部無條件釋放，示威者代表認為是一次小勝利，這又一次證明警方的拘捕是無理的，而無條件獲釋也是15萬人晚會產生壓力的反映。

2011年6月7日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38卷第1期（總第230期）

2011年6月30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落實最低工資，續爭保障勞工權益

振言

勞工界爭取近10年的最低工資制，終於法定為每小時28元，在11年5月1日開始實行。儘管這與勞工界要求的33元還有一段距離，這多少對工資很低的勞動者略有幫助。但這點的增加，仍抵不上急速大幅增長的物價、房租及通脹。

勞工處在3月28日發出的首份《僱主及僱員參考指引》卻有很多缺點。它對許多問題的「指引」並不清晰，對最富爭議的飯鐘錢和休息日應否計薪，竟表明由勞資雙方自行協商解決。勞工處處長卓永興更指出，若僱主無法負擔，「不能強人所難」。其實，即使增加到28元，也不是很多，否則便證明未增加前的工資太低。處長這樣特別指出，顯然是偏幫僱主，教唆僱主更改僱傭合約，增加勞資糾紛，不利於勞方的爭取。

在實施之前，許多僱主及其代言人，都盡量誇大增加工資的壞影響，危言聳聽地說這將導致大量企業因此結束；而更多的僱主則在想盡辦法，如何剋扣回工資，以抵償所增加的數目。

其方法之一是削減一些人手，改由在職工人分擔。

方法之二是逼令「假自僱」，既可省回部份強積金，更可隨時解僱而不需付解僱費。許多企業早就實行「假自僱」，致使有位清潔工「被自僱」8年，在最近被解僱無賠償，才知道自己一向是「被自僱」。街坊工友服務處在5月1日起7天內便獲接「假自僱」15宗投訴。這當然只佔全港的一小部份。有一宗「假自僱」的大廈清潔工，被判上判等層層剝削扣糧，時薪只得17元。

最低工資生效半個月，勞工處巡查1657次，至月中發現23宗懷疑工資低於28元的個案，另接獲3次電話投訴。沒有被發現的一定還有非常多。

香港政府並未表示出自己帶頭當好良心僱主。政府的3萬名外判員工中，超過半數的薪酬未達到最低工資——月薪5824元的水平。港府縱容外判各公司從中大肆剝削工人。這次增加最低工資，港府已增加外判費以作補償。公營部門的一些負責人尚且如此不體恤低下層，則那些唯個人私利是圖的私營企業主就更變本加厲了。

還有一宗新事例是：香港電台聘請一位節目主持人梁思浩，長達17年只是散工，按日薪付薪酬，最近被解除每年簽的合約。可見港台許多工作人員並無穩定的工作保障。

此外，海事處採用零散外判的方法，以逃避僱主的責任，它在一個財政年度內，以3,478份合約聘用191外判工，使外判零散化。

馬克思說得很對：人類自有文字以來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今天在香港，為了增加勞工一點合理的工資，卻引起許多資方的還擊：裁員、增加在職員工的工作量，拒付飯鐘錢和休息日工資，更改僱傭合約……。從而增加了勞資間的糾紛，加劇了階級鬥爭的因素和矛盾。

為了保障已爭取到的每小時28元工資能夠完滿落實，進而繼續力爭33元和更高的目標成功，以及改善工人的工作條件和其他福利制度等，都必須善用集體談判權，還擊資方的分化、個別擊破等陰謀詭計，同時要加強工人的團結和合作，亦即是強固工人的鬥爭力量，越是能夠這樣做到，工人的權益就越能爭取到更多。

2011年5月21日

立即無條件釋放艾未未和維權異議人士!

張開

繼許多維權和異議人士被無理拘禁之後，中國維權藝術家艾未未，也因曾替眾多結石寶寶（包括他的親兒）追討公道和索取賠償，觸怒了當權者，在4月3日的北京機場被公安帶走，秘密拘留至5月20日，才由公安機關通過新華社記者報道，指稱公安「現已初步查明，艾未未實際控制的北京發課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存在逃避巨額稅款、故意銷毀會計憑証等犯罪行為。」「公安機關依法監視居住」。（引自5月21《明報》）。

這些指控又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新例之一，是在拘禁之后再製造莫須有的罪名，加以刑罰。新華社所指的北京發課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是艾未未的妻子路青，而不是艾未未，艾未未也不是董事和工作人員。如果該公司有什麼問題，應由路青完全負責。但艾未未被拘禁後至今，公安一直沒有找路青談話。如果是該公司逃稅，而該公司的法人代表卻被不問不聞，這是不合法律常理的，反映出官方說法的自相矛盾，不合事實。

新華社同時宣稱：「在艾未未被依法監視居住期間，公安機關依法保障了其會見共同居住人等權利。」但事實上，在艾未未被拘禁至今50多天，只在5月15日晚，獲准與妻子路青見面15分鐘，而且只准問身體情況，不准談別的。艾未未的律師劉曉原也對《明報》指出：「在（住家）外監視居住不符法律規定，因為艾未未在北京有合法、固定的住所。這不僅是法律明文規定，在公安機關辦理刑事程序中也有規定。」

劉曉原還指出，內地法律未規定監視居住期間限制通訊，所以艾未未有自由通訊的權利。（見5月21《明報》）可是，艾卻被完全與外間隔絕。

至於當局指控艾未未應負上逃稅之罪，劉曉原則說：「是不是偷稅漏稅，應由稅務機關

認定，從法律來說，到稅務機關根據偷漏稅補交，追究處罰、補繳，個人就不應該再被不准回家。」何況，應負法律責任而要被追討的，是發課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而不是其他非董事負責人的艾未未，由此可見艾未未是被插贓入罪的。

長期以來，中共的官僚統治，曾經製造出無數的冤假錯案，使無辜的人民受害，這種冤假錯案不斷出現，艾未未就是最新一宗的受害者。因此，激發起國內外人民和輿論的同情反應，在歐美多國舉辦艾未未的藝術雕塑展覽，並要求中國政府釋放艾未未。中國有一群維權律師也表態支持他；《南方都市報》5月12日的社論，藉悼念川震3週年寫出暗撐艾未未的文句：「我們無法做得更多，只好擺上鐵做的十二生肖，敬上瓷做的瓜子，象徵且祭奠你們凝固了的生命」。所指的十二生肖和瓜子，就是艾未未有名的雕塑製品。社論發表后，該報的網絡版社論立即被中宣部下令刪除，撰寫的編輯也遭調動。

在中共每當刊出踐踏中國憲法也列有的言論、出版等自由權利時，總會宣稱是「依法」行事的，可見官僚們的無法無天，任意妄為的特性，這也是官僚專制的必然產物，祇有廢除了這種制度，中國人民才能真正享有一切民主權利。今天，我們迫切要求中國當局必須立刻無條件釋放艾未未和所有維權及持異見人士，還他們所有的人身等民主自由權利！ 25/5/2011

後記：經過無理扣押長達81天之後，部份又因官方在國外內各方壓力之下，艾未未終於在6月22日獲保釋回家。官方宣佈「艾未未認罪態度良好」，「且其多次主動表示願意積極補繳稅款，現依法對艾未未取保候審。」這反映出艾未未在長期監禁中，飽受肉體上、精神上折磨打擊，又難免憂念慈母、愛妻和兩幼兒等家人，被迫接受官方條件。但官方同時宣佈「已查明」是「北京發課文化發展公司存在逃避鉅額稅款……等犯罪行為」，這證明，如有犯罪，仍是該有限公司的事，艾未未實在是無罪的。 2011年6月23日

日本核災難對中國的警示 軍行

今年3月11日，因受到地震海嘯的影響，日本福島縣的核電廠發生核爆炸，達到最嚴重的第7級，方圓30公里都遭受輻射，今後20年內都不能居住，原有居民被迫離開家園避難，大量人民受到輻射毒害，染上癌症，經濟損失會超過3千億美元，成為日本歷史上損失最巨的災難。大量輻射毒水排入大海，隨水飄流到沿海各國，污染生態環境，毒害魚類等海洋生物。在各方面政治壓力之下，經營核電廠的東京電力公司發出最樂觀的估計，要在大半年後，即今年年底，才能停止洩漏輻射。

日本雖然是世界經濟曾高踞第二位的國家，科技非常先進，但卻沒有吸取切爾諾貝爾和其他核爆炸的經驗教訓，預先作好防爆的工作。東京電力公司，早在2007年的內部研究報告已發現，該廠面前的海堤可能被海嘯衝破，卻沒有着手改善，也沒有應變的指引。

在這次核爆之前，其他地方已發生過多次重大核爆：1979年3月，美國賓夕凡尼亞州三哩島核反應堆半熔化，洩漏輻射，14萬人緊急疏散，幸無傷亡；1986年4月，烏克蘭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第四號反應堆大爆炸，核輻射吹到東歐和西歐，據報道估計有近1萬人死於核輻射感染，98萬人患上癌症；1999年9月，日本東海村鈾處理廠核輻射洩漏，有2人死，600人受感染。

以上只是最大宗的，根據綠色和平提供的資料，在核電短短57年的歷史中，已發生過285宗「國際核事件分級」「二級」或以上的核意外。就是說，平均每年5宗。當中「三級」或以上的就佔了12宗。

但是，許多國家的政府和私營電力公司，卻急功近利，唯利是圖，貪圖核電能量大、一般成本少，獲利豐，祇存僥倖之心，不顧風險，一旦發生事故，廣大人民健康生命必蒙受危害。他們本來可以大量利用水力、風力、太陽能發電和可再生能源等途徑發展電力的。

由於核發電可能產生輻射對公眾的危害性和潛在的危險，特別是在切爾諾貝爾核爆炸大災難的證明後，世界各國人民普遍行動起來反對核電，要求停建和關閉核電廠。在1986年，中國政府宣佈在大亞灣和上海附近興建核電廠，香港市民便群起反對興建，116個民間團體，成立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收集起過百萬港人的反對興建的簽名，交給北京當

局。但這種廣大的民意並沒有阻止北京當局的一意孤行，核電站繼續擴建。《十月評論》在1986年中曾連續幾期發表多篇社論和文章，明確表示反對核電的意見。（見本刊總113、114和115-116等期）。

儘管官方的「專家」輕率地「保證」中國的核電絕對安全，但這種「保證」卻很難令人放心地接受。單是廣東省已有10個核電站投產；其中距離香港50公里的大亞灣核電站，在08年12月檢查發現，2號機組反應堆控制棒卡住，去年曾發生過輻射洩漏事故。今年3月，相鄰的嶺澳核電站一號機組也有控制棒驅動器「發現洩漏」。單是廣東省這些事故，已証明這位「專家」的「絕對安全」「保證」「絕對」不可靠！

與上述的吹牛拍馬屁「專家」意見不同的是，中國的核能動力學會經濟專業委員會原主任溫鴻鈞日前向內地媒體表示：目前中國核電行業面臨兩大隱患：一是核電站建得非常多，在大規模建設下，行業人士可能會產生麻痺、鬆懈的心理，不按規範運作，從而造成危險；另一個隱患是當前核電建設的急躁情緒、急於求成的心理，可能造成電站建設中的施工質量不達標，從而造成安全隱患。（11年3月18日《文匯報》）

倘若這些隱患之一不幸變成事實，核災難便會爆發；中國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便避無可避。正由於核電所包含的巨大危害性，世界各國人民便群起反核，反核呼聲響徹全球，要求立即取消核發電，關閉所有核電廠。這次日本核危機擴散一起，令全球人人自危，激發起各國民眾上街示威。例如今年3月26日，德國柏林便有10萬人上街反核，其他的漢堡、科隆和慕尼黑三個城市也共有10萬人上街，反對核子發電。德國政府在5月30日公開宣布，由現在起至2022年逐步關閉國內全部17個核反應堆，成為首個在福島核災後棄用核電的重要發達國家。

在香港，全體港人都與附近的幾個廣東核電站距離不遠，一旦有核電站洩漏輻射，勢必迅速波及，港人無可倖免。因此，港人不能心存僥倖，而必須共同參與反對核電，要求中國當局應該立即停止擴建核電廠，而且關閉現有的核電廠，轉而全力發展水力、風力、太陽能及再生能源等發電，以確保國人的生命安全！

2011年5月31日

核污染與水危機

青岩

發展核能的危險

自從2011年3月，日本東京電力公司福島核電廠爆發核泄漏，至今引發的討論多圍繞核電是否安全或者如何預防事故等問題，卻欠缺深刻的反思，即人類追求資本主義現代化、工業化與城市化，需要耗用大量能源，並為此付出昂貴的代價。

翻閱人類核污染史上，就發現重大事故往往發生於極力推行工業化及城市化的國家，第一次是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美國，1979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三哩島核電站發生曆史上第一次燃料棒熔化事故；第二次是前蘇聯，1986年切爾諾貝爾核電站發生災難事故；2011年是緊貼歐美的日本。

即便最頂尖的科學專家學者堅稱核電技術發展先進及使用安全，卻沒法計算核污染遺禍人間有多少，連最起碼的治療成本也欠奉。根據百度的資料顯示，1986年4月26日，在蘇聯白俄羅斯—烏克蘭的切爾諾貝爾核電站發生反應堆堆心毀壞，當場造成31人死亡，大量強輻射物質泄漏。俄羅斯大約4300個城鎮和村莊遭受放射污染。在布良斯克和卡盧加地區，私人農場的蔬菜和家畜的放射性水平大約有13%不正常。外漏放射性污染不僅影響蘇聯大片地區，還波及瑞典、芬蘭、波蘭等國。截止2006年，還有超過150萬俄羅斯人住在受切爾諾貝爾核電站事故污染的土地上，其中有人還在吃受放射性污染的食物。聯合國衛生機構評論說，大約9300人可能死於由放射性污染引起的癌症。

現在日本政府根據國際核事故分級表，將此次福島核電站事故定級從第4級升為最高7級。2011年3月24日，《日經新聞》頭條刊文《日本發現更多蔬菜和水源出現核污染》，指出：周三，在日本地震對該國核電站造成嚴重破壞近兩個星期之後，日本當局在國內發現了更多被核污染的蔬菜和水源。日本首相周三警告全日本的消費者不要食用從福島轄區收割的蔬菜，其中包括甘藍，花

椰菜和菠菜等。這是菅直人在福島第一核電站於3月11日遭受大地震和海嘯的嚴重損壞並引發核危機後，首次發布限制消費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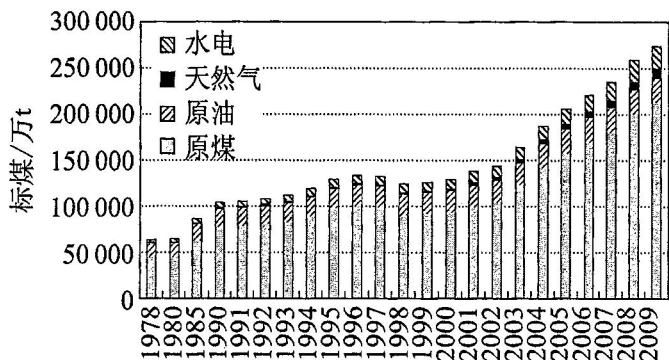
除了蔬菜，東京當局政府周三還表示，東京地區的一個自來水淨化廠的水被發現放射性碘的含量超過了可飲用限制值的兩倍以上。該自來水淨化廠的放射性碘經檢測覆蓋了東京23個區和五個城市，包括武藏野、三鷹市、町田、多摩和稻城。

日本全國滿佈核電廠，源自1970年代爆發石油危機，日本政府為了不依賴石油，同時舉國推行資本主義模式的現代化、工業化及城市化，導致用電日增，於是沿海地區大力發展核電。發生核泄漏的福島乃日本製造電子芯和汽車基地。對照今天被喚作‘世界工廠’，以及超越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實體的中國，日本的慘痛經驗值得借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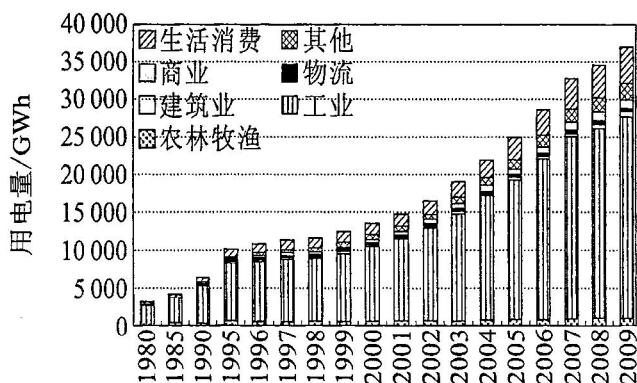
3月16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全面審查在建核電站，嚴格審批新上核電項目，抓緊編制核安全規劃，調整完善核電發展中長期規劃。在核安全規劃批准前，暫停審批核電項目包括開展前期工作的項目。援引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最新統計，目前，全球在建的核電站一共有56個，其中亞洲國家在建的有37個，而中國就佔了26，大部份的正在營運或者籌建的核電廠都在沿海地區。

復旦大學能源經濟與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吳力波稱，中國現在的核電在總的電力供應比重中只占到了1.12%，即使是按照“十一五”出台的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到2020年所有的23座反應堆全部加在一起的話，核電總的比重也只占到中國電力供應總量的4%，也就是說其實中國的電力供應絕大多數並不來自於核電，而主要來自於我們現有的火電，包括在“十二五”期間要大發展的天然氣的機組。（2011年3月20日，上海科普大講壇核能的安全與利用——科普大講堂專家談核能；‘十二·五’期間中國能源供應結構的高效化，刊於《電力與能源》第32卷第2期2011年4月）。

其實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加速推動市場經濟及消費主義，致使能源消耗與日俱增，不論是原煤、原油、天然氣和水電。以下乃中國一次能源生產構成圖表(資料來源:《中國能源統計年鑒 2010》)



以下乃中國用電量分部門構成圖表(資料來源:《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10》,從1980到2009年,用電最大的是工業,其次是生活消費。



1961年,中國的民用汽車擁有量為24萬輛,1990年年底民用汽車擁有量為551.36萬輛,而2007年年底,中國的民用汽車擁有量為4358.36萬輛。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汽車產銷已分別完成1379.10萬輛和1364.48萬輛,成為全球第一大市場。2000年,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電冰箱的擁有量為12.3台,空調的擁有量為0.18台,而城鎮居民每百戶對電冰箱和空調的擁有量分別為80.1台和30.8台;2007年農村居民每百戶電冰箱的擁有量為26.1台,空調為8.5台,城鎮居民的擁有量均為95台。(引自黃飛雪、靳玲,“城市化對中國能源消費的影響

機制研究”,《產業經濟評論》第10卷第1輯,2011年3月)。

三峽工程淪為發電謀利

長江中下游正遭受50年一遇旱情,由此引發的糧荒、電荒、水荒以及環境惡化等一系列危機激化了各界對三峽工程的質疑。5月18日,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指出,三峽工程“在移民安穩致富、生態環境保護、地質災害防治等方面還存在一些亟需解決的問題,對長江中下游航運、灌溉、供水等也產生了一定影響。”這是政府首次公開正視三峽工程存在的問題,會議討論通過的《三峽後續工作規劃》。根據《規劃》,到2020年實現三峽後續工作目標所需投資總額為1238.9億元。但資料顯示,截至2009年底,三峽工程已累計完成投資1849億元。

據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消息,截至5月中旬,全國耕地受旱面積9812萬畝(多年同期均值1.95億畝),其中作物受旱面積3300萬畝,主要分佈在湖北、甘肅、江西、湖南等省,其中重災區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受旱農田面積近3000萬畝,占全國耕地受旱面積的近1/3。而湖南和江西是早稻主產區,產量占全國一半。湖北省社科院農村經濟研究所所長鄒進泰預計今年湖北的糧食會出現較大減產,“湖北乾旱已經7個多月了,夏糧減產已經是肯定的了。秋糧方面,很多地方沒有水插秧”。

長江流域的乾旱,除了氣象條件等客觀因素之外,人為因素也不容忽視。一些基層水利幹部反映,河道湖泊非法挖沙,使河道嚴重下切,水位下降,沿湖沿江地區取水困難。江西新建縣水利局負責人坦言,在贛江中下游一些河段,與2000年比較,河道被深挖了4米多。大量寶貴水源位於中間狹小的深切河道裏,遠離河岸,無法抽取利用。一些地方小水電站快速發展,在乾旱期間成為抗旱“攔路虎”。在江西、湖北、湖南,許多主要河流及其支流均建有電站,對上游來水進行人為控制。正當乾旱季節中下游地區大量用水時,這些電站卻大量攔蓄水發電。由於電站管理權歸屬不同,利益不同,調度困難,制約了抗旱工作。

自5月20日三峽水庫增大下泄流量為中下游實施抗旱補水,水庫水位6天內從154米連續下降了2米。三峽水庫樞紐梯級調度通信中心副總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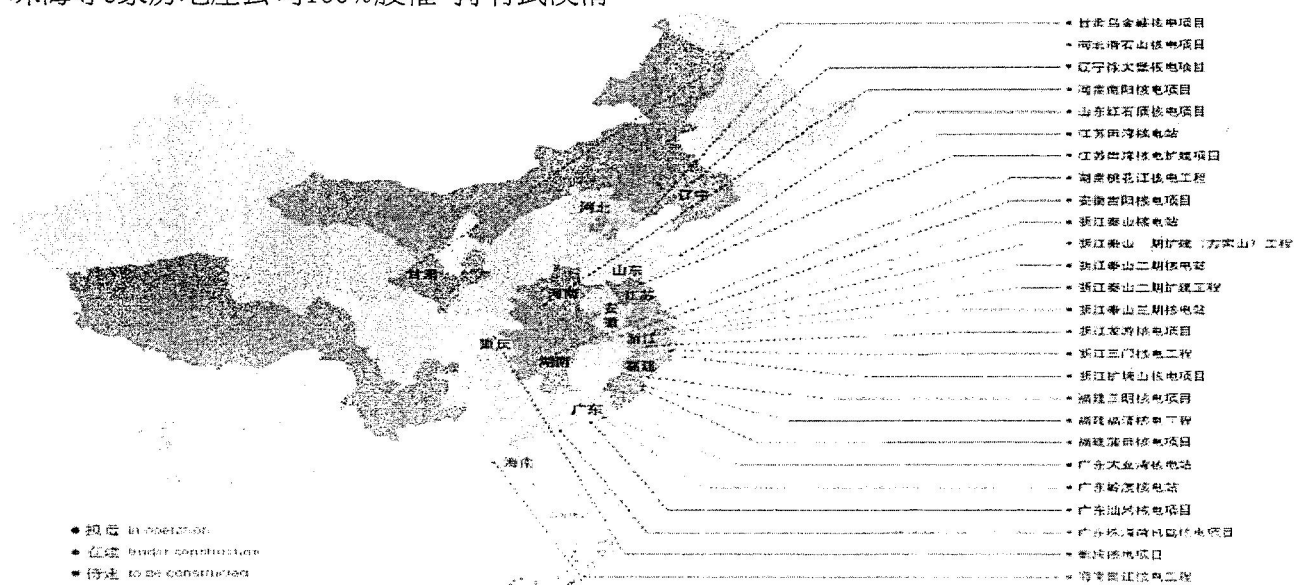
三峽已經成為各個經濟利益集團的‘肥缺’。三峽集團黨組成員、長江電力總經理張誠要求，旗下湖北清能地產集團要以打造一流房地產上市公司為目標。三峽集團公司並不在國資委確定的16家以地產為主業的央企陣營中。湖北清能地產集團成立於2010年年底，現在已經是湖北省資產規模最大的房地產企業之一。據悉，清能地產集團註冊資本為人民幣29.4億元，湖北省國資委占註冊資本的52.93%，中國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占註冊資本的43.19%，也就是說長江電力是清能置業的第二大股東。目前，長江三峽集團參股的清能地產集團持有廣州、湖北、北京、珠海等6家房地產公司100%股權，持有武漢清

能普提金置業有限公司80%股權和宜昌清能置業有限責任公司51%股權。截至2010年底，開發總建築面積達230多萬平方米，包括精品住宅、高級公寓、專業商貿市場等各種業態。除去以參股清能來擴展在湖北省內的業務外，長江三峽集團還積極謀求在商業地產方面有所突破。目前，長江三峽集團在北京、成都等地已有業務展開。2011年4月2日，長江三峽集團與北京豐台區政府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定，將共同推進北京麗澤金融商務區建設發展。結合蓄水發電和地產業務綜合來看，三峽集團實際上已經成為以經濟利益為主的央企集團。

國家電網公司副總經理帥軍慶預測，今年電力缺口總量可能超過歷史上最嚴重的2004年，僅國家電網負責的26個省份經營範圍內電力缺口就將達到3000萬千瓦左右。其中，京津塘、河北、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湖南、河南、江西、重慶等10個省級電網將出現電力供需緊張局面。帥軍慶進一步預測，如果電煤供應仍持續當前態勢，迎峰度夏期間電力供需矛盾將進一步加劇，預計電力缺口將擴大到3000萬－4000萬千瓦，缺電集中在華北、華東、華中地區。

總而言之，如果人類繼續漠視因為追求現代化與開採能源而引發至今無法解決的難題，並且一意孤行地惟市場經濟與消費主義為終極目標，那麼，後患只能無窮無盡，兼且由後世承受惡果。

以下乃中國核電廠分佈圖：



對陸月肆日的思念(來論)

陳中禧

(一) 祖國的月和日

記得嗎
季節是這樣開始的
煙雨迷濛
被稱為斷魂的時令
朝著碑的方向默念
一小撮人
無論有沒有儀式
他們都朝著
一個方向默念一小撮人

密不透風的月
無論燭光能否出發
大家能否再舉起凝重的杯
朝著碑的方向想想
曾被認為是魑魅魍魎的一小撮人

這一小撮人
在銘刻的那日
曾朝著一個方向出發
呼號那不可能的名字
而被割斷舌頭
是的
一小撮被稱為魑魅魍魎的人

(二) 小白花

如果路旁有小白花
千萬不要採
因為他就是那天上的星星
落在凡間，充滿心事

為了人的貪婪
他曾哭泣
為了人的懶惰、庸愚、甘做奴才
他歎息
為了人的驕傲
毀壞無處不在
他憤怒

他的名字叫慷慨
吃的用的玩的好的都與人分享
他的名字叫謙虛
不同意見、文化、種族或信仰
一概包容
他的名字叫創意
不論人間如何分等分階級分化
他卻是男女老幼智愚健全缺陷
皆共存共榮共發揮

如果山上有小白花
千萬不要採
讓他開滿荒地與野嶺
讓他的夢永延續
因為他最欠缺人間的
愛



(三) 腳踏車

走遍大街小巷
好多天
飛馳如千里馬
為廣場送帳篷
為孩子們送水
為老祖母送豆腐腦
給情人們送花
直至槍聲截斷大街小巷的命脈

人，不是由自己決定
前路嗎
自由就是幸福，縱使難走
命運之翅膀
在人類有歷史之前
已交付每個人的手

(四) 定鏡

雄偉的千軍萬馬
可以是控制
 是掠奪
 是虛榮
 是驕傲
我們站起來
 不是勢力
 不是才能
 不是金錢
 不是貿易
 不是經濟
是立在坦克面前的
無畏丹心

雖然沒有人再記起
他的名字——王維林

(五) 被失蹤

也不是第一次
首先被跟蹤
集體悼念
獨立發聲被禁制
腳印被喝令自動消失
然後像瘋癲的山雨
所有足跡被穹蒼水漏清洗
末了
修復一下碑上的彈痕血孔
沒死去的被通緝

(六) 遺囑

獨特人格永留註腳
選擇死亡是因為知道愛的結局不是恨
是生命

(七) 母親，看，你的兒子！

兒女
再看不見母親
在醫院的停屍間
在廣場或大街的某處
等候發落

沒有被審訊即被舉槍
不合法忽變合法

中國的力量平衡

吉伯特·阿恰

與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吉伯特·阿查教授的討論。

我們如何判斷中國強權的興起，積極的還是消極的？

這取決於你的立場觀點。對中國強權崛起的判斷，方式各異，取決於你是從美國的角度，歐洲的角度，還是第三世界的角度作觀察。根據所採取的經濟或政治軍事角度，它將有不同的意義。從一個反對帝國主義的角度看，可以說，中國力量的崛起，有助於重新調整蘇聯解體後變成的單極世界，在這個意義上說，它無疑是正面的。從經濟角度看，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分量相當可觀，它無可爭辯地發揮著積極作用。在最近的世界經濟危機期間，這一點可能再次被驗證。最大的問題是要知道，中國力量的崛起是否有可能加劇現存的冷戰機制，如果是，則可能加重並導致強烈的政治和軍事緊張局勢，這對於人類是危險的。

一些專家預計，在2025年美國和中國經濟曲線會相交。是不是有一個冷戰和對抗的風險？

有些人預期這個情況會發生得更早。2010年，中國經濟再次經歷了非常高速度的增長，增長率幾乎達到百分之十，引發了對經濟過熱的新擔心。如果這種強勁增長持續下去，這個曲線相交會很快發生。如果我們從西方的立場看這個問題，就會有一定的痛苦，因為看到——這是工業資本主義出現以來的第一次——一個有不同於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制度的國家成為世界上領先的經濟體。在十九世紀被英國主導，然後至今是美國控制的世界中，這是全新的情況。那麼，中國的崛起是否意味著冷戰的風險呢？從著名的結構主義的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在一種被設想為“零和遊戲”的力量關係框架內，一個新強權的崛起必然造成緊張局勢。不過，我覺得它不是一個結構上的必然性問題，而是一個政治決定的問題。在過去的分析中，決定性的是現存強權採取的態度，也即美國強權的態度。華盛頓的態度是決定性的：到目前為止，情況越來越是的這樣的，即美國一如既往，試圖阻撓中國的崛起。北京已經覺察和看到，他們的戰略合圍之勢已經

到位。如果他們持續這種行為，已經存在的冷戰機制必將變得尖銳。1999年，科索沃戰爭剛剛結束，我有一本書出版發行，書名就取為“新冷戰”。這種“新冷戰”的模式，指明了兩方之間日益增長的緊張情形，一方是莫斯科和北京，另一方則是華盛頓。在我看來，國際局勢的演變，似乎已經確認了有關這些強權之間的政治軍事關係趨勢的預測。隨著所謂的“單極時刻”，美國無敵的信念不僅激發了對華盛頓附庸國的霸權政策，而且也激發了對莫斯科和北京的霸權政策，它不只是施行在布殊行政期，而且是始於1990-91年。我們知道，布殊的這種帝國主義政策行為，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甚至讓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的信用都成了問題。經濟危機進一步讓這種威信掃地。今天，華盛頓奧巴馬政府正著手重新審查其政策，傾向於對莫斯科和北京採取較溫和的姿態。從長遠來看，如果華盛頓能成功地在聯合國和國際法以及集體機制的基礎上，按照整個世界以及美國大眾的利益，適應國際暫行架構，那麼冷戰機制的作用就可以停止，否則，特別是在華盛頓高端人事變動（在短期內這是可能的）後，如果華盛頓繼續執行其在中國與俄國邊境的侵略政策，在這種情況下，顯然，冷戰的動力將加劇。目前，中國的軍力還遠不能同美國相匹。後者仍然是世界軍事強權的老大，並在很大程度上，它在這一領域的花費相當於世界所有其他國家的開支。中國的軍費開支同美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它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發展，也是進展迅速的。在這方面，決定性的是國內生產總值（GDP），而不是人均生產總值（GDP），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人均GDP水準仍將遠不及美國。美國的軍費開支幾乎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這是巨大的。隨著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趕上並超過美國，北京將很快就能增加其軍事開支，達到甚至超越華盛頓的水準。一個新的全球軍備競賽，將大大增加全世界業已龐大的軍費開支，損害人民的發展和福祉，不要忘記，在像美國和蘇聯對抗這樣的氣氛中，沒有導致直接的或通過代理人的戰爭的東西，你就不會積累軍備。

超越同美國的一個簡單平衡，中國成為霸權的願望能實現嗎？

第一個提出的問題應該是要弄清楚，是否真的存在一個中國霸權的願望。顯然，對於西方世界的鷹派，這種願望是其基本假設。但是，如果我們從一個較中立，較客觀的立場觀察中國的行為，我們實在找不到證據來支持這樣的說法。其經濟活力和出口給它提供了巨大的貨幣儲備，在這個意義上，無可否認，中國的行為包括一個不可阻擋的經濟增長邏輯。而且它需要讓該儲備結出果實，不再或者越來越少地購買美國國債，而過去幾年裏，它是大量購買美國國債的。事實上，中國補貼了美國的預算赤字。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資助了美國的軍備和戰爭。今天，北京的外匯儲備已非常接近3萬億美元，這是巨大的。今天，中國正在做十九世紀末資本主義經濟在其“帝國主義”突變中所作的事。因為它有大量的錢去投資，它不再滿足於出口貨物，而是越來越多地輸出资本，無論是對發展中國家或對西方經濟體都有資本輸出，甚至輸出到像希臘和葡萄牙這樣再通貨膨脹的國家。作為回報，它希望更好地進入國際市場，發展商業交流，優先獲得原材料，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影響力。今天，由中國散發的發展援助貸款超過了世界銀行。但在軍事方面，還沒有或尚未見有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的表現方式，那種方式用的是炮艦外交和軍國主義，旨在擴大政治和軍事統治。在中國的姿態中，目前還沒有任何可比較的東西。中國在軍事領域的重點主要是防禦性的：今天中國的困擾是美國的包圍圈。美國控制著中國的能源來源，特別是中東，中國比美國更加依賴那裏的石油。一個鮮明的悖論是，中國是沙特王國的主要客戶，而沙特是一個在政治軍事方面受到美國保護的國家。美國的手放在大多數向中國供油的開關龍頭上。它控制了中國貿易的海上航線。這顯然讓北京擔心。從中亞和阿富汗到日本，中國被美國的軍事基地包圍著。它擔心美國為了補償或減緩其經濟霸主地位的損失，基於其軍事霸權，正在尋求設置經濟或其他形式的障礙。美國的詭詐可能進而影響能源、貿易和許多的其他方面（技術等）。在海軍力量方面，美國有巨大的軍力可以投放：它有十一艘航空母艦，而中國一艘都沒有。美國海軍的能力是武力的投放。這不適合中國，它的邏輯是防禦性的。中國人在發展自己

的潛艇艦隊，這是其最接近美國軍力的海軍軍備，至少在數量上是這樣的。針對美國航母，他們正在開發地對海的彈道導彈。這是他們避開美國海軍優勢的一個方法。回到我論述的出發點：球在美國的場地，美國人仍然能夠“引領世界時尚”，正如他們在20世紀90年代的戰略檔中所確定的那樣。他們仍然有主動權，到現在為止，他們是制定遊戲規則的人。他們要麼選擇採用新的姿態，認識到“單極時刻”只是一個短暫的“瞬間”，而且在集體機制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和平的國際關係框架，其遊戲規則適用於每一個人，這是明智可取的。要麼繼續他們的愚蠢企圖，阻止一個戰略平衡局面的任何顯現。在這種情況下，冷戰的機制只會惡化，甚至變質。

歐洲人能否同中國保持較密切關係，因為這有可能鬆弛美國對它的控制？

在任何情況下，這都是北京希望的。它干預和幫助歐元重新升值，是其促進世界多極化願望的一部分，這也是莫斯科的願望。戰略多極化來自於經濟多極化。中國的貨幣正開始其成為國際貨幣的質變。這種經濟途徑表明，北京對歐洲是心懷善意的，並希望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與它建立夥伴關係。這要看歐洲是否知道如何把握這隻伸出的手。這意味著質疑其持續了幾十年的排隊在美國背後的作法。歐洲可以翻轉跟隨在華盛頓背後的這一頁，認識到，為了建設二十一世紀，只是這個世紀不能是一個“新的美國世紀”，另一種政策是必要的。這是一個政治選擇的問題，因為沒有結構上的自動機制。我們都直接與其有關。

2011年1月對吉伯特·阿查的採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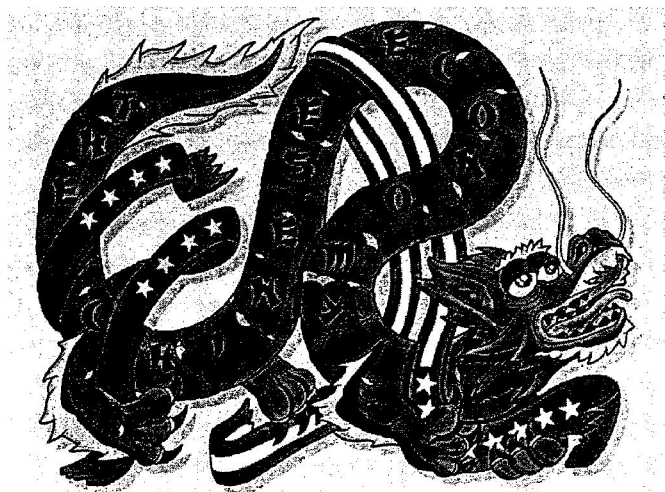
▶ 吉伯特·阿查生長於黎巴嫩，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任教。他的暢銷書《野蠻衝突論》在2006年發行第二次擴大版，連帶有他同諾姆·喬姆斯基關於中東問題的對話，《危險的權力》。他是《33天的戰爭：以色列對黎巴嫩真主黨的戰爭和它的後果》一書的合作者。他最近的著作是《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大屠殺：以阿戰爭敘述》，大都會圖書，紐約，2010年。

（由本文起，所有中譯文，俱為衛眾所譯，除了有刊出譯者名字的譯文之外——編者）

中國在危機中崛起——一個新資本主義強權的出現

讓·散努克

在北美和歐洲遭受艱難打擊之時，中國抵擋住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這得益於一個救援計畫，該計畫包括龐大的公共開支，低利率和消費補貼。中國的增長率在2009年達到9%，2010年為10.3%，讓跟在其身後的亞洲和拉丁美洲擺脫出危機。2010，它也設法把失業率保持在一個可接受的水準。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甚至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美國的差距正在縮小。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崛起似乎沒有受到次貸危機的影響。進一步的仔細察究表明，真正的問題還在後面。



中國工人不再接受過度的剝削了。2010年夏天，罷工浪潮蔓延。工人爭取提高工資，改善工作條件，爭取結社和談判的權利。自2010年中期以來，通貨膨脹加速，特別是食品價格的上漲加劇，給工人增加了新的問題，讓害怕不滿浪潮的政府更加憂慮。最重要的是，政府正在盡最大努力防止任何來自類似阿拉伯國家的民主革命蔓延開來。雖然中國的整體情況完全不同，但這些向中國工人展示的民主革命，確實有可能推翻那個最兇惡的強大獨裁政權。

中國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適應力

到目前為止，金融危機對中國和亞洲的影響有限（散努克，2008）。亞洲銀行不像歐洲的銀行，並沒有特別涉入次級抵押貸款和有毒產品的麻煩裏。除韓國外，亞洲國家並不依賴於短期資金和銀行貸款為它們的經濟融資。他們沒有像東歐國家和希臘那樣陷入債務陷阱。他們中的大多數，尤其是中國，已經積累了大量的貨幣儲備，能夠應付發生在2008年底的資本外逃。亞洲國家受到的主要打擊，是因需求下滑而導致的對北美和歐洲出口的下降。

作為一般規則，在出口集中在製造業上的最開放的亞洲國家中，當美國是一個重要客戶時，衰退對它們的影響比較強大。例如，製成品出口在馬來西亞約占70%，在泰國和柬埔寨超過40%，在中國，韓國，菲律賓和越南約為30%，但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低於10%。這些特點說明，2008年至2009年，人口最多的三個亞洲國家，中國，印度和印尼等國家沒有經歷過一個季度的經濟衰退。這三個國家的活力，最重要的是中國，它是最大的，是亞洲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它領導了2009年第二季度的迅速反彈，導致了一個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強大的“V”形復蘇。

幾個因素可以解釋亞洲國家的危機抵抗力和經濟復蘇的速度。

首先，為了減輕出口下降的衝擊，亞洲國家啟動了前所未有的地區救援計畫，它同1997-1999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相反，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負責的結構調整計畫使危機惡化了。中國救援計畫的規模值得注意：兩年時間的開支總額占GDP的13.3%，為5850億美元。平均而言，亞洲國家宣佈的救援計畫總額占GDP的7.5%，相比之下，7國集團國家的這個數目只占國內生產總值

的2.8%。此外，亞洲救援計畫更側重於公共開支而不是減稅。平均而言，亞洲國家公共開支的增加達到80%，而20國集團公共開支的增加平均只有60%。唯一的例外是印尼，該國以減稅為主。這些公共開支，伴隨著擴張性的貨幣政策。

亞洲各國央行的平均利率下降了2.25點，是過去危機期間的五倍多。由於銀行系統繼續工作，這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影響。在越南和中國這樣的國家，擴張性貨幣政策發揮了主導作用。在中國，公共開支從2007年的23%輕微地增加到2008年的26%，但2009年回落至21%，而且在2010年救援計畫正式結束時，甚至降到17%。從總體上看，在吸收衰退的衝擊上，公共支出並沒有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實際上是發生在2009年的信用擴張，它導致31%的可觀增加。因為寬鬆的貨幣引發了新的投機泡沫（有關此點，以下有更多論述），中國政府決定給經濟降溫時，2010年它也回落到-4%。

其次，危機期間，居民消費保持穩定，而且就業並沒有崩潰。在危機的時候，在亞洲國家裏失業率通常不會有劇烈的增加，因為除少數國家外，多數國家都沒有失業救濟金。只要可能，只要有機會時，失去工作的企業工人會試圖在服務業找工作，或者做自雇工作，或者回歸家庭農場。在中國尤其是這樣，在2008年冬天，成千上萬的農民工回到內地，一直呆到2009年2月新年後。但是，由於經濟在2009年春季復蘇，他們中間很多人返回城市尋找收入較高些的工作。

第三，同許多嚴峻的預測相左，從2008年9月至2009年2月，中國的出口雖然下降，但並沒有崩潰，並且由於世界貿易的復蘇，很快就復原了。由於出口的內容中有很高的進口成分（約50%），所以進口下降了相同的比例，使經常帳戶幾乎總是正的，儘管幅度較小。這既揭示了中國對外部衝擊的適應力，同時也顯示了它的弱點。因為是加工貿易組成了中國貿易帳戶盈餘的大部分。由於其初級產品的進口含量很高，長期而言，傳統貿易活動是虧損的。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為了保持加工貿易的競爭力，中國政府決定讓人民幣匯率釘住美元匯率，避免過高的工資增長。這就是為什麼2007年宣佈的新勞動法，應雇主的要求而暫停的原因。固定匯率的另一個困難在於，商品的價格上漲完全轉移到了中國經濟上。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這兩個矛盾沉重地擠壓著中國政府的迴旋空間。

救援計畫的後果：以前矛盾的惡化

擴張性的預算和貨幣政策不能無限期延長下去。官方說法是，中國中央政府並不負有重債：其債務占GDP的比率，是輕微的，是國內生產總值的19%。這意味著，中央政府有足夠的迴旋餘地擴大公共開支。事實上，中央政府卻做出了不同的選擇。在所公佈的2008-2009年40000億人民幣的公共投資計畫中，實際上只有11800億元是中央預算，其餘是地方當局的財政開支。這些交織在一起，作出了最壯觀的宣佈，即驚人的累計人民幣達20萬億元的總投資項目。由於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這些宣佈中的大多數已經實現。地方當局受到鼓勵，可以間接舉債，因為他們沒有可以直接舉債的正式許可。在地方一級已建立了特殊的金融工具，以便繞過這項禁令。

地方當局在金融車輛裏注入資本，然後使用它來作抵押，從銀行貸款。地方當局帶來了不同種類的資本：土地；由本地銀行控制的投資基金賣出金融資產，再出售該金融資產獲得現金；用變相的短期貸款，來獲得更大的中期貸款，再用中期貸款償還短期貸款。2009年，這些脆弱的金融措施成倍地增長。在2008年之前，地方當局平均有2至4個特殊基金手段。在2009年救援計畫推出後，他們平均控制了10個基金工具。以這種方式資助的投資專案的大部分是在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方面，而且由國有企業經營。這有幾個負面影響。

第一，它助長了房地產和住房投機。2009年一季度投資的增長來自房地產投資，這個領域的價格在2009年猛增24%，在2011年的頭五個月猛

增11%。第二，它創造了數額巨大的一種潛在的不良貸款，因為許多專案是不賺錢的。銀行資助了90%的投資資金，它正變得脆弱 --- 這已不是第一次了。1999年，不良貸款已達到貸款總額的36%。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已由國家成立，國家從銀行購買他們以便清理其資產負債表。截至2007年底，不良貸款仍然占總數的6.7%。貨幣當局希望避免重複同樣的故事。

第三，增加了公共債務。據維克托施（2010）的估計，把地方當局的公共債務併入國家債務的話，那麼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在2009年為71%，若是只考慮中央政府債務，其比例則為19%。它仍然是便於管理的，但它意味著無論是地方還是國家必須增加稅收。

問題是，一旦投機泡沫形成，緊縮通膨而不造成損害是非常困難的。地方當局約20%的財政收入依靠房地產。他們從農民手中徵用的土地，用作抵押或出售給開發商，土地的價值取決於房地產市場的價格，因此就可以在這個市場投機。在一個地方政治家和共產黨強權領導人並不總是同意中央權力的國家裏，提高中國銀行的利率，是減少銀行貸款和讓經濟冷卻的一個有力工具。但是，它揭示了很多不良貸款，而且地方財政處於危險之中。

最重要的是，在一個主要是靠投資帶動增長的國家裏，加息太多，可能會有非常強烈的衰退影響。相反，中國銀行不是提高利率，而是優先提高各個銀行必須維持在中央銀行的儲備金數目。2010年1月至2011年1月，中央儲備銀行把儲備金數目增加了七倍，而2010年10月和12月的利率只有輕微增加。貨幣管理當局也重新建立了信貸配額制度。問題是，銀行必會想方設法，繞過配額，擴大資產負債表以外的運作。

從總體上看，與2009年比較，似乎銀行貸款在2010年保持同樣的速度 --- 2009年是創紀錄的一年。讓銀行信貸控制雪上加霜的是匯率政策。2008年7月，中國決定重新建立美元與人民幣之間的固定匯率。但是，由於貿易帳戶始終處於盈餘

狀態，中國銀行必須用人民幣購買美元。這促使更多的人民幣進入中國經濟體流通，而中國銀行則試圖通過發行債券收回這些錢。因為涉及到巨額資金，這種所謂的沖銷做法，證明更為困難。其結果是，有更多的錢在流通，給投機和通貨膨脹增加了另一種來源。投資者特別在市場對食品做投機買賣，推動了過去幾個月食品價格的上漲。

通貨膨脹已成為一個政治問題，因為人民抱怨生活費用增加，開始抗議。記住，阿拉伯國家的民主革命開始於對食品價格上漲的抗議，中國政府對這一問題很敏感。2010年11月，國務院公佈了一系列措施，旨在穩定食品價格。如果這些措施不夠，政府將不得不採取更為顯著的加息以降溫經濟，基於上述原因它並不願意這樣做。

是否會這樣做，以及在什麼情況下做，將取決於政治形勢和工人抗議活動的強度。這可能是為何政府容忍2008年夏天工人罷工的原因，那些罷工首先發生在本田公司和富士康公司，然後出現在數十個其他地方，主要是外國公司。工人們要求增加工資，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尊重他們的基本權利和談判權利。政府通常會迅速鎮壓工人，尤其是當他們聲言要爭取自我組織的權利時，更是如此，但是這一次它卻決定讓工人罷工。它試圖分散工人對真正實際問題的注意，強調大部分公司是外國公司，如此挑動人民的民族主義神經。好像在中國企業，工人的工資待遇更好。這個故事，沒有人會相信。更嚴重的原因是，這個辦法，可以減輕圍繞通脹問題的社會壓力，為調整面向國內市場的增長鋪路，因為外國對中國產品的需求並不確定。

調整平衡增長，偏向國內市場

重新平衡增長是多數亞洲國家的經常性話題，這些國家的命運同促進出口的戰略相聯。1997-1999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後，關於減少經濟增長依賴於對西方國家的大量出口的必要性，已經有討論。但是，受害最重的國家（泰國，馬來西亞

亞，韓國和印尼）的出口帶動的復蘇，再加上21世紀頭十年中國產品在國外市場中的成功，結束了辯論。現在辯論又回來了，因為有一個共識，即美國，歐洲和日本從危機中的復蘇將是緩慢和暫時的。

對亞洲出口產品的需求將會有長期的減少。因此，東亞和東南亞現在更嚴重地面對一個必要性，即調整其增長戰略，轉向國內市場。西方國家贊成這個調整，因為他們會從中受益，有望向亞洲市場擴大出口。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堅持中國必須讓人民幣升值的緣故了。這將推動西方對中國的出口，並降低中國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為了這個目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亞洲開發銀行的許多官方報告，討論調整平衡經濟增長的最佳途徑，辦法就是通過擴大內需，減少出口的重要性。

由於中國國內市場的重要性，而且還因為中國是許多亞洲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是國際和區域生產網路的中心樞紐，因此中國是這樣一個國家，其增長的重新平衡調整是最為重要的。事實是，中國結合了最明顯的不平衡。在這個國家，它有貿易盈餘以及因此而獲得大量的外匯儲備，其作為國內生產總值一部分的儲蓄是最高的，可是家庭的消費卻最低。2007年，危機前的一年，家庭的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達到了歷史最低點，為35%，投資比例則非常高，為40%，經常帳戶的盈餘達到了創紀錄的水準，為國內生產總值的10%）。

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做？平衡增長顯然也就意味著降低投資和經常帳戶順差的重要性，還要增加家庭的消費。所提出的經濟建議，貌似技術中立，卻有社會和政治的後果。舉例來說，放棄人民幣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重估人民幣匯率，將更多地有利於中國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因為他們有購買力，以較低的費用購買進口消費品，而絕大多數中國工人不能接觸到它們，因為它太昂貴。另一個問題是辯論的核心，就是中國的高儲蓄率問題。許多主流經濟學家認為，減少

儲蓄是增加消費的最佳途徑。這個簡單而表面中立的建議的背後，是社會和政治的賭注。第一個問題是要確定誰在中國存錢。

最常見的解釋是，高家庭儲蓄率一般是高儲蓄率（布蘭查德和基阿瓦茲 2005；莫迪裏阿尼和曹 2004）的主要原因。一些經濟學家加上國家（威默，2009）儲蓄率的重要性，而其他人堅持企業和國家儲蓄的重要性（普拉薩德，俄羅斯 2009年），（傑哈，普拉薩德和寺·荻原，2009），（霍夫曼和庫伊基斯 2008），甚至堅持（安德森，喬納森 2009年）企業儲蓄的唯一重要性。更普遍而言，企業儲蓄增長的重要性不會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唯一特點，而是許多亞洲國家的共同特徵（錢德拉，索納莉，納巴馬哈，和波特·那坦 2010）。

那些強調家庭儲蓄重要性的人，認為有必要建立或加強“社會安全網”。中國家庭儲蓄過多是因為謹慎的原因：人們必須存錢以便支付其醫療費用，支付他們子女的教育費用，要買房子或公寓，還有原因就是缺乏有意義的養老保險制度。他們承諾花更多的公共支出在教育，衛生，社會住房和養老金上。舉例來說，一個百分點的永久性公共開支的增加，平均分配給教育，保健和養老金，將導致家庭消費有一個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25個百分點的增加（巴達斯俄特·阿裏，2010年）。根據同一作者，在養老金上公共開支一個百分點的增加，對消費的影響較大，有1.6個百分點的增加，因為預防性儲蓄的減少將會更多。這些建議的方向是正確的，因為對一個更好的教育和衛生體制的需要是迫切的，因為中國大多數人並沒有退休金。

但所建議的是“社會安全網”，並非創建保障公民社會權利的完整的社會保障制度。此外，對於所要創建的制度類型，它沒有說出任何東西。僅舉一例，可以提議設立養老基金，作為最佳解決方案。這是世界銀行在許多國家建議或推行的。它將增加中國的金融力量，在中國，金融不像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不是主導的力量。

危險的是中國完全轉化為資本主義的最後步驟。這些研究也沒有解釋如何資助這些社會支出。如果大部分資金是通過增加家庭收入稅收而籌措來的，那麼消費的正面作用將被削弱。

2009年1月，中國政府宣佈了一個“社會計畫”，用以完成其經濟刺激計畫。提出教育，醫療和養老金的改進或建立，應該特別注重農村人口。但是，這些措施是否全面，仍有待觀察。專門用於這些措施的預算的比例很小，政府也沒有解釋他們將如何融資。它對消費的影響是不確定的。無論如何，它需要時間。中國人民自己將經驗這些宣佈的現實情況，之後才會開始改變他們的行為，減少儲蓄和增加消費。

談到企業儲蓄，社會和政治問題也非常重要。其實，企業儲蓄並非再投資的利潤。事實上，在中國，企業儲蓄高意味著，較高比例的勞動價值並沒有轉化為工人較高的工資，但只是變成了投資的利潤部分。這個特點不僅在中國遇到，在許多亞洲國家也有，這一事實說明了在亞洲對工人的過度剝削很多。增加消費，平衡經濟增長的一個簡單方式是增加工資以減少企業的過多儲蓄。但這不是許多經濟學家提出的建議，尤其不是世界銀行（錢德拉，那巴和珀特，2010）經濟學家提出的建議。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建議制定和完善金融市場，讓更多的企業在股票市場上市。中國政府能夠修改法律，以改善公司治理，使公司支付股息給股東，但情形還不是這樣。最後，工人應當成為他們公司資本的股東，獲得紅利而不是增加工資。向盎格魯撒克遜（英國）資本主義的轉換將是完全的。

我們相信，這些建議不是認真可信的。要激發消費，工資的增加是非常簡單，比較公平和更確定的方式，尤其是在中國，就像在許多國家一樣，這些年來，那裏的勞動收入的比重在下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7年），（艾理斯和史密斯 2007年），（歐洲委員會2007年）。中國的情況是：勞動收入占GDP的份額已經從1992年的69.2%下降到2007年的57.5%。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這個比例 11.7個百分點的下跌，受益的是一些企業，其利潤已經從1992年的11.5%上升至2007年的18.4%，而國家的收入從18.4%上升到24.1%。在重新平衡中國和亞洲的一般經濟增長的辯論中，這種勞動收入比例的負面演變，往往被忽視。在中國的情況下，根據阿齊茲和崔（2007）提出的簡單計算，可以證明，家庭勞動收入的比例，如果在整個1992-2007年期間，都停留在1992年達成的水準上，如果家庭儲蓄像實際觀察的那樣，同樣地演變，2007年的消費都會留在約46%的GDP的水準上。相反，在2007年消費已下跌了近10個百分點，達到36.4%，這是非常低的國際標準。可以推斷的是，在解釋家庭消費的下降方面，勞動收入比例的下降以及由此而來的利潤增加，是比家庭儲蓄增加更為嚴重的因素。

結論

亞洲經濟增長的再平衡調整，只有通過有關工資的增長和亞洲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才能實現，雖然中國強大到足以靠自己做到這一步。這將鋪平道路，在區域經濟水準上建立比較以我為主的經濟體，較少地依賴出口，因而較少地受國際危機的影響。這也將是為中國和亞洲工人爭取社會正義的措施，幾十年來，為出口競爭，工人們遭受低工資，骯髒和危險的工作之苦。中國最近一波的罷工，還有越南，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罷工表明，甚至在政治環境起初看起來不好的國家，也有社會力量可用。這是一個希望之因。

► 約翰·散努克是經濟學家，亞洲問題專家。最近，他主持了國際資源經濟學協會（IIRE）的經濟學家研討會。

(來稿)

烏有的“大明順天國”吃香到今

吳萱人

廿一世紀今天的香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頗有好些意圖難明者，在向物證上剩得一方破招紙的所謂“大明順天國”，密密招魂！

事情先由地區議會搞起。

九七前夕，藉著一九九六年是孫文誕生一百卅年，中西區區議會由熊永達任召集人，籌備設立“中山史蹟徑”。他透露聘請得中大歷史系教授吳倫寬霞為“中徑”撰稿(1)，“使孫中山的這一段史蹟能簡明地展現在讀者眼前。”不可思議的是，內裡竟有特殊的一站——當年死瞞著不讓孫文事先知悉的謝家父子幕後策劃一切的所謂“1903廣州之役”！

教授筆下也謹慎，寫云：

“12. 革命機關‘和記棧’——(德己立街)

攝於一九零零年代該處是用作策劃及準備革命活動之基地，並以鮮果店號作掩飾。1903年廣州之役就以此處為籌劃中心。該役係由謝纘泰領導，香港富商李紀堂出資襄助。”

十一年後，“中山史蹟徑”正名“孫中山史蹟徑”，該議會在2007年出修訂版，將“革命機關”押到尾部，大概仍然屬教授動筆(《修訂版序》執筆者陳捷貴雖無明言，但小冊書末“鳴謝”，教授大名排首)，見改：

“15 和記棧鮮果店——德己立街20號

和記棧鮮果店位於原址四樓(吳按：樓上開‘鮮果店’？媲美現時的架步花茶室。該是樓下店，四樓借來謀事)，曾用作革命機關地。1903年廣州壬寅之役即在此商號的掩護下策劃而成。此役由謝纘泰統籌，並獲香港富商李紀堂的資助。”

議會的相關工作小組，沒有解釋為何將前小冊子標榜“革命機關”的站名撤銷(雖然該詞搬了入內文，可內文卻不見了前有的“基地”和“中心”)，謝子則由教授自行糾正“領導”為

“統籌”，準確得多。但教授仍隱去謝父的角色(謝纘泰著《中華民國革命秘史》有很重著墨其父的策劃地位)，也半句不提是役的前線領導：原太平天國敗部，瑛王三千歲洪春魁(即洪全福)。

“1903廣州之役”，或“1903廣州壬寅之役”，都欠了及隱去了一點兒甚麼似的。史家慣書的是：“壬寅廣州洪全福之役”；或者如黎東方，乾脆直書是役為“大明天順國”“南粵興漢大將軍”起事失敗。

……

那麼“古色古香”，一派新王奪舊朝的名號，難怪教授提也不提。想深一點，是否該役事實並非與孫文搞革命，要幹的是去除帝制，締造共和的終極目標？祇因議會有人塞入了孫文名下史徑，不得不應酬；或根本未予肯定太平天國得天京後內亂殘殺無數，對其敗部起事難以過信，故免書其大名。都不可確知。

而可確知者，教授在史料內理出大力支持是役的“香港富商李紀堂”，家裡藏有縫好了的新龍袍。因而打算在加印應市的“再版”修訂版小冊內相關內文，再去一個人名李紀堂。這是第一手知情者消息(2)。省去李紀堂，並不能抹去史實。黎東方說：“沒有李紀堂，便不會有這一次‘大明天順國’(按：原詞)的運動。因為，絕大部分的錢，是李紀堂一人所出。”(《細說民國創立》頁49)民國成立後不久，宣誓接任自孫文名下的又一中華民國“非臨”大總統袁世凱，穿上新裝不久，又思稱帝，奸雄行舊路。則黎說，“值得我們欽佩的，是謝纘泰所擬定的國體，並非君主，而為民主。”在“新縫龍袍”事實下，不堪考驗。

黎先生護短，心地善良。可歷史假如復辟帝制成事，就是一件天大的事。

所以，我們除了要求偉人史徑名下剔走私貨，免又污染新建紀念園之外，還值得深入一些，探探究竟為何總有好些人在招這個既復“大明”、不忘闖王大“順”以及在天父上帝與天兄基督之間，開創“天王洪日”大位的天京“天國”——大明順天國之魂。它於“誓成民國”的辛亥革命史而言，亦是“革命”的其中一役？不是。

如此衲雜舉事名號，而被本港現時若干有權有勢者所偏好，就祇因一個內蘊能量極大的元素：我國被列強打開國門附帶的事物：西方宗教。

太平天國胡弄了一番外教，反映在其不得了的“玉璽”上：

“玉璽 恩和輯睦 天父上帝 太平 永定 乾坤 八位萬歲 救世幼主 天王洪日 天兄基督 主王與篤 真王貴福 永錫天祿”(3)

簡單一句，洪秀全們就是懂得“食勢”。外教給他們任性地利用了。在反洋人以至“教案”頻生的清末，傳教士和教會，都是長毛太平軍打天下的極需資源。

整個現代型態國體的發展，離不開清朝晚年，鴉片強勢輸入之外，面對種種西方新學：軍事武器先行、科學知識隨來；利益侵略頻頻，多元宗教東傳。而宗教又被同樣來自西方的新思潮，視為精神鴉片。它的確在廣大無告黎民階層，起過抵受苦難、越出長痛的作用。無論何時何地，源起初民社會的各式宗教，第一作用，離不開現實的鎮痛。

所以香港由開埠到今，有非常強勢的多元宗教社會。他們影響力大，能耐也不少。無數社會運動，均見到他們的身影，宗教與宗教之間，都在靜靜較勁、壯大。

有人在乍識楊衢雲之後，發掘到西方宗教在本港開埠社會的萌長。十年沉著，終寫成以壬寅廣州洪役為“緯”的新戲，而“經”呢？則是“以香港基督徒革命者及東華、保良局的士紳儒商的關係”。經緯既定，選“以中、上環斜路為

背景”，發酵所謂“重現百年前香港人在中國革命洪流中的血淚、掙扎與仁心。”

場刊加碼宣傳：“是歷史，是戲劇，更是生命的精誠！”

筆者年已六四，心境日趨淡靜。雖見有勢者巧妙地運動有權者，卻也無嗔怨；他們原本臨歧，以前的路行到今天，大概革命已死，革命無望，所見革命實如“洪流”，中有血淚掙扎，幸好抓到滿有宗教精神與情懷的“仁心”。憑人心仁心，看似終於昇華了事實永無止境的血淚掙扎。個人自1969年得知史有輔仁文社，有楊衢雲和他們一批豪氣干雲地拉開辛亥革命序幕的社友同志；而“食勢”於辛亥革命百年大慶的戲劇人，卻在新千禧年方才識君，額外地發現了一批教徒，就憑一方破招紙舊照，創作出“一群在香港的基督徒卻無懼殺身，策動‘大明順天國’行動，密謀再次起義。”而楊衢雲則已成過去，位格被陞，冷墓還可見證決志的小兒女；如此處理楊衢雲，也夠狠夠絕。經也好緯也好，捐軀身故後的楊衢雲好使好用，就像兩年後起事揚言為蘭兄復仇的蘭弟，小算盤如何打，至今仍是謎團。

不過，那方破招紙在說話。

它五百字不足的檄文，主旨反滿興漢而已。“大將軍”“重興漢室”，“軍民人等須知天命”，“各秉精忠佇看日月之重光”。年號署“大明國元年”。

豈似共和革命？

史料上另有所謂《大將軍申明紀律告示》，一位為“基督教來華二百周年”而著書《革命先驅——基督徒與晚清中國革命的起源》的牧師，在書內大費氣力寫的“大明順天國之役”專章，也祇引其“行歐洲君民共主之政體，天下平後，立定年限，由民人公舉賢能為總統，以理國事”及“無論官民相待如平等……即耆老小民有事申訴，亦必以平等之禮接見”兩句。實在不及他前引的又另份《大將軍四言安民告示》中要害的一句：“立太平基”。引前明說“洪全福是太平天國遺臣，有重振太平天國之志，‘大明順天國’

除有‘復明’的意味外，顯然還有太平天國的影子”。(4)

一場起事，竟各有各心。洪春魁由謝父敲定；謝纘泰想君主立憲後再謀共和；李紀堂不忿惠州失敗傾家再搞；容閔祇是答允“臨時”一回。至於廣州芳村德國教會藏人儲物，領事見事敗亦不敢多說話。梁壽華既在專章內引過謝纘泰的英文著作《中華民國革命秘史》，就一定知道內有一段：

“1903年2月17日 我父親擔心他自己活不久了。他責備洪全福沒有聽取他的建議，洪全福失諸慎重，家父懷疑洪有私心。”（內地漢譯本）

不足一個月後，謝日昌便病逝了。

所以專章內牧師婉轉塑造一個既係太平天國敗部身分，又是三合會龍頭，又自稱“信耶穌，拜天父”的混種教徒，甚至代其洗“太平天國式”教徒的“匪”底，都可以理解和接受。因為他太想改造洪全福，多個“革命基督徒”，總好過少一個。這情況與劇社“精神來源”起變化，“也許是對生命史的悲情借代的悼念”（盧偉力語），卯上了三千歲洪春魁，找到了如彼那般的革命基督徒。

但為何不更擁抱沒有爭議的，如孫逸仙。他雖然事前被死瞞，不也還是在《革命原起》內大方地說：“……其受革命風潮所感興起而圖舉義者，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不知他可亦知謝氏父子在後策劃整件“事”，及對整件“事”的深層了解。

其實在辛亥革命九十年後的2002年，影音使團已著手將購入中共央視籌拍三年的廿集《孫中山》，“以基督教信仰角度，豐富其中訊息，使孫中山之信仰面貌及生命經歷更為完整”，改名《創世風雲》孫中山福音電視連續劇播出，兼有《孫中山》大型文獻紀錄片、《生命革命》佈道版、《倫敦被難記》及《少年孫中山》漫畫。配合“創世電視”開台，進行《孫中山》大型影視製作。

使團在革命與宗教之間關係，大力地引介了孫的一句話：

“如果革命是火，宗教是油，人們只見我的革命，而不注意我的信仰。其實沒有油，哪裡還有火！”(5)

使團又實在地將首先是基督徒的孫捧出來：

“他是誰？是共和國之父，是開創中國近代史的第一人。孫中山是有血有肉，有真性情的平凡人，他的不凡，在於他堅強不移的信念，他的堅強，在於他有百折不撓的力量，有面對失敗的勇氣，他信仰上帝，使他成為劃時代的‘可能’思想者、革命家！在人們只顧關心朝廷的時候，他同時關心中國；在人們開始關心中國的時候，他放眼世界。”

多麼淋漓痛快！不是嗎。大家看到的，就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基督徒革命家。不是革命基督徒，沒有語病和模稜兩可。孫文的確曾崇拜過洪秀全，但他纔不“太平天國”；他走締造共和，誓成民國之路。而這條不轉軟的不歸路，乃1904年4月6日在舊金山《大同日報》社內透露，因“衢雲死矣，予承其志”訂立的。多得劉成禺記下了這無比重要的一句。

因為，有人一開寫楊衢雲捐軀後，便搬出一個三千歲上台，強充“革命基督徒”(6)，背後有個可疑的烏有國號。戲上演過六場，用光了藝術局撥下的公帑；又再弄得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合辦、民政事務局支持。說穿了，是找到另一筆金錢，再迷一回“無懼殺身”大明順天烏有國夢。敢問：你們算是哪門子的基督徒？何其自騙兼且騙觀眾，耗費公帑一次又一次的虛無行動哉！

基督教亦大類分有社會派和福音派，更有解放神學的批判派；香港發展史上，肯定不缺淑世基督徒。但基督徒而幹起拋頭顱的革命事業，殺人走險，他們那一刻心中所想，該是深情大地上的未來福祉，而不是靈魂信仰。兩者有分，但聞教徒有為護教而不惜性命，未聞因身為教徒而必搞革命顛覆；天國人間，非同國度。

但後人重溫歷史，常常粗心大意，包括稍有心於歷史“對話”的一群。因而，我們無奈得讀一段一段叫好的片語劇評。甚至畫家筆下刀下，也“不”明順“便”起來，求其收入為“締造共和”的革命系列創作之一，真真叫人唏噓不禁。

劇假史真，但弄假可成真。有勢者結合有權者，有心或無意地不斷招“大明順天國”的鬼魂，究竟是否單單為了證明本地基督徒很能革命的百年前史，抑或另有內情？是因為香港青年壯烈地拉開了“去除帝制”的辛亥革命序幕，推動這古老大國步向現代型態，實踐文明，追求民主，因而要強調天上仍有上帝，永遠管治人間？或是隱蔽的意識型態之戰，仍在繼續？由列強入侵至今不息，祇是換了另番話語。

2011年4月14日
竟夜至晨光熹微

【註釋】

(1)、指同時見諸史蹟徑各地點的仿文物匾制式（橫擺外長方內橢圓凸字填漆鋼牌）及刊於小冊子內。

(2)、2011年3月2日晚上來電告知筆者。但2011.4.30北角新都城酒樓“楊衢雲捐軀110年紀念大會”席間，蒙結交多年的小友贈以最新修訂版（2011.3）的《孫中山史蹟徑》小冊子，打開覆核，赫然仍見“李紀堂”大名。看來，小組主席無必要說過不算，而是“一動不如一靜”，算罷。

(3)、此璽古怪排列，大概“太平”之下，該由中軸向外，自右至左或自左至右讀之。如：“天王洪日 天兄基督 救世幼主 主王興篤 八位萬歲 真王貴福 永定乾坤 永錫天祿”。八位萬歲？難道璽刻於東王楊秀清扮天父上身答了洪秀全一輪屁股之後，個個都陞萬歲。

(4)、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中，說搞出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從頭到尾祇是基督教中一個狂熱派的‘教父’”（頁78，內地岳麓書社，1999）。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洪春魁自稱其侄，大夢未醒。

(5)、原句用字：“那裡還有火！”一字之差，硬解的話，變成相反意義：即使不當基督徒，還是要幹革命！

(6)、牧師之書筆下但見：“基督徒革命志士”、“熱血基督徒烈士”、“革命的基督徒同志”、“基督徒革命者”。可對洪三千歲，倒沒個叫法，說他“顯然是以基督徒的身分表現人前”，所以筆者勉強組裝“革命基督徒”新詞。其實洪某既不革命，亦非正牌教徒；教徒而又屬三合會龍頭，實啟人疑竇。



突尼斯和埃及革命向前邁進

第四國際書記局的聲明

一種革命之最確實現象，就是群眾的直接干涉歷史事件。在平時，國家——不問它是君主的或民主的——總超出於人民之上，而歷史則由這一行業的專家：君王、大臣、官僚、議員、新聞記者所造成。但在這些緊急關頭，即當群眾再不能忍受舊制度之時，他們就打破那排斥他們於政治舞臺之外的一些藩籬，掃清他們傳統的代表，以他們自己的干預來替一種新制度創造最初的基地了。究竟這是好是壞，我們且讓道德家去判斷。我們自己則將歷史發展的客觀過程所呈現出來的事實，如其實地來加以處理。在我們看來，革命的歷史，首先乃是群眾強行踏進自己命運之主宰圈的一種歷史。

——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序言

如同任何一場革命，情勢每個小時都在轉變。任何評價都將毫無疑問地在短短數小時或幾天內被新的事件所推翻。

不過，我們已經可以說，突尼斯和埃及的人民正在書寫廿一世紀革命行動的第一頁。他們的行動衝擊了整個阿拉伯世界，從阿爾及爾到巴勒斯坦首都拉馬拉，從約旦的安曼到也門首都薩那。這些在某個社會的特定歷史情境下展現的革命成果，源自於撼動了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危機。

這些「窮人的暴動」同爭取民主的鬥爭結合起來了。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加上高壓統治的獨裁政府，都削弱了帝國主義對突尼斯和埃及的支配。是他們造就這場社會和民主革命行動得以綻放的種種條件。

種種革命前夕或者革命快要爆發所必須的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元素，今天都出現了，這包括了工會和公民團體發起大量的遊行、罷工、群眾集會，人民的自衛委員會組織起來；所有社會階層都動員，包括底層民眾，也包括被捲入起義的中間階層；同時，統治者已經無法像過去一樣統治了；最後，所有激進政黨都一致反對舊制度了。

就在今日，我們看到埃及的轉變，成千上萬的勞動者、年輕人和失業者起而反抗穆巴拉克的獨裁統治。

在突尼斯，血腥的獨裁政權已經被推翻。這個獨裁政府是整個社會、所有人民，特別是年輕人最憎恨的對象。

本阿里政權，它的高壓統治和貪污腐敗得到了美國、法國和歐盟等所有帝國主義強權的支持，現在已被人民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同樣的群眾運動現在正橫掃埃及。兩個國家因為各自的歷史而形成差異。埃及在阿拉伯世界裡是人口最多的國家，在地區上具有地緣戰略地位。它的政府架構，政府機關和軍隊的角色不同於突尼斯。

儘管兩國之間有所差異，但影響著她們的卻是相同的基層人民運動。

突尼斯的群眾再也不能容忍一個讓他們飢餓的經濟體制了，雖然，在世界貨幣組織總裁史特勞斯卡恩眼中，突尼斯是「世界經濟的好學生」。在這個經濟制度下，日常主食漲價、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三十、數以萬計受過訓練和具有專業知識的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凡此種種都成為孕育社會變革的沃土；加上政治危機，終於導致革命。

2006年到2008年，包括米、麵粉和玉米在內的基本生活物資的價格急遽攀升。五年裡，稻米的價格漲了三倍。2003年，每噸米平均約六百

元，到了2008年五月，米的價格已飆漲到每噸1800元以上。糧食價格的綜合指數在2010年下半年跳升了32%，可見情況之嚴重。

大幅漲價的糖，穀物和油籽產品，使到十二月的世界糧食價格達到創紀錄水平，超過2008年水平——當時已經引起世界各地騷亂。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還要求各國取消所有關稅壁壘和停止所有食品補貼。最近的食物價格上漲在全球以前所未有的規模促成了飢荒，打擊了許多非洲國家和阿拉伯世界。

埃及也經歷了這次爆炸性糧價上升的影響。埃及經濟不能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去滿足人民的需要。自2000年以來，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已造成貧富懸殊暴升，和百萬計的家庭陷於貧困。埃及的8000萬人口中，有四成人每天所得不到兩美元。有九成失業者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埃及全國工會聯合會——其領導就是政府成員——自突尼斯起義以來，已經局部撤回了對政府的支持。他們要求價格管制，增加工資和分發補貼食物等等，因為人民連基本必需品，如茶或食油，都不足夠。工會領導人要求這些東西，這是前所未有的，因為他們一直是新自由主義的堅定支持者。這是突尼斯起義的影響。

在突尼斯，這場革命有深刻的根源。目前的社會運動，是一連串運動和動員的結果，而這些鬥爭又是從突尼斯人民及其組織的歷史性鬥爭中獲得力量，特別是許多人權及民主團體和工會，例如突尼斯總工會轄下的工會。這些歷史性鬥爭包括：

- 1999年為某些社群爭取表達自由和旅行自由；
- 2000年的高中學生運動；
- 2001年反對伊拉克戰爭的運動；
- 2002-3年第二次起義；
- 2008年在加夫薩的罷工和示威遊行；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2010年6月在班加丹(Ben Guerdane)的鬥爭；
——2010年6月在西迪布宰德(Sidi Bouzid)的鬥爭更為這次革命拉開序幕。

由社會起義來推翻獨裁政府，這是歷史性時刻，而且今天還在深化。這是一場激進的民主革命，具有反資本主義的社會要求。本阿里不得不逃離，但其流氓政權還在。群眾動員的力量迫使了本阿里的支持者逐步離開政府，但在我們起草這份聲明的時刻，總理仍然在位，而他是本阿里的支持者。

革命本身要繼續深化。群眾提出了“執政黨滾蛋！”，“總理滾蛋！”。在這些要求的背後，是要求整個政治制度，所有機構，所有的鎮壓機器，都應該根除。要消滅本阿里和整個制度，要爭取所有民主權利和自由，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還有罷工權，示威權，結社自由，包括組織工會和政黨。更要廢除總統，建立臨時革命政府！

要廢除獨裁統治和所有旨在保障統治階級的權力的制度，需要今天就開始爭取自由選舉產生的立憲會議。為了確保這個立憲會議不致為一個新的寡頭政權所把持，需要人民組織起各種委員會，各種協調組織和各級人民代表會議來推動召開立憲會議。

在這個過程中，反資本主義者將捍衛一個致力與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決裂的綱領，這個綱領包括一系列要求：滿足人民一切基本需要——麵包，工資，就業機會，按照人民基本社會需要來進行經濟重組。這些需要包括免費而足夠的公共服務，學校，衛生，保障婦女權利，激進的土地改革，銀行和重點行業收歸社會所有，擴大社會保障的失業金，公共醫療和退休金，取消債務，國家主權歸人民等等。這是一個為工人和人民服務的民主政府。

同時，無論是組織自衛隊，從國家行政機關或大公司趕走執政黨領導人，還是組織分配食物，都有工人和年輕人成立委員會和舉行集會來

執行這些任務。其中最有鬥爭性和最激進的團體，需要支持，鼓勵和協調所有這些群眾自發組織。我們需要依靠他們來建立人民的民主政權。在埃及，當我們正在寫這份聲明時，該國正處於起義中。儘管血腥鎮壓，人民革命的浪潮持續。上百萬示威者在開羅，亞歷山大和蘇伊士街頭示威。執政黨的總部及政權的一切象徵都遭到襲擊。人民對穆巴拉克的仇恨，對腐敗的痛恨，和迫切要求滿足基本社會需要和反對價格上漲等等，刺激了所有下層人民的動員。這個政權動搖了。

由美國支持的軍隊，其頭領想進行一種所謂自助政變，就任命蘇萊曼這個秘密警察頭子和現政權的砥柱，來作穆巴拉克的副總統。但軍隊處於困境。出現了人民和士兵之間的聯歡。但面臨埃及人民萬眾一心，軍隊的領導也可能採取對抗和嚴厲鎮壓。數以百萬計的街頭人民的要求是很清楚的：穆巴拉克必須滾蛋，它的整個政權，整個鎮壓機器，必須打倒；一個民主進程必須開展，以保障所有權利和自由。而呼籲2月1日的集會則是下一個步驟。

在埃及，有必要打倒專政，開創民主化進程，保障一切基本民主和自由權利。目前的運動是1977年麵包暴動以來最重要的，而且同上次一樣，有深刻的根源。

穆巴拉克在過去30年一直維持著獨裁政權，監禁和殺害對手，壓制任何獨立表達意見的社會運動和政治反對派。最新的例子，是2010年11月搞的偽選舉，完全受控於執政黨，才贏得八成以上的席位。過去的幾年，有過重大的罷工運動，特別是艾一馬哈利亞的紡織工人總罷工，和其他人的示威遊行和抗議；還有大型反帝國主義的群眾動員，反對2004年軍事佔領伊拉克和阿富汗。這在在標誌著這個政權多麼孤立，它根本不為人民所承認；它只靠美國和歐盟的支持而苟延殘喘。

埃及，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是帝國主義在中東政策的三大支柱。美國，以色列和歐洲將盡一

切可能來阻止埃及擺脫其影響，並盡一切可能來阻止抗議活動發展為革命。

突尼斯革命點燃了阿拉伯世界的火光。這也是整整一代人的第一次革命。一切都可以隨埃及人民的起義而改變。這裡的群眾動員無疑將影響整個區域，特別是鼓舞了巴勒斯坦人民，並凸顯阿巴斯的聲明的可恥。

我們要在突尼斯和埃及革命進程的周圍建設團結之牆，並在阿拉伯世界促成聲援運動。我們不要忽視本阿里的反擊可能，或忽視卡達菲的恐嚇。如果這些政權決定要對抗革命，那些軍隊領導人就會進行血腥鎮壓。

面對革命的深化過程，西方列強和統治階級會努力奪回控制權，以便毀滅革命所帶來的無限希望。突尼斯和埃及的人民必須有來自整個國際勞工運動，來自各種全球正義運動的支持。我們要促成各個工會，協會，左翼政黨，致力支持阿拉伯世界人民的鬥爭與起義浪潮。

突尼斯革命萬歲！

與阿拉伯世界的人民鬥爭團結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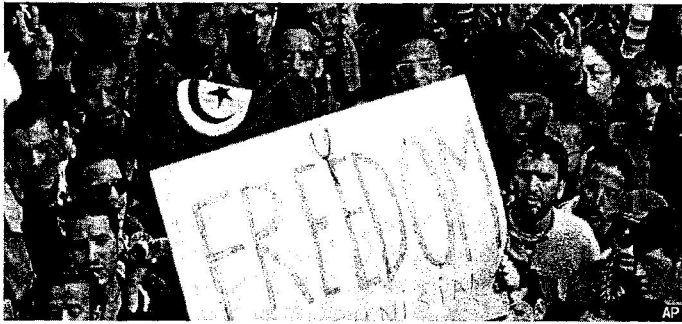
第四國際書記局

2011年1月30日，巴黎晚上八點

翻譯：魏雁竹、許由

突尼斯和埃及：世界規模的革命進程

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會議通過



[譯者按：2011年2月下旬底第四國際的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在其年度會議上一致通過了此項聲明。第四國際是一個主張社會主義革命的國際組織，由各國支部組成，支部成員都是富有戰鬥精神的活躍份子，接受並運用第四國際的原則與綱領。雖然各國有自己的支部，但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所有支部都聯合起來，以一個單一的世界組織來行動，並根據民主規則自由討論。]

緊隨著突尼斯人民推翻本·阿里獨裁統治的革命浪潮，埃及人民也取得了反對穆巴拉克的卓越勝利。僅僅幾天後，這股革命的衝擊波就擴展到了整個阿拉伯世界甚至以外地區，深刻影響了全世界的階級鬥爭。到處都是示威遊行、罷工、集會，自衛委員會、工會、高校學生和民主團體甚至警察都堅決站出來與國家機器作鬥爭。數百萬的突尼斯和埃及人民已經站了起來與獨裁者作鬥爭，他們還在繼續動員群眾以確保革命的深化。

這是不斷革命的過程，帶有社會、民主和國家主權等多種訴求的革命，它也正在向其他國家擴展。世界經濟危機以及獨裁者的野蠻壓迫和無恥腐化，讓窮苦階層團結一致，無論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還是中產階級，無論各階層的男女老

幼。兩國人民再也不能接受把他們邊緣化的經濟體系。正如其他鄰國一樣，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所謂經濟增長不僅沒有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反而導致了財富的空前集中和當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人民的生活水準和工作環境普遍下降。

這些革命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近年來不斷高漲的糧食價格，而氣候急速改變正是當前像突尼斯之類國家糧食危機的重要原因。世界貨幣基金會、世貿和歐盟的經濟自由化政策使得兩國大量工人淪為臨時工，公共服務經費被大幅削減，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對青年學生的打擊尤為明顯。再加上歐盟對海外移民關起了大門，海灣國家對勞動力需求的縮減，人們所有的脫貧希望都成了泡影。

與此同時，在政治權利方面，整個國家建立起了全方位的警察統治，人們的自由和民主權利被嚴重剝奪。議會裡僅存的「反對黨」議員不是個空殼就是被禁止發揮作用，根本起不到權力制約的作用。結果，在專制政權與人民大眾之間，只剩下獨裁者及其忠心而野蠻的鎮壓機器。強盜般的野蠻統治註定了它的喪失去合法性。

最後，這兩個國家的當局都鮮明地與以色列合作，但這必然引起兩國人民的反感，因為他們都非常同情巴勒斯坦人民。

基於以上原因，多年來罷工和反抗一直都在持續出現，隨著憤怒的累積，人們終於衝破了心中的恐懼。儘管有些犧牲，但突尼斯和埃及人民堅持不懈的鬥爭終於趕走了獨裁者本·阿里和穆巴拉克。

與此同時，阿拉伯人民也開始挺起胸膛進行民主鬥爭和階級鬥爭了，他們要衝破30多年來只能在獨裁政權和伊斯蘭政權之間進行選擇的被

動命運。他們，尤其是勞動階級，已經掌握了爭取各種民主與自由權利的辦法，婦女們也站起來要求男女平等。工人已經掌握了反抗新自由主義過度剝削的鬥爭手段，這就深刻動搖了美國、歐洲帝國主義以及以色列在該地區的統治根基。當獨裁者要求西方支援他們的時候，以色列以及其他有關利益國家都表示支持。

阿拉伯地區的革命運動已經顯示出其巨大的爭取社會解放的鬥爭潛力，婦女在其中的積極角色就是明確無誤的證明。這使得今後有可能削弱種族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影響。

兩國的革命已經對全世界產生了重要影響，約旦、也門、巴林、利比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毛利塔尼亞都爆發了革命運動，由於各地革命都帶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我們不敢預言還會有哪個政權可能垮臺。尤其是利比亞，當局已經動用了軍用直升機和噴氣飛機來鎮壓群眾，並已造成500多人的死亡，當地的局勢還會快速發展，這需要我們團結一心。

這些革命運動為第四國際所支持的巴勒斯坦人民的鬥爭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政治環境，埃及革命已經將取消加沙地帶的封鎖提上了議程，當然為此它還需要進行更大規模的群眾動員。

革命的浪潮也影響了伊朗和中國的反獨裁力量，這些力量也開始嘗試用那些在突尼斯和埃及使用的革命方式，比如社會化的互聯網平臺。革命運動也鼓舞了那些僑居在發達國家卻飽受剝削和壓迫的阿拉伯移民。而我們也空前地和他們站在了一起。

同樣，阿拉伯的革命運動也對帝國主義國家產生了影響，在這裡工人們和青年人由於找不到成功的道路，也越來越顯示出反抗的行動。這也表明在21世紀再度爆發下層人民革命的可能是存在的，它將可能推翻貌似強大的政權，取得難以估量的勝利成果。

雖然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成果還很脆弱，但關鍵要看其後續發展的勁頭。從近期的革命鬥爭經驗以及激進左翼力量在工會裡長足發展的情

況來看，群眾的自我組織能力發展很快，尤其是在抗議活動中，無論是在突尼斯的西迪布宰德（de Sidi Bouzid），還是突尼斯的大城市如卡士巴（Kasbah），以及開羅的解放廣場與蘇伊士，或曼蘇爾、亞歷山大的大街上，人們能夠有效地使自己免受警察和士兵的傷害。我們尤為驚喜地看到穆斯林和科普特人（埃及的基督徒）互幫互助，藍領工人和年輕的網民，婦女和牧師，作家和計程車司機也肩並肩地站在了穆巴拉克的對立面。人們不僅成功地打動了軍隊，而且還全面地與士兵們建立了友誼。

在人民持續抗議的壓力下，獨裁者逃亡了，執政黨領導層也被迫下臺。在突尼斯主要的貪污領導人正在被起訴，前執政黨「憲政民主聯盟」（Rassemblement Constitutionnel Democratique/RCD）的財產已經被查封，其辦公樓已經被人民佔領。絕大部分政治犯被釋放出來。雖然兩國的警察力量還沒有被繳械，但已經處於無組織狀態了。政府各部門的職工們也開始設法控制他們的長官了，比如突尼斯外交部的職員已經迫使其親法國的外交部長辭職了。還有許多政府官員也被迫辭職。突尼斯的民眾甚至還因為新到任的法國大使的反對立場要驅逐其離境！很多在公共部門的臨時工已經獲得了穩定的職位，突尼斯腐敗企業領導人的資產也被充公。在埃及，同樣的事情也在進行。公職人員已經獲得了15%的加薪，工人不顧新政權的威脅仍在繼續罷工。

面對如此巨變，統治階級當然不會坐以待斃的，他們必將會積極應對革命進程的。突尼斯總理加努希（Ghannouchi）以及許多RCD高官的留任成功地在總統本·阿里逃亡和軍隊的「中立」之間找到了一個好的平衡點，他們希望通過引入幾個反對黨和UGTT工會成員進入政府，繼續維持其合法統治。不過人民堅決不同意，從而產生了第二屆只有總理是RCD成員的新政府。但是新政府仍然受到法國帝國主義的支援，它正在試圖組織各種力量，協同突尼斯的中產階級和軍隊迫使工人們「像以前那樣」繼續工作。新政府所宣

佈的6個月後進行大選，可能只是個即將結束的插曲。在埃及，正是軍隊直接保證了「政權的更迭」，而奸險的蘇雷曼（Suleiman）仍擔任內政部長一職，他作為以色列的朋友以及美國CIA（中央情報局）的代理人早已臭名遠揚。同樣，在這裡人民被呼籲要保持理性，要保護埃及的旅遊業和外國投資環境，並被許諾幾個月後進行大選，同時還被警告將會有武力鎮壓的可能。

薩爾科齊（法國）和貝盧斯科尼（義大利）政府確實還沒明白他們對本·阿里的支持會帶來更糟糕的惡果，他們衝在歐盟的最前線要求當地商業儘快復甦，並用警察阻止移民進入本國。相比較而言，奧巴馬政府則較為靈活：既然還無法預見埃及局勢的發展，那就採取與之並行不悖的策略。但美國與埃及軍方領導人的密切聯繫確實是對埃及革命的長久威脅，很有可能對加沙地帶的封鎖還會持續下去。畢竟所有的國際機構都要求保證蘇伊士運河的安全暢通，都要求各國遵循現代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則：無論是多麼的不公正，新政府必須要繼續償還舊政府的對外債務；無論多麼不合理，新政府都要繼續延續舊政府已承諾的對外開放措施。

要建立起完整的民主自由權利（言論自由，罷工權，遊行示威權，自由結社權，組建工會和政黨等權利），要掃除總統制和成立革命臨時政府，就需要掃除整個制度。而當務之急是開始推動制憲會議的選舉。

爲了擺脫新寡頭政權的干擾，制憲會議的選舉必須植根於在革命運動中產生的群眾組織。在這一過程中，反資本主義的鬥士們將會與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邏輯相決裂，堅決捍衛革命綱領的主要訴求：滿足人民大眾對麵包、工作和工資的迫切需求，按照社會的基本需求重新組織經濟生產，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務（教育和醫療），保障婦女權利，擴大對失業者、醫療衛生和退休人員的社會保障，進行激進的土地改革，將銀行和關鍵經濟部門社會化，取締對外債務，建立人民主權。這份旨在服務于突尼斯的工人和民眾的政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府改革方案是由突尼斯左翼工人聯盟（the League of the Workers' Left）擬定的，這也是2011年1月14日反對加努希政府的左翼力量聚在一起擬定的鬥爭綱領的部分內容。在埃及，各個革命力量正在重組，而他們也捍衛這個綱領。

突尼斯和埃及的人民，以及所有阿拉伯人民，他們爭取全面的民主自由權利，仍然需要我們的支援。他們現在更加需要我們動員起來，去動搖帝國主義的枷鎖。所以我們主張：停止支付舊政府的外債，沒收獨裁者的資產，捍衛國家主權，對抗國際帝國主義，取消舊政府對外簽署的在軍事、安全和移民方面的不平等條約。全世界的革命者也要儘快與本國的工會、群眾組織以及反資本主義團體建立聯繫，樹立革命的團結精神，幫助有條件的群眾自我組織起來。阿拉伯地區的革命也是我們的革命！

我們支援以下會議的召開：

3月20日（伊拉克2003年被入侵的8周年紀念日），在塞內加爾的首都達喀爾（Dakar）舉行世界社會論壇的社會運動會議，旨在與阿拉伯地區的革命建立起世界性的團結；LGO定於3月25-27日在突尼斯召開阿拉伯地區革命組織會議；法國新反資本主義黨（NPA）定於5月7-8日在法國馬賽召開環地中海地區反資本主義會議。

荷蘭 阿姆斯特丹，2011年2月22日

和風譯 許由校譯

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 ——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贊同

弗朗索瓦·薩巴多

埃及和突尼斯的革命構成了國際形勢的歷史性轉捩點。這些革命改變遊戲的規則。將有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發生前後的不同。讚賞這個變化帶來的深度和所有影響尚為時尚早，但我們面臨著歷史的巨變。它們是這個21世紀第一波革命，更準確地說---因為2003年和2005年在玻利維亞也有革命---是阿拉伯世界的第一波革命，也是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危機引發的第一波革命。

它們爆發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薄弱環節。它們涉及一個雙重進程，一個拒絕獨裁的政治進程，也是一個社會過程，因為數以百萬計的人不能再忍受基本食品價格的急劇上漲的糧食危機，或更普遍地，人們不能再忍受只給數以百萬計的青年人帶來失業和痛苦前景的制度。這些革命 --- 因為它們是在社會政治舞臺上爆發的群眾運動，而且出現了政權的危機，在這個意義上它們是革命 --- 結合了民主的問題，民族問題（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主權問題）和社會問題。

這是阿拉伯世界的一個重大轉捩點，是在利比亞，巴林，阿爾及利亞，也門，約旦，巴勒斯坦的一個衝擊波，它也揭示了社會不穩定和動亂的來臨。在獨裁和民眾運動之間出現了第一階段的巨大戰鬥，形形色色各個勢力之間的對抗，旨在確保統治階級繼續保有權力，確保普通民眾對民主的渴望和其基本社會需求的滿足之間繼續存在分裂。

利比亞的屠殺還表明對這些革命運動展開了鎮壓。這波衝擊連遠方的中國都能感到。它會以特定的方式影響整個世界。

在這個意義上說，儘管我們必須考慮到這些運動的特殊方面 --- 反對獨裁政權的動員，階級矛盾的類型，這些國家內部的分裂 --- 這些運動

仍然處在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其特點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

今天的危機及其引爆點

世界經濟危機仍在繼續。它已進入第四個年頭。它以金融危機，食品或原材料市場危機和公共債務危機的形式展開，在歐洲尤其是這樣。其綜合特性---經濟的，金融的，社會和氣候的特性---已被確認。“文明的危機”這一理念恰如其分地反映了這場危機的深度。在世界經濟層面，有一些人，像保羅·克魯格曼（被認定為美國民主黨左翼的一個經濟學家）建議表示，這第三次大蕭條類似開始於19世紀70年代的歐洲和美國的經濟停滯---他稱之為長期停滯---以及20世紀30年代的他稱之為大蕭條的停滯。

目前的增長率及其長期的預測都疲弱：2011年3%，2012年3.5%。各區域的增長率分列如下：歐洲為1%至2%，美國為2%至3%，而在所謂的新興國家為6%至7%。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失業率仍然很高，官方數字大約為10%，實際上要高得多。貧困在增加，受害的特別是婦女，青年和移民。

20世紀70年代末建立的積累模式正處於危機之中。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紀初主導美國和歐洲經濟政策的廣義債務再也不能彌補主要經濟部門的生產飽和，不再能補償帝國主義中心經濟體購買力的貪得無厭的能力極限。另一方面，生產和大眾消費並沒有復蘇。所有關於危機已過去的說法，或“我們已度過危機最嚴重的時候”的聲言，並不能掩蓋世界經濟陷入危機，並無好轉的情況，這在美國和歐洲尤其明顯。危機自身發生在帝國主義中心，但它也激化世界的轉捩點。

雖然這場危機打擊資本主義中心的國家，但在過去的五年，中國還是保持了10%的年增長速度。印度和巴西也處於類似的發展過程，只是稍微慢一些。我們可以說，這場危機首先是西方世界的危機，中國，印度以及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系列國家避開了危機，或者說儘管有危機，它們仍在發展。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強權。在類似電腦這樣的一些關鍵行業，它甚至還居首位。其軍事實力和武器開支已經大大增加，它尋求在未來幾年成為第一級的強權。

中國正在世界上顯現一場真正的擴展：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規模建設專案，爲了原料和食品的生產，大規模地開發土地，購買歐洲遭遇“困難”的國家---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的債務。

當然，處在危機中的新興國家並沒有“脫身”。中國和新興國家沒有能力重新啓動世界經濟。這些國家在世界經濟結構中的涉入是脆弱的。不要忘記，中國GDP的42%來源於其出口，並且在中期內，中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將取決於它構建一個內部市場的能力，其方式是建設新的基礎設施，增加工資和社會保障。

這些國家的經濟活力提出了一個問題，即推動當今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抑或不再是美國單獨一個，而是還包括有中國，印度和其他新興國家在內的幾個。中國的活力是這樣的，即它可以拉動如巴西和阿根廷這樣的原材料出口經濟，也拉動如德國那樣的資本輸出經濟。這是一個問題，但它是理解這個世界轉捩點的關鍵。

美國在衰退，但依然維持一個實力地位，這得益於它的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廣度和統一性，得益於其美元的力量，但最重要的是由於其政治和軍事的霸權，儘管在突尼斯或埃及的發展進程中它進退失據，其霸權依然讓人有感覺到。但它已不再是布殊時代的美帝國主義了。它必須與其他國家磋商 --- 在武器方面與俄羅斯磋商，而且不久要同中國或其他國家--- 拉丁美洲的巴西或與人民的壓力作協商。

在這個新的世界平衡中，美國雖衰退但保持其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政治和軍事權力，有其巨大的市場和“它的美元”，倒是歐洲，在倒退回落。有的人甚至在談論1492年以來一直主導著世界的歐洲中心主義的危機 --- 1492年是發現美洲的日期。當前歷史時期和危機的突出因素之一，是歐洲結構上的衰弱疲軟。

一個新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的攻勢

在這場危機中，有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薄弱環節。今天我們在阿拉伯國家的矛盾爆發中看到它，在歐洲也見到它，在歐洲的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戰鬥中，對於統治階級，這場危機是一個槓杆，統治階級用它來摧毀一系列的社會權利和福利。由於利潤率不能由生產和大眾消費來恢復，世界競爭要求進一步降低歐洲和美國的勞動成本。有必要作進攻，放鬆管理，私有化。這個資本主義進攻，對統治階級作凱恩斯主義轉換的選擇進行辯論和提出質疑。

攻擊在即，是正面進攻，而不是社會妥協。小型的再度膨脹，小型的重建，沒有“需求”的政策，沒有對國家的社會及公共的再調整，速度喪失，所有的“綠色資本主義”項目也喪失。這些凱恩斯主義的限制進一步減少社會民主活動的範圍。經過幾個星期的恐慌，經濟金融化和金融市場的力量已經恢復。

人們甚至可以說是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後的第二波攻勢。不管怎樣，由雇主和政府發動的社會破壞確實比當年強烈。這種新的進攻具有全球性質。沒有什麼能避開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它的不等價交換，它對勞動力的重塑，是對整個社會權利的挑戰。

這也給拉丁美洲近年來的進步經驗帶來了壓力。在一定程度上，莫拉萊斯政府試圖增加石油價格的措施，是世界市場的壓力越來越大的後果之一。它甚至打擊了古巴經濟的核心。

如果整個古巴的工作部門“私有化” --- 近10%的員工 --- 相較於古巴和拉丁美洲的社會政治力量，將會有什麼後果？但並沒有宿命。拉丁美

洲進步政府和古巴領導層對危機的態度，成了對這些潮流發展的關鍵測試。

歐洲危機

儘管歐洲有它的技術，社會，經濟實力，還有其積累的財富，它仍然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薄弱環節，因為它夾在美國和新興國家崛起的鉗子中。中國購買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部分公共債務，是玩真的，並非象徵性的。從共生的因果關係觀點來看，該危機以一個“債務”危機的形式顯現。它已經把公共債務危機從銀行傳給了美國全國，該危機起於數十年的不平等的稅收政策，起于對金融和銀行業危機作公共的干預。

歐元區的公共赤字從2%升至6.5%，美國則從2.8%升至11%。2008年至2009年，歐元區的公共債務從GDP的69.4%升至78.7%，而美國從2007年至2009年的公共債務則從GDP的62%升至83%。這些國家目前處在危機的第一線，儘管歐洲聯盟和美國有所不同 --- 後者有遠為重大的通貨再膨脹經濟政策 --- 統治階級和兩個地方的政府都運用緊縮政策，這尤其會窒息公共政策。

歐洲危機的特性源於歐洲聯盟的結構類型：沒有民主的，沒有民眾參與的，沒有政治經濟統一性的，市場占主導地位的未完成政治內涵的實體。這個新自由主義的結構，遠未協調其經濟政策，鼓勵歐洲經濟的“分散的動力”，促進工業（德國）和金融（英國）動力的分散，促進高度發達的經濟體 --- 前共同市場和均勻發展者 --- 歐洲南部和東部之間的分散。

歐元有效地涵蓋不同發展水準和生產力水準的國家。遠未構成一個所謂“歐洲區”的經濟協調工具，它現在是訓練經濟體和人民以便服務於最強者的工具。這導致德國之類的國家和其他國家之間的緊張情勢，加給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難以承受的壓力。在這個階段，歐元區各國政府已創立了援助機制，回應徹底的新自由主義的結構改革，特別是為困難中的國家創立2013年“歐洲穩定基金”，基金為7500億歐元。這樣是否足夠，

已經有爭論。爭論激發猜測。

但是，除了這個債務問題外，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在當今世界的競爭中，歐洲的統治階級都相信，“歐洲社會模式”是與美國和中國競爭的主要障礙。有必要摧毀最近幾十年贏得的社會福利和成果。在今天的歐洲，存在一個真正的“社會戰爭”：凍結 --- 實際上是降低 --- 公務人員的工資，大幅減少社會和公共預算，破壞各級社會狀態，延長工作年齡 --- 改革養老金，挑戰35小時工作周，廢除數百萬的公共部門工作職務，打擊並私有化社會保障系統，衛生系統，學校（英國學生的學費暴漲）。

這些攻擊事件的最新例子是在都靈的菲亞特米拉費歐麗（FIAT Mirafiori）工廠的公投，在那裏，批准管理建議的結果，開啓了清算了結集體談判的路，清算不僅僅發生在工程，而且也發生在所有的專門分支和部門。分支機構或部門的全國集體協議遭到完全破壞。在雇員和老闆之間“談判”雇傭合同之前，它們就崩潰了。菲亞特董事會的政策還迫使工作條件惡化：團隊工作，夜間工作，處罰缺勤，凍結工資等等。

在歐洲，這類攻擊趨向於普遍化。隨著削減赤字的政策，他們不僅造成百萬人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惡化，而且越來越多地限制最終需求，結果是扼殺增長，帶來新的經濟衰退。削減赤字的政策會限制最終的需求，其後果只是抑制經濟增長，它確實會引起新的經濟衰退。這還不是一個緊縮計畫，其目標是在未來幾年減少打工者15至20%的購買力。解除福利狀態或其剩留物的做法，將會得到前所未有的推動。

右派和新自由主義的進攻

這個進攻，同資本主義正在經歷的歷史性和系統性危機有關，它同1980年代進攻的區別在於整個制度，其統治階級，其政黨，其機構的不穩定後果。所有的執政黨還有其他人都被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反改革和制度危機動搖了。政治代表性的危機，社會主義的歷史性危機，民眾棄權的現

象，認為政治精英們腐敗的感覺：這一切都在醞釀總體的政治危機。

在右翼，新自由主義社會反改革做法，削弱了傳統政黨的社會基礎，所以後者鼓動專制主義者，種族主義者，民粹主義者及員警，攻擊移民，攻擊羅姆人和穆斯林，以便獲得這個基地。他們像美國共和黨那樣，強化他們的反動進程。薩爾科齊或貝盧斯科尼的“民粹波拿巴主義”趨勢反映了一定的不穩定性。民粹主義或新法西斯運動獲得支持，它們特別是在瑞典，荷蘭，法國或匈牙利有基礎。在歐洲所有最近的選舉中，右派和極右派的選票有了增加。

社會民主與危機

在左翼，危機並沒有導致任何“凱恩斯主義轉向”。一個社會黨人的總裁出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表現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機構中的社會民主整合的程度。不像在20世紀30年代，不會從社會民主轉向左翼。社會自由的選擇是確認的。帕潘德里歐，薩派特羅和蘇格拉底的政策表明這個情況。歐洲社會黨的大方向，在歐洲層面上，讓他們感到安慰，並表明，超越每個社會黨反對右派的戰術定位，社會民主主義變成了社會自由主義。

即使有左派和右派之間的差異，有社會基礎的差異，有同工人政治關係史，工會，聯合運動的差異 --- 由工會機構接手的社會民主黨高層會議，刻意選擇了適應主導的危機管理模式的做法。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大型綠色組織的取向，日益偏向中左方。

社會抵抗的動力

分析和預測阿拉伯革命對國際範圍內的社會反抗的影響，為時尚早。但是，考慮這些革命，不僅要考慮到與危機相連的抵抗，而且還要考慮到阿拉伯世界的動盪，分析還要聯繫起出現在中國，亞洲和非洲人民中間的新組織，而且還有在歐洲這個架構中的新組織。

近幾個月最引人注目的因素是反抗緊縮計畫的鬥爭。總罷工已經在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國舉行。在法國，近三百萬人在兩個月內參加了示威和八次罷工運動...，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罷工有歷史性的廣度。我們的任務之一，是分析這些衝突的形式，內容和動力。在英國和義大利，學生示威表明了社會鬥爭的爆炸性程度。在德國，出現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多次反核動員。危機將持續下去。攻擊會加倍。

如果在歐洲有一個新的社會狀況，人民抵抗的聲音若是被聽到，那麼我們要注意兩個重要的政治事實：

a) 鬥爭，甚至最大的鬥爭，在這個階段也不會導致統治階級的部分失敗或工人及其組織的勝利。我們沒有阻擋住資本主義的進攻，更不用說讓其逆轉了。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新自由主義的反改革行動繼續推進，那麼在希臘，法國，葡萄牙，西班牙罷工示威的工人，和在英國示威的學生，不會有經歷過重大失敗的感覺。他們會迷惑地感到將有進一步的戰鬥。

b) 第二個突出的政治事實是，在有一定廣度的社會鬥爭的國家中，社會戰鬥力和政治反映之間存在間距。我們應該考慮每個國家情況的特殊性。在一些國家中，社會鬥爭水準薄弱。但即使在有社會運動的國家裏，在工會或政治層面也不相等：在社會運動中並沒有工會，政黨或左派潮流的有機增長。有多少成員或支持者？有可能各處都有工會和政黨成員的運動，但是，例如，1930年代和目前的局勢之間存在差異。例如，在1930年代，危機和社會抵抗導致工會會員，社會黨和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內部的左派成千上萬地增長。但社會自由的演變使這些黨派，面對階級鬥爭的興起，變得越來越“不可滲透”。

但是，我們也沒有看到工會有任何大規模的質的增長。於是我們可能會期待傳統左派組織之外的政黨和運動潮流的發展。在這個階段我們並沒有見到顯著的進展。今天在法國，在一次特殊的

社會運動之後，我們可以期待的是，2012年總統大選的社會黨候選人可能會是一個更具“社會民主”背景的人。然而，社會黨（SP）的2012年總統選舉候選人，可能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多明尼克·斯特勞斯-卡恩，他是國際社會民主黨中最右翼的代表人物之一！

上個世紀工人運動的歷史性危機的影響仍然可以感覺到。建設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意識，需要新的經驗具體成形。我們必須注意到，目前的鬥爭水準，即使它是在反對統治階級和政府的攻擊中興起的，仍然沒有獲得足夠的政治動力，翻轉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的反改革做法，奠定全面反攻和一個新的革命社會主義計畫的基礎。從而在歐洲建設激進左派或反資本主義政黨的過程，遭到了一系列困難。

突尼斯和埃及革命首批結果

其後果對阿拉伯世界是首先的和最重要的。這是半個世紀以來的第一批革命：在納賽爾主義以後，在阿拉伯民族主義興起和阿爾及利亞的革命之後。這是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和社會衝擊波，動員到了約旦、也門、阿爾及利亞、並且敘利亞、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情勢也日益緊張。

這些是民主、急進民主和社會的運動或動員。一個熟知阿拉伯世界的歷史學家把它們定性為“後伊斯蘭革命”。它指的不再只是伊朗。有新一代的青少年，現在還有工人，他們有組織和舉行罷工，想要找到他們自己的通向自決的道路。在這些革命的基礎上，將會有各個勢力的重新分派和重組：同青年激進化相關聯的新組織的出現 --- 急進的社會民主運動，伊斯蘭運動內部的分化 --- 就像目前在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工人運動和工會的復興重組。我們要強調突尼斯總工會（UGTT）的作用，尤其是其在突尼斯的戰鬥支部的重要性，還有尋求以獨立工會替代勾結穆巴拉克政權的工會的運動的重要性。

在當前進行的革命中，民主的，國家的和社會的需求，應同自我組織結合起來。在利比亞或巴

林，我們要求結束屠殺和所有的鎮壓。在突尼斯和埃及，我們支持民主的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解散獨裁政權及其所有的機構，解散憲政民主聯盟（RCD）和民族民主黨（PND）以及所有鎮壓機器，成立沒有任何舊政權代表的臨時政府，臨時政府應是人民起義的代表，並且召開制憲大會。

在這個情況下，突尼斯的同志們正在討論一個建議，它反對所有的“續命”方案，討論應用激進民主方案，通過滿足民眾的社會需要，管理突尼斯總工會（UGTT）。關鍵問題是，要從“擺脫本·阿里和穆巴拉克”進而轉向同獨裁決裂。與此同時，反資本家運動應該支持所有罷工，支持青年和婦女的所有民主運動，自我組織的萌芽在反對高物價、保護人民的鬥爭中發展。

這個阿拉伯革命的高潮，也將對中東危機，巴勒斯坦的政治局勢，以及與以色列的關係帶來中期和長期的影響。超越美帝國主義的操控，這個民眾動員的總動力削弱了該地區的帝國主義控制。它削弱了猶太復國主義的領導，它不能再把穆巴拉克當作其主要盟友之一。但是，這種領導首先被阿拉伯民主浪潮完全動搖了。作為一個整體非民主 --- 獨裁或伊斯蘭政權 --- 的阿拉伯世界的代表性，已經受到了這些革命動力的徹底挑戰。最後，突尼斯，埃及，利比亞革命，會鼓勵反對阿巴斯的巴勒斯坦當局和哈馬斯的激進潮流，或激進民族主義民主潮流的出現。

對於世界人民，這些革命將是榜樣。當然，沒有機械作用，但它們將刺激對拒絕獨裁統治，民主願望和鬥爭形式進行反思。衝擊波傳播到遙遠的北京，即使暫時它只有象徵性的意義。有必要看到，中國當局對這些革命的宣傳影響感到恐懼。在世界各地，這些革命打破了封鎖阿拉伯社會的可怕閉圈 --- 獨裁或伊斯蘭國家。它們打破了所有“文明衝突”的理論牆。它們為工人運動與阿拉伯青年一代的民主和社會聯盟創造了條件，特別是在有大量阿拉伯移民人口的國家。它們是加強所有反種族主義運動的支撐點。

關於革命者任務的討論要點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任務是什麼？答案是否依賴於對2007年爆發的危機所做出的診斷？它是否像所有過去已知的資本主義金融事件那樣，接下來是一個暫時的衰退？或者，它是一個在兩個層面上的制度性危機：因為超過三十多年金融積累制度已經是筋疲力盡了，另外，因為世界資本主義已經達到了同地球有限性和自然資源有關的極限。如果我們取第二個假設，我們就不能同意利用需求和金融系統調節手段的通貨再膨脹政策，需要的是徹底重組經濟，轉向社會需要，轉向工業和農業的生態轉型，轉向優質的非商業化公共服務，簡言之，同資本主義邏輯決裂，同資本私有制和現行的財富分配制度決裂。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計劃，它把立即的需要同反資本主義的對抗危機需要結合起來。不是工作者，而是資本家應為危機付出代價：捍衛社會福利、需求和基本權利，向金融交易徵稅，以及取消公共債務。這一計畫的經費可以來自銀行金融利潤以及大資本集團利潤。該方案應當伴隨著整個銀行系統的國有化或公共社會化，要提出資本所有權的問題。這種所有權問題的提出也應伴隨著反對私有化的鬥爭，並且在工作者和使用者對關鍵經濟部門的控制下，創立大型公共部門。

它的提出也要伴隨著生態問題，必要的重組以及中長期生態規劃。考慮到該星球上到處有自然災害發生，洪水，氣候混亂和山體滑坡發生日益頻繁，在這個情況下，生態面越來越重要，並應在我們的活動中佔據越來越多的地位。服務于工作者和人民需要的，關於生產的社會和組織重組，關於城市空間、交通、能源重組的所有建議，都應是我們激勵強調的。

在歐洲，這一計畫應該有一個大陸的層面。在歐洲，對危機的反應不是民族保護主義和退出歐元區。那會導致歐洲國家之間競爭的惡化，導致對人民的新攻擊，使最困難的國家受到打擊；更不用說沙文主義和排外運動的發展了。需要一個反應，這個反應是歐洲的，社會的，民主的以及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生態的，但它與歐洲的政策和體制是決裂的。在這個意義上，不能用拯救歐元或歐洲聯盟作為藉口，加大反對人民的攻擊和緊縮計畫。

我們的回應，應該從捍衛每個國家工作者和人民的權利和要求開始，並站在歐洲一級的高度上。這意味著，即使有來自歐盟的驅逐恐嚇，也要拒絕任何緊縮政策。那麼，需要的是協調歐洲各國人民的策略和鬥爭，建立一個歐洲人的，國際主義的反應，把協同作為優先目標，協調和合作，以幫助受危機打擊最嚴重的各國人民，這一政策運用造福人民和歐洲的大型公共服務，特別是金融服務的財政和社會方法，使資本家和銀行家買單。

在反資本主義的行動計畫中，民主權利和需求的問題，特別是在保護民主自由和捍衛移民和無證移民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特性。

實現這些標目，依靠數以百萬計的勞動者和公民的社會政治運動，與統治階級和政府對抗。

更一般地，我們的方向應該激勵和引導這個運動，結合社會、工會和生態的鬥爭，團結社會、工會和所有左翼力量的政治行動，號召和領導社會自我組織的經驗。提議發起取消債務的歐洲運動，提議通過協會和工會的協調推動就業。還有必要接續達喀爾世界社會論壇的倡議。

在政治層面上，同一的鬥爭，應該還要加上獨立於社會民主黨派的系統性尋求，特別是在大城市，地區，議會和政府的選舉政策上要有獨立性。危機證實了一個全球性的政治選擇的必要特性，這個政治選擇是社會自由主義和傳統左翼黨派的替代者。最後，我們應促進團結和反資本主義的聯盟，鼓勵在各級水準的反資本主義協調的所有倡議，鼓勵各個鬥爭，各個黨派以及歐洲或地中海的反資本主義會議。

2011年2月22日

▶ 弗朗索瓦·薩巴多是第四國際執行局成員，和法國新反資本主義黨（NPA）的活動家。他是革命共產主義聯盟（LCR）全國領導層的長期成員。

（由此篇譯文起，俱為衛眾所譯）

突尼斯1月25日革命概述：“爭取尊嚴、民主和社會正義”

阿拉·舒克若拉



在這些口號之下，1月25日革命爆發了。革命，既反映了過去10年愈演愈烈的不滿，也反映了針對不滿情緒的不斷上升的抗議運動。這個運動，採取了社會的而不是民族主義形式，在其主要的里程碑當中，有著名的2006年俄爾麼哈拉紡織工人的工人運動。然而，這個運動之前，有2003年聲援巴勒斯坦人民第二次厄爾尼諾阿克薩起義，以及反對美國軍隊佔領伊拉克的運動的興起。

然而，我們能夠追蹤那些可以被看作是點燃該運動的火花的某些事件。我認為大概有四個重大事件發揮了重要作用。首先是2010年6月7日一個年輕男子被警察殺害，這個28歲名叫哈立德·賽義德的人在亞歷山大的一個網吧被警察毆打至死。他的朋友開闢了一個面書（Facebook）組，名為《我們都是哈立德·賽義德》，很快就聚集了超過30萬的會員。這位年輕男子的被殺事件，就像扔在油田裏的火柴。這些年輕人的大多數過去從來沒有參與過任何一種政治活動，但這次他們有一個大家都認同的問題：哈立德·賽義德，可能會是他們中間的任何一個人！

他們組成討論小組，並從為他們的朋友尋求正義的行動，走向抗議緊急狀態法，抗議壓迫，腐敗和失業。總之，他們決定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為尋求真正的變革而行動。

在我看來，第二個事件是諾貝爾獎得主巴拉迪博士回國，挑戰穆巴拉克政府的領導，挑戰使他能夠獨斷專行三十年的憲法條款。我認為這給許多人帶來了希望，特別是許多中產階層的青年人，這些人自從出生以來，除了穆巴拉克，不知道有他人，在一個日益嚴重的疏遠他們的制度中，有一個變化可能會發生。巴拉迪的運動再次在互聯網的面書（Facebook）上激勵了近25萬的支持者。

第三個事件是去年所有當選議員的舞弊醜聞，尤其是國會選舉的舞弊，舞弊的方式極為公然而直接，反映了統治集團對人民的傲慢和蔑視。

然而，最終的推動來自突尼斯革命，那裏的獨裁者本·阿里於1月14日被推翻。青年人說，這是可行的，如果突尼斯人能做到這一點，我們也應能做到。

在突尼斯的本·阿里倒臺後，立刻有一些博客和來自4月6日改革運動的面書青年，哈立德·賽義德組和巴拉迪組號召示威遊行，要求“尊嚴，民主和社會正義”。一個年輕女子做了一個鼓舞人心的講話，呼籲所有公民和青年與她站在一道，拋棄恐懼，否則他們就在背叛自己的國家以及他們的兄弟姐妹們。

重要的一點，是要注意面書和博客，它們讓年輕人得以互相聯絡和討論問題，並闡明他們的要求，從而發揮組織這些年輕人的作用。在缺乏能連接人民並發揮領導作用的有力政黨的情況下，這是特別重要的。

但是，要理解更深層次的原因，只有考慮過去三十年甚至70年代中期以來發生在埃及社會中的變化。

在70年代中期薩達特的統治下，埃及經濟突然轉變，從一個國家規劃及資助的經濟轉向一個

開放的市場經濟，外資和本地資本無情地攫獲了該國所有資產的控制權。

一個新的薩達特統治寡頭集團逐漸形成，蓬勃發展，並從穆巴拉克手中獲得絕對控制權。

這種新的寡頭統治是由國家權力與商業通婚而產生的，沒有任何類型的透明度，腐敗成為積累財富和國家權力兩者的一個主要內在方法。

腐敗範圍從出售如公司一類的國有資產，到廉價出售房地產給商人，這些商人過幾天又反過來售出這些房地產獲取巨額財富。一夜之間，可獲數十億美元的利潤。此外還有洗錢，各種交易佣金，包括武器交易，以及外國給埃及政府的捐贈。內部安全部門和員警代表的腐敗與國家權力結成網路，把寡頭政治集團同其工作在地方議會和地區社團一級的最低階層連接起來。

然而，重要的是要看到這個埃及寡頭政治集團在更廣泛的全球背景下的發展。因為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政策，是由美國國際開發署，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以及後來加入的歐洲聯盟所指導和推動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呼籲減輕國家補貼和國家保護關稅，把這作為其“調整財政預算赤字”要求的一部分，而美國國際開發署和世界銀行則推動並指導一個完全開放的市場經濟霸權，減退國家作為商品和服務提供者的作用。

埃及執政的寡頭政治集團採用這些政策，並形成了其自己的方式，給作為一個整體的埃及經濟，也給大多數埃及人民，造成了幾個災難性後果。

埃及的經濟在日益改變，從一個生產半獨立的經濟變成一個依賴服務行業為主的經濟。在此期間，人們的生活惡化了。失業率達到前所未有的水準，“有人聲稱，失業程度可能高達25%”，就業者大多沒有長期合同，因此沒有社會保障，就業條件也惡化，既無國家保障，也缺乏獨立工會，近60%的埃及人住在貧民窟。

同時，員警和內務安全部門對更廣泛人民的壓榨迫害成了家常便飯，從員警暴力到酷刑，都

用來獲取快速認罪，即使它們是虛假的也在所不計，以確保控制，而虐待甚至成了一種內在的品格和員警的培訓部分。

尤其在過去五年，所有這些不平憤怒，開始表面化，不同行業人們的每天的抗議活動成為常態。這些抗議活動包括廣泛多樣的人群，他們過去從未參加過任何政治或經濟運動。隨著人們變得更加絕望，對員警的恐懼減低了，抗議活動傳播散佈開來。

因此，當“面書”青年號召遊行示威，要求改變政權時，統治集團及其安全部隊，甚至示威者自己都感到驚訝，不僅是數千人露出水面，而且越來越多的數百萬埃及人，幾乎來自該國的每一個部分都來到了前臺。

現在大家都知道，隨著運動獲得動力，統治者的讓步緩慢，跟不上運動，示威者的要求，包括有政治改革到推翻穆巴拉克，還有更徹底的政治以及社會的改革。隨著有示威者在蘇伊士城死亡，示威活動有了新的飛躍，整個埃及達到了百萬人。員警的暴行和狙擊手槍殺了400餘人，對人民有組織的恐怖行為並沒有阻止人們，反而使他們更堅定。

在穆巴拉克發表辭職聲明之前的最後幾天，幾乎所有行業的工作者都在他們的工作場所罷工，加入運動，一個可以被稱為全國抵抗的狀態成為了現實。軍隊的干預將不會或不可能不伴有血腥的屠殺，而血洗的後果對軍隊本身的影響則無法計算。該政權不得不讓步，穆巴拉克不得不離去。

迄今為止已經取得成功。人民已經贏得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民主實踐的空間。不過，寡頭執政黨，及其內部的安全部和員警已經遭到了強烈衝擊，憲法的一些條款開啓了更多的空間，以打破對總統寶座的壟斷。在這個革命中，可能的最重要的變化出現在許多埃及人本身。示威和靜坐，特別是塔利爾廣場（現在有人稱之為自由廣場，有人稱之為烈士廣場）代表了埃及現代歷史中最迷人的歷史劇之一。除了發生在廣場的高度政治

化以外，英雄主義，團結和社區意識的故事，將永遠留在人民的思想和靈魂中。

這是第一次，在宗派主義日益增長的悠久歷史之後，穆斯林和基督徒在“我們穆斯林和基督徒，都是埃及人”“我們是手足”的口號下，共同奮鬥，許多人相互扶持，舉手向媒體和圍觀者做出勝利手勢。男人和女人，戴面紗和不戴面紗者，肩並肩站在一起，相互保護，在同等的土地上，無怨無尤地鬥爭。眾人喊道“我們共同奮鬥，寧死不屈”。他們對穆巴拉克說，“我們不走，而你必須走。”

然而，真正制度化的民主改革尚未發生。舊政權仍在繼續統治，相同的社會經濟政策繼續佔據主導地位。

因此，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階段，真正的民主和進步力量將要採取的戰略，將意味著革命的成功或失敗。

雖然街頭示威有重要作用，並會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它們不能也不會永遠持續下去。必須通過其他戰略和戰術鞏固革命的成果，並擴大它們。

在我看來，組織和聯盟的建設，制定出要求的輕重緩急，是這個階段首要的工作。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如果一個追求真正變革的關鍵群眾力量是成功的話，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一個新的工作者工會已經成立。青年運動已經能夠形成一個聯盟，而且一個新的左派政黨已成立。許多不同的結盟嘗試在形成，運動的關鍵要求變得越來越清楚了。

組織過程應與所有不同工廠的其他獨立工人工會的建設一起繼續，而社區一級的已建立和正在建立的人民委員會則應當加強。在真正大眾參與的政治決策的發展中，在地方和全國選舉的代表中，以及在對地方機構，對地方議會和警察局以及服務提供者的監督中，他們應該發揮更廣泛的作用。

然而，必要的最重要步驟是召開全國會議，讓所有加入和真正支持1月25日革命的各行各业

都與會。應建立一個代表這些要求的代表團，與代表這些要求的軍隊對話。於是，受到人民重要支持的會議有強力的對話基礎，對人民負責，是人民掀起了革命，並願意繼續保護它到底。

最後，用塔利爾廣場的青年所作的一首歌曲作為本文的結束：

“我們的聲音是建設並非破壞...我們的聲音會導致變革。

決不要說沒有希望...因為你的聲音會帶來變化。

不要蒙蔽你的眼睛...起來，喊出最響亮的聲音擊敗你的害怕，因為在我們中間...那些吶喊的人不會死亡。”

►阿拉·舒克若拉是在埃及的發展支持中心的一個獨立活動分子。他是環境發展和健康協會的主席。



埃及2011年：一個歷史性的革命進程

舍蒂·凱瑞

2011年2月11日，1981年就掌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經過十八天的群眾示威遊行後，離開了權力。一個年輕人的簡單抗議，演變成了一波強大的運動，震動了整個埃及社會。一場革命正在進行中，但顯然尚無任何問題得到解決。

權力已被轉移到了武裝部隊的高級委員會手中，由他們管理過渡期。所發生的事情讓大家感到意外：埃及人本身，馬格裏布和中東地區的人民，記者和其他專家，沒有忘記帝國主義列強。繼突尼斯的勝利起義之後，埃及人民推翻了過去不可動搖的獨裁政權。所發生的事，不僅僅是一種骨牌效應的結果，它可以由埃及形勢本身的特殊性作解釋。

衝突的根源

革命的過程是由突尼斯革命點燃的火花導致的，是一個不同尋常的無畏行為的後果。然而，一些年來，在埃及一直有抗議的氣氛，聲援巴勒斯坦人民和反對伊拉克的戰爭也加劇了這個氣氛，另外還有面書(Facebookers)和“夠了！”

(Kefaya!)這代人之運動的影響，以及進入國內政治舞臺之大量青少年的作用。組織了許多示威，以抗議該政權制度，最多聚集了2000到3000人。由於腐敗興盛，後穆巴拉克時代帶來了嚴重的政治障礙。

大規模工人示威在繼續。工人並沒有獲益于代表或自治組織。面對一系列的罷工，當局更願意做出讓步，這反過來又導致了越來越多的信心。一個呼籲2008年4月6日進行總罷工以聲援工人的號召，導致了‘4月6日青年運動’的產生。這個組織集中精力於競選活動並聚集各種政治傾向和獨立候選人。

民主抗議，群眾反抗的發動機

1月25日，第一次發動[1]滙集了約15000人：有事在發生。一些年來，言論較自由了。人們越來越公開地批評當權者。

有一個問號，即誰接替穆巴拉克，還有一個不滿情緒，即不滿權力囤積在商人的手中而且腐敗愈演愈烈。經濟開放導致了消費的發展，而且亦發展了基礎設施。社會正在發生變化。某些階層的人們正受害於貧困化。委屈和不滿在積累，特別是員警的濫權，還有日益增加的經濟困難和高失業率，導致的憤怒和不滿更深。住房方面的情况也變得更加困難。有的人重複突尼斯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的模式。

從一開始，示威活動的參與程度就是一個重要因素，該示威同過去一向的規模不同，過去的示威，能夠被警方輕鬆和殘酷地驅散掉。這次示威抗議者採用的策略特別有效：主辦機構選擇了在不同的地點集合抗議者，然後前往約定的示威地點。

塔利爾廣場的示威在一些省份引起的迴響，被證明不只是重要的，而且是決定性的。蘇伊士運河目擊了一場近乎起義的行動。在亞歷山德里亞，警方的襲擊並沒有阻止任何事：人們反擊了！警察局和執政的民族民主黨（NDP）的地方總部被摧毀。亞歷山德里亞，地區政府總部（Governorate）被圍，由穆巴拉克政權持有的大量檔幾乎全被公開燒毀。人口稠密的尼羅河三角洲地區則目擊了發生在阿-馬哈拉科布拉（Al-Malhalla Kobra），阿-曼蘇拉（al-Mansoura），丹塔，達曼胡爾地方的強大示威...

面對這種力量和決心，該政權無奈，只能讓步。2月1日，穆巴拉克承諾不參加下屆總統選舉。這第一個勝利並沒有讓示威者平息下來。之後不久，給‘tawrith’（權力只是轉交給穆巴拉克的兒

子賈邁勒的建議）敲響了警鐘。然後，該政權使用雇傭軍‘Baltagya’粗暴地襲擊那些聚集在塔利爾廣場的人。但政府的退卻是明顯的。該政權甚至同意同反對勢力進行對話，其中有仍然被禁止的穆斯林兄弟會。該運動並沒有放棄而是堅持其穆巴拉克下臺的要求。民族民主黨（NDP）退出，而議會和媒體則不斷增長。

聯合反對派的領導人中有八、九十名議員，他們彙集了幾個反對黨，組建了一種‘反國會’。他們或多或少地試圖協調行動。年輕人在一起討論下一步應該怎麼做。在開始時，穆斯林兄弟會對示威遊行的支持有保留，但允許其成員以個人身份參加運動。

民眾對示威的支持正在增加，塔利爾廣場已經成為抗議行動的物質符號。在那裏也可以發現阿拉伯聯盟總部，被稱為摩嘎瑪（Mogamma）[2]的移民局大樓，美國大學，奧馬爾邁克萊姆清真寺[3]，豪華酒店和埃及博物館。此空間已成為騎著馬和駱駝的雇傭兵試圖使用武力和恐怖鎮壓抗議的象徵。

挨著埃及博物館的民族民主黨（NDP）總部被燒毀。這是對總統個人所體現的政權的廣泛巨大拒絕的表現。包括來自各個年齡層，不同背景，政治傾向迥異的人。通常彼此忽略或至少避免來往的社會各界人士如今互相接觸，交談合作。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團結體現了新精神。

1919年的革命情操發生在廣場上[4]，當時一種新的社會生活見到了曙光。一個小型的社會以食品，毛毯，醫療保健，休息區和安全（守衛塔，巡邏）的形式具體物質化。一個新的埃及出現了，它克服了傳統常見的分裂。

這一革命性的進程經歷了猶豫的時刻。因此，反對派呼籲任命憲法法院院長作為臨時總統，組織制憲大會的選舉。其他人則要求與反對派代表一起建立全國委員會，負責過渡期間事物。在阿塔利爾聚集的年輕人堅守並不斷鬥爭，要求總統下臺。

一個革命性過程的各方面

激進青年一代一直是這個強大運動的引擎，它能夠在自己周圍凝聚廣泛的社會力量。儘管組織脆弱和領導層非常普通，但它保持了正確的方向，直到總統離開。我們還必須提到婦女的重要工作——在網路上，在團體裏和在街道上她們都有活動。

埃及革命首先是民主的。它要求廢除緊急司法例外狀態，並釋放政治犯，解散人民議會，解散評議會[5]和地方議會，更不用說，要求承認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憲法的修改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應該由公民投票批准。因此，呼籲民主選舉產生制憲大會是一個重要的號召。獨立司法的發展，公民國家和獨立宗教當局的成立，這都是進步的跡象，儘管保守的伊斯蘭教（阿茲哈爾·謝赫，大穆夫提，沙拉菲的圈子等）和科普特教堂的大批神職人員對此懷有敵意。

軍隊的作用

隨著穆巴拉克離開，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SCAF）已做出信誓旦旦的保證，會把政權過渡給一個民選政府。示威者仍然非常懷疑。該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是由一批資深的軍官組成，其頭目是坦塔維元帥。國家元首離去了，憲法廢止了，議會解散了，但我們還是不能談論政權更迭。

軍隊在控制中，它仍然是一個擁有社會企業，農場，俱樂部，醫院和院校的重要機構。許多官員或前軍官在經濟生活，政府和媒體中仍然是重要的。軍官構成一種特殊的精英隊伍。軍隊是安全機構的關鍵因素，人數在35萬到50萬之間，它走出暗處，接手一切事情，以避免沉船。這種情況比1986年更危險，當時軍方不得不進行干預，以恢復秩序，反對義務士兵的一次起義。巨大的幻想存在，許多人表示對軍隊的同情。由於國家的歷史，由於反對以色列國的戰爭和愛國主義的重要性，軍隊因而享有很高的聲望。人們說這是一個人民的軍隊。在基層，這可能是真實的，但對於軍官們這不是真的。軍隊已經巧妙地

拒絕了進入鎮壓的惡性循環。

在此之前，它留在幕後。現在，它走到了舞臺中央。那麼現在會發生什麼？這很難預測。現在，穆巴拉克離開了，辯論開始了：我們是在走向1975年的葡萄牙嗎？當時軍隊把權力給予平民。該政權將會接近平民嗎？它會否導致土耳其在80年代的情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但它處在一個形式上民主的框架內？會有什麼樣的憲法？會出現什麼樣的選舉？我們仍然只能猜測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一個古怪的陰謀論一直在某些媒體和知識界包括在歐洲流傳。穆巴拉克的垮臺不是政變。是向美國攤牌，但這本身並不是強大運動的來源。

宗教問題和穆斯林兄弟會的作用

革命的進程，削弱了宗教當局，因為穆斯林和基督教對政權的支持，它們同樣遭受到傷害。阿茲哈爾就是這個情況，它是一所大學和清真寺，同科普特教會一樣，它是官方宗教當局的基礎。埃及伊斯蘭教是多數。我們可以區分伊斯蘭沙拉菲，支持使用武力的激進伊斯蘭教，最後還有穆斯林兄弟會。也有獨立形式的伊斯蘭教，受伊斯蘭派以及宗教保守派影響的民族主義者，他們不關心政治。

沙拉菲是極端原教旨主義，它支持該政權。他們譴責示威和革命，認為那是一個兵變。該政權甚至允許他們進入國家電視臺和私人頻道，譴責示威者缺乏愛國主義（原文如此），譴責他們是美國-猶太復國主義或伊朗陰謀的一部分！

激進派阿-加馬特- 伊斯蘭米亞和阿-基哈特因鎮壓而破裂，他們致力於暴力策略。只有兩個歷史人物支持革命：阿布德和塔利格·阿-左摩[6]。阿-阿-嘎瑪特·伊斯蘭米亞呼籲結束這一進程，拒絕要求穆巴拉克辭職，並表示願意參與政治對話。

常年遭受壓制和削弱的穆斯林兄弟會，因為穆巴拉克的垮臺而再次出現。他們在運動中起的作用重要，但謹慎。在運動發起後，他們加入了

其中。在雇傭兵（baltagya）攻擊示威者期間，他們用組織能力證明了他們的效力，但他們與當權者談判的企圖是令人難以接受的，他們很快就打消了這個企圖。

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政治中一直有著重要的地位。穆斯林兄弟會在1928年成立，自從30年代末以來，它就是一股政治力量。在納賽爾時期，他們遭受了很大的壓制。20世紀70年代，他們得以重建並發揮主導作用。如今，他們的結構是現代的和非傳統主義的，儘管他們持守一些非常保守的信仰，例如，拒絕接受一個女人或科普特信徒（埃及之土著基督教派---譯注）作國家元首。一個穆斯林兄弟會的領導人甚至認為，在一個伊斯蘭國家應再次讓科普特信徒支付人頭稅（guezia），或支付非穆斯林稅。然而，他們贊成議會制，他們也捍衛人權。

他們不再特別要求實施伊斯蘭教教法（伊斯蘭法），並採取支持抗議和民主的立場。既不是法西斯的也不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他們還沒有成為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但所發生的一切，將取決於政治社會的動態和進程。

穆斯林兄弟會始終與政權保持著曖昧關係。2005年，當時迫於美國的壓力，他們被允許參加議會選舉，兄弟會 --- 在‘自治’的標籤下 --- 獲得了88個席位。2010年，該政權的政策改變，結果他們只保留了一個席位！他們的策略一向是以自願克制的邏輯為特點。他們不希望直接對抗，與政府的關係受到其追求法律承認的願望的調控。這導致了面對該政權時，它的地位非常弱小。例如，在幾年前的某些事件中，他們能夠禁止反穆巴拉克的口號。他們的最高領導人曾經宣佈自己願意支援tawrith（世襲繼承）。有好幾次，穆斯林兄弟會忍住不參加示威。

因此他們與反對派的關係很複雜。他們不想放棄自己的迴旋餘地。有一段時間，該政權使得他們在社會和文化領域中讓步，在文化檢查這樣的問題上，輕易地從電影或書籍上的原教旨主義

者讓位給競選活動，以免在宗教和道德問題上顯得膽小。

穆斯林兄弟會也做了一些假行動。包括新幾代人和新的政治化的其他因素也起了作用。對於他們，該遊戲還沒有結束，他們也還沒有免除緊張和分裂。

他們常常似乎是附著於軍隊的；因此，穆巴拉克辭職前，他們與副總統奧馬爾·蘇萊曼討論。其中一個跡象，顯示軍隊似乎偏向他們，這個跡象就是憲法審查委員會現任主席屬於伊斯蘭運動，而副總席是兄弟會成員。該委員會包括廣泛的政治和宗教傾向。軍隊給他們空間和知名度，目的是恢復平靜。優素福·阿-卡拉達維的星期五祈禱會，也證明了這一點。此外，主導國家的部分精英不會反對一個軍人-兄弟會權力軸，以確保社會和平和地區穩定。

統治階級的選擇方案

軍隊正試圖重新確立其權威，以不同的意義把這個爆炸性危機的結果“現代化”。這註定要做出讓步，包括向反對派開放。這是一個重新確定其控制（資訊控制，員警的作用，軍隊的合法性，政治結構）範圍的問題。軍隊處在國家首要的位置，它一向獲得美國和歐盟的政治和財政支持。

這似乎走向保守多元化的建立，使它能夠保持其權力，獲得大眾合法性和國際信譽。“民主化”將不僅是形式上的。一些首長位置將動搖，一些做法將被放棄。但那將是有限的，因為中心目標仍然是維護其利益，並確保新的社會平靜。反對革命的行為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預測穆斯林兄弟會的行為為時尚早，它是主要的反對力量，其最近演變的性質還不清楚。他們會妥協接受一個像土耳其那樣的世俗國家嗎？還是會跟從巴基斯坦的例子，讓伊斯蘭教在國家和社會上發揮越來越多的作用？他們會看到自己被迫選擇一條中間道路嗎？這些方式與當前的經濟政策的追求並不是一致的，同以色列和美國密

切合作關係也不一致。反對派的主要部分，伊斯蘭主義者同自由民主黨一樣，並不敵視新自由主義。

勞工問題

當示威運動展開時，隨著規模巨大的工人罷工和抗議浪潮，社會問題迅速變得突出。工人鬥爭的出現為反政府運動提供了燃料。他們首先採取了街頭示威的參與形式。

穆巴拉克下臺的前三天，爆發了罷工浪潮[關於這個題目，喬爾·貝寧寫了一些優秀的英語文章]，隨後蔓延和影響了整個地區的許多部門。蘇伊士運河受到影響，但未波及受影響船隻的航行[這在帝國主義列強和海灣精英中間挑起了恐懼：世界貿易的8%通過蘇伊士運河]。這些罷工涉及不同部門的數以十萬計的工人，範圍廣及紡織，軍工，交通運輸，天然氣和石油，水泥，鋼鐵，醫院，大學，電信，不要忘記，還有蘇伊士運河地區。連員警都示威遊行要求更高的薪水，目的可能是重建自己因為鎮壓而損害的形象，修復人民中間的怨恨。

工作世界的現實是複雜和困難的：在價格暴漲背景下的工資，工作條件，某些公司的態度，缺乏積極的工會，工會資產；棘手的問題很多。失業率高：官方數字是12%，但實際上至少超過20%。價格上漲的不只是食物，還有交通和燃料。這個波濤有過去的根由，有些人會說，過去的十年，儘管有嚴厲的鎮壓，工人鬥爭仍然興起和堅定：自1998年以來，已有200萬工人參加了3000次罷工，靜坐和示威。這些把經濟需求（工資，獎金），社會需求（就業權，失業救濟金，養老金，住房，醫療，免費教育），還有工會的要求聯合在一起。他們的影響迫使當權者做出讓步。

這方面的一個重要標誌是，在聲援2008年阿-馬哈拉阿-庫布拉紡織罷工的鬥爭中，產生了4月6日青年運動的名字。這場典型的鬥爭始於2006年12月，它不局限於具體的要求，而且直接參與同官方工會的交鋒。另一個重要的例子是2009年發生

在坦塔亞麻紡織廠的五個月罷工。在此之前，一些形式的自我組織隨著一些事件發展了起來，如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反對伊拉克戰爭的示威。紡織工人的鬥爭，也給物業稅部門和運輸業指明了方向。

工人的干預，導致了一種更有組織的，集體的，特別社會形態的自我組織的產生。2月9日，運輸工人舉行了罷工，並宣佈他們要建立自己的獨立工會。他們要求解除緊急法，解散民族民主黨，要求一部新憲法，一個民族團結政府，起訴腐敗官員，1200埃及鎊（約130歐元）的最低工資。這最後一項的要求已包含在許多抗爭衝突中。

工人的動員和反政府的運動同官方工會交鋒，官方工會是名副其實的權力輸送帶。埃及工會聯合會（EFTU）由軍隊領導人成立於1957年，工會官員往往也是民族民主黨（PND）的成員。法律甚至禁止不附屬於埃及工會聯合會（EFTU）的工會的存在。工會官方的態度是支持當權者的，這更讓公眾不滿。許多工人想開始表達他們的要求。回聲的浪潮是如此強大，以至於埃及工會聯合會（EFTU）被迫表示支持突尼斯起義，要求價格控制，增加工資和補貼食品商店，提供穩定的食品，如麵包。

要求的範圍很廣，包括許多經濟問題：工資和獎金，但也有對合約條款的尊重，對大規模裁員行為的譴責，還提出讓老闆行為改變的要求。在一個專制環境中，從經濟要求轉向政治要求似乎很複雜。想要獨立工會制度的願望是很長時間的。它源於迄今很小的活動網路，這些網路渴望打破同當政者連接的結構形式，並鼓勵自主工會和獨立工會聯合會的建立。[7]。

建立一個左翼工會者的多元化聯盟，這是個老要求，由於要求有建立獨立工會的自由，這個老要求又獲得了新活力。帶著很大的困難，兩個獨立的工會設法獲得了法律承認：2008年，稅吏聯盟，2010年，衛生工作人員聯盟。緊跟著抗議和社會政策之後，1月30日，現有的獨立工會領導人和十多家公司的代表，公開了他們建立自治聯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合會的計畫。軍方領導要工人階級的鬥爭浪潮回頭。它已經宣佈了禁止集會和罷工的計畫，反復呼籲平靜。它尚未能阻止該運動的發展，甚至當主要罷工（阿-馬哈拉 阿-可布拉 ...）已經結束時，也是這樣。它甚至不能讓自己進行直接干預，因為這將被解釋為對抗革命進程。可以這樣繼續下去多久？要求回歸平靜和經濟復蘇的壓力是很高的。它們首先來自於資產階級，特別是埃及和海灣地區的資產階級，因為它們的損失很大。部分埃及社會也可能受了這種選擇方案的誘惑。

軍隊可能鼓勵一個社會規模的改革嗎？這是最不確定的，尤其因為埃及的精英們也標記有一個幾乎可以說是“封建”的專制精神，特別是在社會關係方面和在商業方面，更是這樣。尤其是因為該政權並沒有改變。工人成立工會或自治政治組織的前景，自主和鬥爭，是當局不會感到愉快的。

工人的行動，沉重地加壓在事件上，壓迫穆巴拉克下臺。社會底層的憤怒依然強勁。動盪階層的範圍證明了運動的活力。經濟和民主兩方面的要求，提出了工會制度，它的地位和現實的問題。對官方工會運動的廣泛不滿也已被革命加劇了。要求獨立有代表性的工會，這樣的現實空間已經開啓了。

政治地震和開放的未來

政治舞臺正在經歷一場地震。無論是穆斯林兄弟會，華夫脫黨（Wafd），納賽爾主義者，或左派，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被所發生的一切動搖了。有許多政治派別存在，但不一定是有組織的。更重要的是，新一代已經出現在公共場合：面書用戶（Facebookers），也就是三十來歲的年輕人，他們學習，在全球化中調整，並通過新媒體互相連接。一個政治的新時期開始了。討論涉及到一千零一個題目：憲法，選舉，公民，腐敗，員警的作用，科普特人與穆斯林之間的關係，軍隊的作用，反腐敗鬥爭，社會問題... 埃及社會沸沸揚揚。用歌曲，詩歌和說唱表演對此做文化表

達，強調這一活力。

請問穆罕默德·巴拉迪個人能統一反對派嗎？沒有什麼比這更不確定了。巴拉迪是可敬的，但只在國外更廣為人知。他因反對布殊的伊拉克戰爭計畫而獲諾貝爾和平獎，但他離開埃及很長的時間，在政治局勢方面他已是圈外人了。當然，他是許多期待和希望的目標，但他也讓他的支持者感到失望，因為他錯過了運動的開始期，還有他接近穆斯林兄弟會。他能利用他贏得的信用優勢嗎？其他可能出現的重要人物，如前外交部長和阿拉伯聯盟秘書長穆薩。

合法的反對派力量已經表明他們自己遠離運動，運動並沒有努力爭取他們。他們相當地不可信任，尤其是當穆巴拉克離開後，他們試圖與奧瑪·索雷曼談判，使其信用掃地。埃及反對派有廣泛的合法政黨，如華夫脫黨（Wafd），國家進步統一黨（the Tagammu）和納賽爾黨，更不用提穆斯林兄弟會了，它雖然自1954年就被禁止，但被該政權容忍。

也有來自“公民社會”的政治運動，如Kefaya（“夠了！”），或埃及變革運動，它來自幾個反對派勢力的活動分子聯盟，建立於2000年，當時有一個巨大的聲援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的運動。然後，在成為一個雖小卻充滿活力的反對穆巴拉克政權的民主反對派運動之前，這個運動反對布殊政府對伊拉克的入侵。

埃及左派的歷史機遇

埃及左派已經存在了百年，其範圍包括非常不同派別；其實倒不如說說埃及的各個左派。革命進程為他們開闢了巨大的機遇。

最重要的是Tagammu'（聚會）黨（英文名稱是國家進步聯盟黨），它具有合法地位，在議會中擁有幾個席位。它成立於20世紀70年代，因為當時薩達特引入多黨制。這是唯一從大眾爭論中出現的政黨。一個關鍵人物是哈立德·摩黑定，是代表幾種傾向的自由軍官之一：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和開明的宗教團體。它

還包括了1965年埃及共產黨解散後的許多前共產黨人。

國家進步聯盟黨（The Tagammu'）有報紙（Al Ahali），在全國有站點。它很快發現自己與薩達特有了衝突，特別是當它反對大衛營協議時，因而被壓制。無論是好還是壞，國家進步聯盟黨畢竟繼續存在，推出了一些候選人，成功地贏得一些選舉。它基本上是一個左翼改革黨，對政權不構成威脅，因為它非常包容該政權。其主席甚至說，穆巴拉克的辭職將是負面的，這導致了黨內的激烈辯論。

70年代中期，埃及共產黨秘密重建[8]，大量地捲入了國家進步聯盟黨（The Tagammu'）的活動，而同時試圖保持獨立的存在，儘管這樣做並非沒有困難。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圍繞諸如蜜雪兒·卡邁勒這樣的人物，因為方向和運作的問題，埃及共產黨（CPE）產生分裂。現在這個小團體，因為它老化的基層和近期兩個主要官員的喪失（納比勒·埃-拉拉利和約瑟夫·達爾維車），正處在大困難中。

隨著原教旨主義和保守主義在80年代的崛起，左派退卻並遭到了嚴重的內部危機。蘇聯的倒臺加劇了這一情況。有些左派團體，像革命共產主義聯盟，在20世紀70年代是相當激進的和非常突出的，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9]左右，甚至不復存在。許多左派活動家參與非政府組織的建立，從事人權事業。此外，許多左翼成員不再是任何組織的一部分。工團主義者和工會聯合會的領導人仍然出現在全國各地。

開羅大學，艾因沙姆斯大學和美國大學（AUC）的學生創建了一個名為社會主義革命者的團體。方向是托洛茨基主義的，它與英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SWP）聯合，其激進的活動性，和其認為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分析，聞名於世。該團體對伊斯蘭教主義提出了一種特殊的分析，並極力主張與之聯盟。它認為穆斯林兄弟會是一個改良主義運動。這個派別最近也有一個小分裂：因此，現在也有一個社會主義更新派，對

其建設組織的方法做了批評，支持建立一個廣泛的左翼黨的想法。

從2000年後，一波新的社會抗議浪潮動搖了埃及。在十年的當中，罷工和工人鬥爭中爆發，特別是在尼羅河三角洲的工業城市馬哈利亞 阿-庫布拉發生的紡織品廠的罷工，呼籲質疑官方工會。我們目睹了不同職業領域的社會抗議和活動復蘇。建立聯盟網路的嘗試恢復了。一些非政府組織作了大量的工作，開會，培訓，做報告，辦雜誌。我們中間有卡邁勒·阿巴斯帶領的在赫勒萬的達阿卡達馬工會 [10]，卡邁勒·阿巴斯是前鋼鐵工人，1989年的大罷工後被捕，或者包括了聯合工會委員會，該委員會包括幾十個從開羅和不同派別省份的工會人士，其目的是尋求建立一個獨立和戰鬥的聲音。

各左翼力量參與了2011年的抗議活動。請注意，絕大多數走上街頭的人，不是任何黨派成員或不屬任何政治派別。這些公民是在表達他們對該政權的不滿和深刻反對，反對其專制濫權的行為，經濟的困難，巨額腐敗的聚集。

巨大的政治化現象正在形成。革命還導致了深刻的政治重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行動越來越多。穆斯林兄弟會已成立了一個合法政黨，名為正義自由黨。被穆斯林兄弟會驅逐的前成員為了發展較溫和的立場，組建了‘中央’ (Al-Wasat) 黨，它已獲得法律地位。

1月25日革命，要求公民國家，呼籲大規模的社會正義，這些激發了兩個左派倡議。

在革命開始時，獨立活動者和國家進步聯盟黨 (Tagammu') 的前成員建立了左翼力量聯盟。接著是呼籲建立一項合法的廣泛的左翼政黨，並發起了法律行動。它的簽署者代表了廣泛的政治背景：前國家進步聯盟黨 (Tagammu') 的成員，社會主義重建派的成員，20世紀70年代工會團體的前激進成員，知識份子，有社會民主黨背景的人們，及其他人。在1月26日週六的會議上，他們成立了合法大眾聯盟[11]，希望彙集不同傾向和世代的人們，促進社會正義和自由。

上週五，2月25日，一個有戰鬥力的工人網路圍繞在卡邁勒·哈利勒周圍，開始了合法地確立民主工黨的過程，領軍人物卡邁勒·哈利勒，是20世紀70年代的激進左翼人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派的領導人之一 [12]。它面向雇員（工人，農民，等等），旨在表達工人的聲音，支持他們的要求，維護他們的利益。他們的成立聲明說，儘管政治精英和企業主有自己的組織，但工人還沒有這種權利。

這兩項倡議正在收集簽名，並籌備他們的下一次會議。按照革命精神，他們的目標是打破政權，建立一個民主的公民國家，促進反對資本主義鬥爭的政治，維護工人階級的權利和利益。他們的目標可概括為自由，公民地位和社會正義。同樣的，目的是要產生一個新的政黨，一個真正的民主政黨...這兩個方案還包括社會和經濟需求（最低工資，結束私有化，服務於群眾的政策，等）

區域影響

巴勒斯坦問題一直沒有顯著的作用，它不是民眾運動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動盪的深層原因實質上與內部的民主和社會問題有關係。自從與以色列簽署和平協議以來，埃及已與以色列國建立了關係。因為邊界和隧道問題，在第二次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的暴動期間，官方的政策導致失望和不滿。親巴勒斯坦的情緒非常強烈：對已經持續了六十多年的佔領和壓迫有著很深的反向。通常情況下，埃及的追隨者們多主張一個“冷和平”，與猶太復國主義國家沒有貿易，沒有聯繫。奧巴馬的當選曾引起了巨大的希望，但有關巴勒斯坦問題的反美情緒又變得強大了。對現行政權與以色列的協議的挑戰尚未放上議事日程。不過，一些政治勢力（左翼，民族主義者，伊斯蘭主義者）將會提出它。

埃及革命有區域和全球層面的影響。重要的不是機械性的骨牌效應，但阿拉伯世界是充滿激情的：也門，阿爾及利亞，約旦，蘇丹，巴林，

今天的利比亞，也許還有摩洛哥，也許還有明天的敘利亞，甚至伊朗！中東和馬格裏布的專制政權害怕會發生什麼。一個真正的“人民春天”在出現。這一波抗議浪潮類似於1989年震撼東歐國家的抗議潮。

還只是開始...

在埃及，獨裁者已經下臺，革命的進程還遠遠沒有完成。這只是剛剛開始。由於帝國主義國家對該政權的支持，其中包括美國，還有不可小視的歐盟和法國的支持，於是，給當局的壓力和支持革命的戰鬥，對於正在埃及進行的鬥爭是很重要的。對現實情況和當前動態的認識，也將挑戰現有的刻板觀念和本地區的恐懼，將對生活在歐洲地區的阿拉伯人產生影響。

社會網路連接的年輕激進者的承諾激起了這一進程。街頭示威造成了這一歷史性的變化。這場革命意味著結束廣義的冷漠和對政治的冷淡，那些冷談通常在一個獨裁的情況下才存在的。

這種民眾浪潮正努力在一些國家爭取更多的民主度，這些國家的經濟自由化削弱了大部分人口的社會狀況，卻不回報以任何形式的自由。革命進程的勝利尚不能確定。民主轉型意味著很多陷阱；它不是在形式上的議會架構中的一個簡單的正常化進程問題，而且這個議會的後臺是軍隊。

這個勝利讓埃及人民自豪，它代表了對恐懼之牆的勝利。它可以作為在中東和馬格裏布各國人民的榜樣。即使還沒有解決任何事，它仍取得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進展。一切將取決於權力的平衡和動員。歷史性的轉變正在進行！

巴黎2011年3月8日

該文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在革命期間發表的許多文章。其所包括的材料來自：卡邁勒·阿巴斯，賈邁勒·維爾，法特瑪·拉馬丹·胡森·al·漢馬拉威，舒克日拉·阿萊，安·阿卜杜勒·拉赫曼，奧馬爾·查菲，雅辛尼·滕拉力，吉伯特·阿奇卡，艾哈邁德·肖奇，喬爾·本甯，左派，非政府組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織及工會網路的聲明，還有同聲援運動參與者的對話。它所表達的看法，並不一定是出版者的意見。

► 舍蒂·凱瑞是參與了阿拉伯地區聲援運動的馬克思主義活動家。

附注:

[1]這一天也是國家員警節，它紀念的是1951年的這一天，當時英國軍隊襲擊並殺死了50個埃及警方人員。

[2]一個龐大的普魯士風格的行政大樓，建於1952年革命前，成為官僚主義的象徵，它在阿德爾·伊瑪目的喜劇電影‘恐怖主義和烤肉串（El Erhab Wal Kabab）’中是永遠不朽的。

[3]該清真寺是一些重要人物的歸宿。

[4]英國殖民主義使用基督教少數作為工具，分裂反殖民主義運動。1919年，強大的爭取獨立的示威加強了這兩個宗教的團結。瑟紀奧神父干預愛資哈爾清真寺的形象顯示一個強有力的象徵。

[5]眾議院和參議院的名稱。

[6]同1981年薩達特暗殺事件有牽連的。

[7]見作者發表在相同網站的獨立工會主義的文章。

[8]在1965年的CPE（有兩個分支）選擇自行解散，加入納賽爾社會主義勢力，該勢力的基礎是衍生自蘇聯的通向社會主義的‘非資本主義道路’的理論。

[9]在20世紀90年代初出現聯合工黨，聚集20世紀70年代左派（共產黨工人黨，1月8日共產黨，共產主義大會黨和Al-Matraqa）的左派。該項目很快就擱淺。

[10]見他們網站<http://www.ctuws.com>。

[11]阿塔哈魯夫 阿 查比。見« i'lân ta'sisi « hezb... » »，開羅，2011年2月26日，« ta'sis hezb al tahâluf al cha'bi »，開羅，2011年2月28日。

[12]工人民主黨。見‘建立中的工人民主黨’，« 'Ummâl masr al qalb al nâbid lil-thawra »，2011年3月2日；« machrou' bernamig Hezb al 'ummâl al dimoqrati - taht al ta'sis »，2011年2月25日

社會運動大會的最後聲明

社會運動大會

2011年，達喀爾世界社會論壇的社會運動大會期間，我們聚集在這裏，肯定非洲及其人民在人類文明建設中的根本貢獻。同時，所有大陸的人民都在努力反對隱藏在經濟進步和政治穩定的虛幻承諾背後的資本統治。讓被壓迫人民完全的非殖民化，仍然是我們世界社會運動的任務，是我們的一個最重要的挑戰。

我們重申我們支持並積極聲援突尼斯，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人民，他們已經行動起來，要求一個真正的民主，並建立人民政權。他們的鬥爭正照亮著通向一個沒有壓迫和剝削的世界的道路。

我們強烈申明我們支持象牙海岸，非洲和世界各國人民爭取他們的主權和參與性民主的鬥爭。我們捍衛所有民族的自決權。

通過世界社會論壇的運作，社會運動大會把五湖四海的我們聚集一起，以便促進共同的奮鬥，推進反對資本主義，父權，種族主義和形形色色歧視的集體議程。

我們正在慶祝社會論壇開辦十周年，2001年論壇首次在阿雷格里港開辦。自那時以來，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共同的工作歷史，取得了一些進展，尤其在拉丁美洲，在那裏，我們已經能夠干預新自由主義聯盟，為真正光榮的公正發展，創造幾種選擇方案。

在這十年間，我們也目睹了一個系統性的危機，這個危機已經擴大成了一個糧食危機，環境危機，以及金融和經濟危機，並加劇了移民和被壓迫性流離失所，加劇了剝削，導致了債務水準和社會不平等的增加。

我們譴責該系統裏主要演員（銀行，跨國公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司，大眾媒體，國際機構，...）扮演的角色，他們不斷追求利潤最大化，執行其戰爭干預性政治，繼續軍事佔領，繼續其所謂的人道主義使命，新的軍事基地，掠奪自然資源，剝削所有民族，並且做意識形態的操縱。我們也譴責他們通過資助服務於其利益的社會階層，拉攏我們運動的企圖，我們拒絕他們使受援者依附於他們的援助方法。

資本主義的破壞性力量影響世界各國人民生活本身的每一個方面。然而，每一天，我們看到新運動的興起，奮力扭轉殖民主義的蹂躪，盡力實現所有人的福祉和尊嚴。我們聲明，我們，人民，將不再為他們造成的危機買單，而且，在資本主義體制內，這場危機無法逃逸。這只是重申作為社會運動的我們，走到一起，建立一個共同戰略以指導我們反資本主義鬥爭的需要。

我們反對跨國公司，因為它們支援資本主義制度，支援把生活公共服務私有化，支援把水，空氣，土地，種子和礦產資源這樣的公共物品私有化。跨國公司與私營公司和雇傭軍訂立合約，以便促進戰爭，他們的榨取做法危及生命與自然，剝奪我們的土地，並且開發轉基因種子和食品，奪走人們的食物權，並破壞生物的多樣性。

我們要求讓所有人享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充分權力。我們要求執行保護地方生產，給農業勞動以尊嚴以及保護祖傳生活價值的政策。我們譴責新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條約，要求所有人都

有行動的自由。

我們將繼續動員，要求無條件取消所有南方國家的公共債務。我們也譴責北方國家使用公共債務施加不公平的政策，降低社會福利狀態。

當八國集團和二十國集團舉行會議時，讓我們在世界各地動員起來告訴他們，不！我們不是商品！我們不要被交易！

我們爭取氣候正義和糧食主權。全球氣候變化是資本主義生產，分配和消費制度的產物。跨國公司，國際金融機構和服務於它們的政府不希望減少溫室氣體。我們譴責“綠色資本主義”，拒絕解決氣候危機的虛偽辦法，如生物燃料，轉基因生物和類似減少森林砍伐和退化的排放量（REDD）的碳市場，它們用虛偽的進步承諾誘惑貧困的人民，對這些人生活了幾千年的森林和土地做私有化和商品化。

我們捍衛糧食主權，捍衛反對氣候變化的科恰班巴人民峰會達成的協議，在這個會議上，來自世界各地的社會運動和組織擬訂了應對氣候危機的真正替代方案。

讓我們動員起來，我們大家，特別是非洲大陸的人，在南非德班17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會議期間以及在2012年的《Rio+20》（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關於可持續發展的聯合國大會）會議上，重申人民和大自然的權利，阻止非法的坎昆協議。我們支持可持續的農民農業，這是真正解決糧食和氣候危機的辦法，它讓所有工作在其中的人能夠使用土地。正因為如此，我們呼籲動員群眾，停止土地佔有行為，支持地方農民的鬥爭。

我們反對施加在婦女身上的暴力，這些行為常發生於被軍事佔領的區域，也反對參與社會鬥爭的婦女被判罪而被施以暴力。我們反對針對婦女犯下的家庭和性暴力，其原因是她們被認為是物體或商品，因為她們的身體和頭腦的主權是不被承認的。我們反對買賣婦女和兒童。我們呼籲世界各地的人們動員起來，打擊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我們捍衛性別的多樣性，性別的自決權利，我們反對一切同性戀歧視和性暴力行為。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我們爭取和平，反對戰爭，反對我們土地的殖民化，佔領和軍事化。

帝國主義列強使用軍事基地引發衝突，控制和掠奪自然資源，並支持反民主的措施，就像他們在洪都拉斯搞政變和軍事佔領海地那樣。他們在阿富汗，伊拉克，剛果民主共和國和其他許多地方推動戰爭和衝突。

我們必須加強反對鎮壓人民鬥爭的行為，反對把人民鬥爭污名刑事化的行為，加強人民之間的團結和行動，比如全球抵制以色列的撤資和制裁運動。我們還要針對北約進行鬥爭，要禁止所有核武器。

這些鬥爭中的每一個意味著一場思想戰鬥，在這個戰鬥中，沒有民主化的交流，我們就不可能取得進展。我們申明，建立另一種全球化是有可能的，這個全球化來自人民並由人民掌管，有青年，婦女，農民和土著人民的重要參與。

社會運動大會呼籲，在國際協調一致的基礎上，所有國家的所有勢力和民眾展開兩大運動，參與人民的解放和自決，加強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

受到突尼斯和埃及人民鬥爭的鼓舞，我們呼籲把3月20日設為支持阿拉伯和非洲人民起義鬥爭的國際聲援日，他們的每一個進步都支援著各國人民的鬥爭：巴勒斯坦和撒哈拉人民的抵抗；歐洲，亞洲和非洲反對債務和結構調整計畫的運動；以及所有拉丁美洲正在進行的改變過程。

我們也呼籲把10月12日定為反對資本主義的全球行動日，到時，我們以無數的方式表達我們對一個制度的反對，這個制度在摧毀其道路上的一切。

世界社會運動，把我們推向全球性的團結一致，要粉碎資本主義制度！我們一定勝利！

“這場危機結合氣候和糧食危機”

‘紅色’雜誌採訪 弗朗索瓦·切斯奈斯

“氣候變化的推進速度，影響最貧窮和最脆弱的國家的人口，使他們遭受幾方面的聯合影響，這幾方面是世界經濟衰退，全球變暖和農業政策對眾多國家的影響。”



上周的紅色雜誌的焦點在法國和其他地方的銀行舒困案

問：目前的危機，同在過去二十來年的那些危機有什麼不同？

答：這場危機正在結合全球社會危機原有的非常嚴重的層面：即南方的氣候危機和糧食危機，造成危機的原因是農業領域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以及汽車展銷大廳的力量，使其惡化的原因是基本商品的期貨市場的投機。一個文明危機的這些層面和經濟金融危機之間的融合將給予這個危機一些具體特點。此外，同以往任何時刻，甚至是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刻相比，在更大的程度上，這次是一個世界性的危機。

問：是什麼組成了該危機的這個全球特性呢？

答：它的震中在美國和英國，金融全球化的關鍵國家，其虛擬資本擴大的專門運動敗壞了信貸系統。價格的小型崩潰和極度動盪，通過我們所謂的“消極預期”，把危機蔓延到企業以及家庭。另外的非常嚴重的後果，是嚴重壓縮依據於證券交易股票的養老金。由於信貸癱瘓，危機蔓延到習慣於訴諸個人信用或被迫這樣做的公司和家庭。以房地產和抵押貸款為引擎推動2002-2007年人為增長的國家，它們的這些機制走得比較超前，那些地方的養老金同

金融市場的連接發展得最廣泛。不過，沒有一個老牌工業化國家得以逃脫。股票交易與直接投資的密切關聯，是自由化的結果，它意味著衰退結果在各經濟體之間傳播。

問：所謂的“新興”國家在危機的發展中將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答：中國併入世界貿易組織就已助長了危機的準備。世界工業後備軍的質的擴大是資本和勞工，以及“剝削的上升趨向”（見蜜雪兒·松）之間的力量關係變化的支柱之一，這是一個世界的進程。我們經常聽說，新興國家同危機脫鉤以及認為它們具有相當的危機免疫力。這是錯誤的。美國和歐洲開始的經濟衰退已經導致了日本和中國出口增長的放慢。我們已經看到其在德國的機器出口，在如阿根廷一類國家的農產出口上的反響。中國“野蠻資本主義”捲入了工廠，基礎設施，辦公室和住房的投資競賽中，其標誌是馬克思常說的無政府狀態的競爭。以撒·約書亞回顧說，1929年至1933年的危機有兩個極點，美國和德國。這一點可能是相同的，即亞洲和中國成為生產過剩危機的未來震中。有兩手“新牌”，一個在美國，一個在中國，毫無疑問可以阻止它。它們會要求在這兩個國家，組成一些旨在重大的財富再分配的社會集團。那樣做的政治條件是遠未存在的。在統治階級，占主導地位的思想是，只要作一些小的改進，仍然有可能保持現有系統一如既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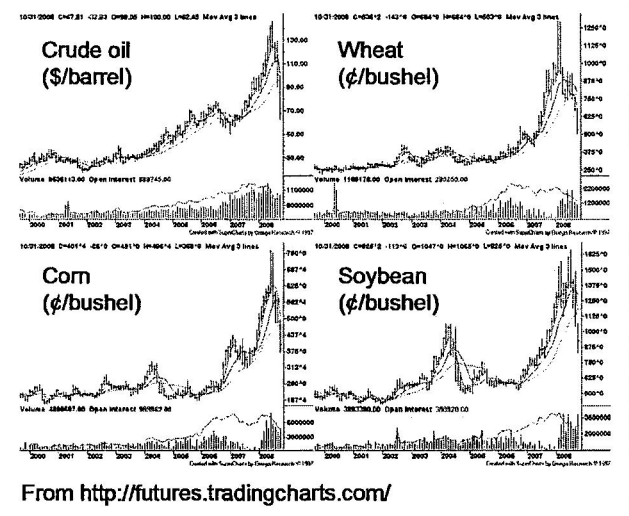
問：您談到與生態危機的關係。你能多說一些嗎？

答：氣候變化的推進速度，影響最貧窮和最脆弱的國家的人口，使他們遭受幾方面的聯合影響，這幾方面是世界經濟衰退，全球變暖和農業政策對眾多國家的影響，目前，這個挑戰文明的問題，被處理成彷彿是一個維持秩序問題。但是，在某些國家，聯合影響無疑將是如此之大，以致它將從經濟上反彈，惡化經濟衰退，並引發被剝削者群眾的反應。這次採訪刊登在‘紅色’（第2271期，2008年10月23號），LCR週報，第四國際法國支部期刊。

► 弗朗索瓦·切斯奈斯，ATTAC法國科學理事會成員。

石油糧食價格的衝擊

邁克爾·T·克雷爾



未來，當歷史學家試圖追查目前中東動盪的起源時，他們會發現，在諸多憤怒的爆發中，最早的一個發生在阿爾及利亞，肇因是食品價格的上漲。1月5日，在阿爾及爾，奧蘭和其他主要城市，年輕的抗議者們封鎖道路，襲擊警察局和燒毀商店，示威抗議食品價格的飛漲。其他的關切---高失業率，腐敗成風，缺乏住房---也引起他們的憤怒，但食品價格是首先的動因。

當年輕人的抗議中心移動時，首先移到突尼斯，然後到埃及和其他國家，這時糧食價格問題會服從於更明確的政治要求，但它永遠不會消失。事實上，食品成本上升一直是約旦，蘇丹和也門反政府示威活動的主題。隨著大多數主食價格的持續攀升 ---同時出現的石油費用的飛漲也部分地刺激了它 ---更多這樣的抗議是必然會發生的。

在這些國家，糧食價格上漲的問題關係重大，因為這些年來，絕大多數人已經被排除在由獨裁暴君的親屬和親信所享有的炫人財富之外，而且一個家庭的食物佔據著其大部份的開支。當食品價格急劇上升時--- 在過去六個月中，一些主

食上漲高達百分之五十--- 只能勉力生存的家庭因而陷入了赤貧危機。“政府在侮辱我們，”阿爾及爾的一位年輕抗議者說。“他們提高糖價。我們卻必須要付房租，電，水，糖和油。我們大家都貧窮。”

巨大的諷刺是，這些國家中的許多是石油生產國，隨著近期石油價格的上漲，他們的國家收入都有大幅的增長。這些國家的少數居民享受石油收入的實際利益---這往往隱藏在統治家族的外國銀行帳戶中---這一點暫且不論，可是，上漲的石油價格實際上使大多數普通人的情況更糟糕，因為每一次石油價格的增加都伴隨著基本食品價格的相應上升。

那麼如何解釋石油價格和食品價格之間的密切關係呢？在增加收成以養活不斷增長的世界人口的努力中，農民越來越多地依賴石油完成其基本工作。這種趨勢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農業機械化以及20世紀60，70年代的綠色革命。它繼續於轉基因生物的引進和企業經營型的工廠式農場的擴展。石油推動發展了農業機械以及運送農作物到市場（有時超過數千英里）的車輛。它也用作為高科技農業中的農藥，除草劑和化肥的化學前體或“原料”。因此，石油價格的任何增加都會轉換成糧食生產成本的上升。

在2007-08年度，相關性變得特別明顯，當時石油和糧食價格達到了創紀錄的水準，助長推動了大衰退。在2007年7月至2008年6月間，原油上漲，從每桶75美元升至140美元，增加了87%，在同一期間，基本食品價格也飆升，“食品價格指數”（以100元代表2002-04主要糧食的平均成本）從大約160美元升至225美元，這個數字是聯合國糧農組織（FAO）計算出來的。2009年世界銀行下結論說，這個時候石油和食品價格的同步上漲

是不足為奇的，因為“農業生產是相當耗能的。”不斷上漲的石油價格“提高了動力機械和灌溉系統的燃料價格；它也提高了化肥和其他密集耗能型生產的化學品的價格。”

更糟的是，石油價格上漲 --- 加上政府努力解決全球變暖問題 --- 增加了發展生物燃料而不是糧食的誘因，從而不可避免地抬高了糧食價格。當石油價格上漲到每桶50美元以上時，世界銀行斷定，石油價格每增加百分之一會導致玉米價格增加0.9個百分點，“因為石油價格每一美元的增加，都會增加乙醇的盈利能力，因而增加生物燃料對玉米的需求。”那麼，這就毫不奇怪了，自2004年以來，三分之二的世界玉米產量的增加，都是為了滿足美國對生物燃料增加的需求，並不是滿足世界不斷增長的對食物和動物飼料的需求。



2008年食品價格的大幅上升，導致十多個國家，包括埃及，海地和巴基斯坦[見沃爾登·貝洛，“製造食品危機，”發表在‘國家’雜誌 (<http://www.thenation.com/article/ma>)，以及發表在ESSF上的文章：如何製造一個全球性的糧食危機：來自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里德·琳賽的經驗總結，“海地的‘死亡計畫’，” (<http://www.thenation.com/article/ha>) 2008年6月2日]的騷亂。因為要極力避免更多的此類動盪，八國集團在其2009年的義大利拉奎拉會議上，承諾在接下來的三年中，捐贈200億美元幫助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發展。然而，到2011年初，給出的捐助不到該承諾的二十分之一，對於增加全球糧食產量的推動甚微。現在，隨著石油價格再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次上漲，食品價格很可能將超過以往所有的記錄，並引發世界各地更多的動盪。

我們看到的，實際上是一個惡性循環，油價上漲抬高了食品的成本，從而引發石油生產國的政治動亂，而這反過來又推高原油價格，把食品價格推得更高，等等，如此迴圈，沒有結束的跡象。

此外，由於氣候變化的加速作用，這種致命的迴圈正在擴展。儘管幾乎不可能把任何特定的天氣事件歸因於全球變暖，但日趨頻繁和嚴重的事件 --- 包括去年夏天，發生在俄羅斯和烏克蘭的乾旱懲罰，最近澳大利亞的洪水和最近為害中國北方的旱災---符合氣候變化的模型。這些事件都發生在重要的小麥產區，加深了對糧食供應不足的恐懼，從而進一步推動了食品價格的攀升。

食品價格上升所產生的憤怒，可能被北非和中東最近爆發的政治問題掩蓋，但它幾乎不可能消失。自從二十年前糧農組織開始編纂糧食價格指數以來，目前全球糧食價格已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而且預計它們會繼續隨石油成本一起攀升。這表明，兌現八國集團在2009年做出的提高發展中國家農業的承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就像增加基本食品的供應和人們食物購買能力的其他措施一樣。這表明，兌現八國集團在2009年做出的提高發展中國家農業的承諾，就像增加基本食品的供應和人們食物購買能力的其他措施一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但是，最終一切都取決於石油，所以我們必須大幅削減石油產品的消費，以降低食品和燃料的成本，減緩全球變暖的步伐。我們還必須永久結束支撐外國石油獨裁者的做法。 2011年3月10日

該文發表於2011年3月28日版的“國家”雜誌：
<http://www.thenation.com/article/15>

是誰決定我們吃什麼？

埃斯特·威瓦斯

今天，農業正在日益轉化為一個商品工業，這是不可否認的現實。天然資源的私有化，結構調整的政策，農民的逐步消失，以及糧食系統的產業化，把我們驅向目前的糧食危機。

在這種情況下，是誰在決定我們吃什麼？答案是明確的：是一小撮農產食品業的跨國公司，它們依靠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的幫助，終於把其私利凌駕於公眾的需要之上。因此，我們的糧食安全受到了嚴重威脅。

各國政府和機構，如8國集團，20國集團，世界貿易組織等，對於基本食品的價格上升及其對較貧困人民的影響，表示擔憂，正如他們在2008年的國際首腦會議期間所表演的那樣，而這個擔憂只不過顯示出其根深蒂固的偽善。他們從當前的糧食和農業模式中獲取大量的經濟利益，以此作為對全球南方國家做政治經濟和社會控制的帝國主義工具。

正如農民之路國際運動在2009年11月羅馬糧農組織會議結束時所指出的：“八國集團的國家元首缺席會議，是這個首腦會議可悲失敗的關鍵原因之一。沒有採取具體措施消除饑餓，停止食物投機或阻止農業燃料業的擴張。”同樣，作為農業和糧食安全及世界銀行食品安全信託基金的全球夥伴關係的承諾，已獲得20國集團和八國集團的明確支持，這也指出了一點，即我們的食物供應，再次落在市場的手中。

然而，根據農民之路的說法，糧農組織的世界糧食安全委員會（CFS）的改革，是邁向農業和環境決策過程的民主化的一步：“至少這方面的工作尊重民主的基本規則，其原則是‘一國一票’，它給公民社會提供了新的機會”。不過，我們仍然必須檢查世界糧食安全委員會（CFS）的實際影響。

壟斷：農產食品鏈在其整個線路中都服從高度的業務集中。從其第一環節種子開始，我們可以觀察到10家最大的公司（如孟山都，杜邦，先正達，拜耳...），根據ETC小組（the Group ETC）的資料，這些公司控制了其銷售額的一半。知識產權

法讓這些公司獨家佔有種子的知識產權，更激發了該行業的經營集中度，並損害了農民維護本土種子與生物多樣性的權利。

種子產業同農藥密切相關。最大的種子公司也主宰這個行業，因而這兩種產品的開發和市場行銷非常頻繁地連在一起。此外，農藥行業的壟斷也是超強的，十大跨國公司控制了全球84%的市場。這相同的動態，在食品分發行業，在飲料和食品加工行業也能觀察到。它是戰略，因此必然會加劇。

就像其他行業一樣，大規模零售行業註定了一個巨大的商業集中。在歐洲，1987年至2005年間，十個規模最大的零售業跨國公司的市場份額為總額的45%，而且它們可能在未來的10-15年內達到75%。在如瑞典這樣的國家，三個連鎖超市控制大約95.1%的市場份額；而在諸如丹麥，比利時，西班牙，法國，荷蘭，英國和阿根廷這些國家，少數的公司控制45%到60%之間的市場份額。大規模的融合是常態。這種壟斷和集中具有強大力量，會確定我們買什麼，確定產品的價格，它的起源，以及它們是如何被描述的。

從饑餓中獲取利潤：在糧食危機中，主要的農業食品行業跨國公司公佈了盈利數字。主要的種子公司，孟山都和杜邦，宣佈其2007年的利潤，分別比前一年增長44%和19%。化肥公司的資料也指出相同的情況：加拿大薩斯喀徹爾鉀鹽公司，挪威亞拉礦物質肥料公司和中國化工進出口總公司，在2007年和2006年之間，它們的利潤增長分別高達72%，44%和95%。如雀巢這樣的食品加工業，也經歷了它經濟收益的上升，還有，諸如特易購，家樂福和沃爾瑪這樣的超市，其收益也在增加，而在世界上卻還有千百萬人得不到食物。

該文發表於‘對角線’，第115號

▀埃斯特·威瓦斯是龐培法布拉大學社會運動（CEMS）研究中心的成員。她的西班牙文著作包括“站起來反對外債”、“不用感謝超級市場”和“公平貿易朝哪裏去？”（合著）。她也是‘南風’雜誌編輯委員會成員。

往事回顧與團結新聞

皮埃爾·魯塞

3月11日，日本東北群島遭到了地震和海嘯的襲擊，面對其後果，日本經歷了多方面的危機。福島核災難，對發展的能量模式提出了問題。在對僵化的政治系統進行改革方面，政府的無能使得這些嘗試失敗了。經濟後果還很難評估，但它們必是沉重的（債務等等）。至於社會損害方面，它們肯定會很嚴重：富人會盡一切努力，確保這一危機---像其他危機一樣---由社會底層買單；他們將藉口緊急狀態，進一步損害工人和窮人的權利。

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社會運動（此處作為一系列積極的運動）支離破碎，分門列派，往往植根於地區的現實情況，但沒有任何全國行動的能力。目前的危機，能重新凝結多方面的抵抗，產生強有力的鬥爭，就像1960-1970年的最後一次那樣，為全群島提供另一方案嗎？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雖然日本是第一個非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強權，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中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今天的第三，僅次於美國和中國），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它被整合為美國東亞地區的地緣戰略模式中的從屬者。

從1945年起，勞工運動是由日本共產黨（JCP）的全日本產業聯盟大會（Sanbetsu）推動的，但社會的激進化過程，因為早在1947年的總罷工的取銷而被阻止。隨著冷戰，反共鎮壓和朝鮮衝突的開始，1950年以後，社會主義Sohyo（日本工會總評議會）工會聯合會主導了工會運動。十年後，這時圍繞著美國在印度支那軍事行動的升級，新一波的激進化成形了。但它再次受挫於20世紀70年代後半葉。

20世紀60年代的遺產

這一時期出現的社會運動，深深地打著激進主義和失敗挫折的標誌。

工會：Sohyo（日本工會總評議會）聯合會在公共部門特別強大，而同Domei（同盟通信社）有關聯的極右翼工會，通常只是一些僅能夠在大型私營公司運作的組織。在20世紀90年代之交，Sohyo（日本工會總評議會）和Domei（同盟通信社）讓位給一個單一的聯盟Rengo（日本工會總聯合會，JTUC）。

這個合併是為右翼的利益而進行的。與日本共產黨（JCP）相關的組織Zenroren（全國工會聯合會NCTU），社會主義左派和極左翼形成了自己的聯合會，這是非常小的組織，就像Zenrokyo（全國工會理事會NTUC，有13萬會員）或者全國跨專業工人聯盟（NUGW）一樣。

政治：在中蘇衝突時，日本共產黨（JCP）先是宣佈自己傾向北京，然後“中立”，從而延誤了毛派組織的形成。因此，在60年代初，新左派主要是托派或盧森堡派。日本激進左派非常好鬥，被視為世界各地青年反帝浪潮的榮耀之一。不幸的是，它因為鬥爭的衰落而削弱了，並且不斷受到員警的騷擾，它的一些主要組織陷入自相殘殺的紛爭（uchigeba）中。日本的社會民主黨從來沒有提出過一個替代右翼統治的方案。至於日共，它主要是地方性的。近幾十年來，政治左派在日本只有些邊際影響。

農民：日本農業基本上由小農場組成，右翼總是在這裏尋求選舉顧客。然而，在1966年到1978年，這一時期的主要鬥爭之一是由農民進行的，他們反對在東京以北的成田興建國際機場。阻止剝奪農民，拒絕專橫的發展模式，譴責日本在印度支那空戰中的角色，所有這些壯觀地結合在一起，組成激進運動，不斷地對抗成田市的鎮壓勢力。

婦女：在很大的程度上，婦女的平等權利，是在1947年由美國佔領者制訂的憲法中正式得到承認的。但是，“第二波”女權主義浪潮早已在日本掀起，當時是學生激進化期間，尤其側重於爭取這些權利在勞工界（與激進左派有關）的實現，或者為家庭婦女爭取這些權力，從而引發起各種不同的傳統：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生態女性主義等等，而不是走向一個廣泛的自主而一致的婦女運動。

反戰運動：拒絕以前的軍國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和平主義在日本發現了真正的文化背景。在1960-70年代，它導致了一個強大激進的，反帝國主義，反對日美安全條約（AMPO）的運動。雖然全

國動員水準下降，但圍繞著大型美軍基地，特別是在該群島南部的沖繩（2010年4月25日有90,000示威者），抵抗一直在持續。

環境: 在70年代，資本主義的瘋狂發展把公眾健康置於毒化的環境中，這個時候，生態問題的重要性被特別提了出來。最著名的例子是“水俣病”（Minamata），一個化工廠（Chisso）把汞排放入海，造成沿海地區的致命污染，Minamata就是該地區的名字，為反對它，進行了一個長期的群眾鬥爭。

在全球化背景下:在1960-70年代（“火熱年代”）的積極一代人和現今當代人之間割痕最深的國家中，日本可能就是其一，抵抗的持續性主要發生在局部地區，涉及許多問題：美國基地，核電站，社會互助網路，工業區的工會網路，環保，生活方式等。

新自由主義 工人運動證明它無法應付20世紀90年代新自由主義攻勢。今天，風險很大，因為大雇主會抓住3月11日海嘯和福島災難開啓的危機機會，更多地挑戰社會權利。但是，在衰退時期，無論是在國民運動方面還是在主導的工會主義（移民，小企業）所遺棄的領導領域方面，激進的工會已經積累了在地方一級的各種組織經驗。

同樣，因為農產品自由貿易邊界的開放，農民受到虛擬消失的威脅。這種威脅在國際層面上促進日本農民運動（Noumiren）和農民之路（Via Campesina）之間有更密切的關係。

國際:全球正義運動的其他成員，比如人民計畫 Japonesia（多元化日本）或阿塔克（Attac，課征金融交易稅以協助公民的組織）的出現，其規模不同於其他國家的情況。就像在2008年7月北海道八國集團期間那樣，日本是反首腦會議的積極主辦者。日本組織參與全球論壇以及亞洲網路，但這種參與受限於語言障礙（雖然年輕人講西方語言比他們的父母多）。

日本運動在東北亞聲援運動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例如在保護臺灣或韓國或臺灣勞工（前殖民地）方面。或從人民和非統治者理念的角度，發展國際安全在這方面也有作用，例如在2000年沖繩八國集團會議上。

在人道主義災害的背景下: 日本處在四個大陸板塊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的交匯點，時刻擔心能摧毀東京的那類大地震的發生。2011年3月11日的9級強烈地震，帶來了一個超常的海嘯和福島災難。就目前來說，唯一的好消息是，日本的建築物很不錯地經受了地震衝擊。海嘯破壞了海岸，日本人民正面臨著的核災難，可以同烏克蘭切爾諾貝爾核災難（1986年）相比。

核電: 儘管對於廣島，長崎--- 美國所犯下的規模最大的戰爭罪行 --- 的記憶猶在，日本就像法國一樣，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在那裏，精英們的（民用）“核共識”像鉛一樣地重壓在社會上，窒息任何挑戰。切爾諾貝爾事故引起的反核運動的浪潮，今天得已恢復。這種情況首先發生在各地區，從人民抵抗到重新要求關閉核反應爐，還有公民抗議，例如今年的4月10（17,500人在東京示威）。

社會後果: 海嘯（自然災害）和福島（人為災害）的社會後果是災難性的：成千上萬的人撤離，經歷恐懼，驚慌失措；一些員工可能會看到自己失去工作，他們的企業已經損毀或處在放射性威脅區；受污染地區的農民和漁民不能再生產任何東西，我們不知道，核危機會加劇惡化到什麼程度，放射性會蔓延到什麼地步。

社會運動已經學會在災害情況下如何行動，1995年阪神大地震中全國工會聯合會NCTU的作為就是一例。不過，這是戰後第一次，他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巨大的危機局勢。他們需要我們的幫助。

國際主義: 我們知道，近年來世界上有許多人道主義災難。在美國新奧爾良災後（2005年），日本今天的經驗證明，即使受影響的國家是經濟大國，聲援仍然是必要的。在發生危機時，不平等被放大了，如果社會運動沒有辦法來保護他們，那麼窮人將為災難買單，而對災難負有責任的並不是他們。

我們必須能夠促進自己的人道主義援助觀念，它與政府的觀念無關，援助要回應緊急情況，直接向窮人送出救援，提出更廣泛和更可持續的社會問題，加強基層第一線的組織，捍衛最貧窮者的權利。戰鬥團結，從社會運動到社會運動，對我們來說確實是一個國際主義義務。

►皮埃爾·魯塞是第四國際領導成員，特別參與了亞洲聲援運動。他是法國反資本主義新黨（NPA）的成員。

歐內斯特·曼德爾全傳

邁克爾·洛伊

這是關於1945年後第四國際的主要領導人和理論家的第一次系統性傳記，正如塔里克·阿裏在其序言中指出的，曼德爾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有創造力的、獨立的革命思想家之一。



邁克爾·洛伊

作者是一位荷蘭歷史學家(本書2007年初版于荷蘭的安特衛普)，他的研究不僅基於龐大的文獻書籍，還立足于大量同以前的朋友和同志的個人訪談，尤其是曼德爾個人檔案裏的資料。這是一項了不起的工作，它把歷史學家的嚴謹，他對所論個人的明顯同情，以及防止偏頗立論的明晰而必要的距離結合起來了。

本書章節的排列，一部分按照時間順序，一部分按照主題論點。1923年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的一個具有安特衛普(比利時)文化背景(非虔誠的)的波蘭猶太人家庭，13歲的年輕的以斯拉(後來的歐內斯特)在閱讀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時，認識了社會主義！隨後，他指出：“我一生的政治思想當時就明確的形成了”。莫斯科審判後，他的左翼父親，亨利·曼德爾更加接近比利時托派圈子裏的德國難民。然後，1938年15歲的以斯拉，加入了第四國際比利時支部，革命社會主義黨(PSR Parti Socialiste Révolutionnaire -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戰爭與納粹佔領比利時，並未使他氣餒，他加入了抵抗運動，並在1943年1月首次被捕，由於獄卒的一時疏忽而僥倖逃脫。

他經常為面向德國士兵的秘密德文報紙“自由言論報”(“Free Speech”)撰稿，這裏是他在1943年9月寫的：“納粹罪惡殺手把波蘭人，俄

羅斯人，猶太人看作是“次級人類”，正在消滅幾十萬無辜的和被遺棄的男人，婦女和兒童，...這是文明人類所不能容忍的！你們每一個，德國士兵，如果不抗議這些罪行，而寧願保持沉默，那就是共犯。你們不可以躲在像“服從命令”或“士兵責任”這樣的論點後面而置身事外...你的任務是制止納粹獸性：瘋狗必須拴鎖起來！” 1944年3月再次被監禁，被驅逐到德國，從一個集中營轉送到另一個，1944年7月，他再次逃脫，但不久即被再次抓獲，直到1945年3月才被美國軍隊釋放。曼德爾積習已久的樂觀主義---有時伴隨著某種盲目性---可見於以下他遭驅逐時的態度的證詞中反映出來：“我很高興被驅逐到德國，因為我將置身於德國革命的中心”！這種對德國革命的頑固信念---繼承於經典馬克思主義---從未放棄，一直到1990年。

在1944年至1946年，歐內斯特·曼德爾確信歐洲革命迫在眉睫：資本主義已經達到了死亡痛苦的最後階段，正如托洛茨基1938年指出的那樣。一點一點地，他慢慢地勉強接受了革命浪潮消退的現實。

遵循第四國際採取的“深入滲透”的策略路線，1951年他加入比利時社會主義黨，但保持其作為一個托派領導人的秘密身份(他在第四國際出版社編寫的卓越文章，是以筆名“E.格爾曼發表的)。1956年，在工會活動家安德列·雷納德和舊社會黨領導人卡米·斯曼的支持下，他創辦了週刊《左派》；合作者有皮埃爾·納維爾，莫里斯·納多，拉爾夫·米利班德，勒利奧·巴索和易格納左·斯隆。通過激發反資本主義的“結構改革”的辯論，該期刊對比利時社會主義和工會左派發揮真正的影響。曼德爾作為一個歐洲激進鬥爭的未來先驅，對1960年至1961年冬季的比利時總罷工---被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亞迪斯視為“戰後工人運動的

最重要事件” --- 作了分析。1964年社會黨對“左派”雜誌的禁止，迫使他離開並建立社會主義左派聯盟，但收效甚微。

在比利時活動的同時，“E.格爾曼”埋身於理論工作---他的第一個重要著作《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1962年），是這個時候對歷史經濟理論的一種難得嘗試。他積極參加第四國際的內部鬥爭，一定程度地支持巴布洛的論點：面對“來臨的戰爭”，滲透進各個國家群眾性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工人政黨，是必要的。以專制的方式，強行進入第三國際法國支部共產黨的企圖，導致了法國，隨後在國際內部的分裂。斯圖特吉謹慎地作評論，並不掩飾他的驚訝：“爲什麼如此過度集中？爲什麼要強迫？”在他看來，“E.格爾曼”寧願犧牲自己的意見，以保持與巴布洛一致。只是在1963年，在曼德爾和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前黨領袖詹姆斯·P.加農的友好會見後，第四國際的團結才得以恢復（至少部分恢復）。在再統一大會期間（1963年）“E.格爾曼”闡述了關於世界革命的三個部分的論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殖民地革命，東歐國家的政治革命---這打破了巴布洛1962年在阿爾及爾提出的第三世界主義。

這並不意味著曼德爾對第三世界，特別是拉丁美洲沒有興趣。1964年，他應邀前往古巴，會見了切·格瓦拉，並制定了對查理·貝特爾海姆的論點的回應，爲中央計劃辯護，反對“市場機制”和價值規律的主導。計劃同格瓦拉的第二次會見，應後者的要求，原定於1965年在他訪問阿爾及爾期間，但未能成功。當曼德爾1967年再次訪問古巴時，切·格瓦拉已經前往玻利維亞。在他去世消息的發佈會上，曼德爾宣讀了對“一位偉大的朋友，一個出色的同志，一個英雄的戰士”的敬拜悼辭。

1968年5月曼德爾在巴黎，5月10日晚，參加拉丁區中心的蓋·呂薩克街的路障設置，伴同他的有吉塞拉·舒爾茨（社會主義德國學生聯盟的年輕舌動家，曼德爾與她於1966年結婚），以及革命共產主義青年團（JCR）的法國同志（阿蘭·克裏維納，丹尼爾·本薩義德，亨利·韋伯，皮埃爾·魯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塞，珍妮特·阿貝爾）以及拉丁美洲訪客：第四國際阿根廷支部，阿根廷工人革命黨（PRT "Workers' Revolutionary Party"）的主要領導人羅伯托·桑圖喬。

稍後，在1969年第四國際第九次世界大會上，在曼德爾的支持下，以多數票通過決議，決定在拉丁美洲採納武裝鬥爭戰略。斯圖特吉再次懷疑曼德爾爲了團結而犧牲他的個人意見，這次是與法國共產主義者同盟和拉丁美洲團結一致，以便有利於新的進程。我是此事的在場人，我不同意這種分析（事實是，從1974年起，曼德爾才同這一戰略幻想保持距離。我記得第十次世界大會期間，同他有過非正式討論，在那裏，我爲我們在“阿根廷工人革命黨 的紅色派別 ” 的同志的“政治軍事”方向作辯護---由於托洛茨基主義，這些人被桑圖喬驅逐---歐內斯特認爲他們註定要失敗的。當然，他是正確的）。

這些年來，曼德爾完成了他一些最重要的著作：《馬克思經濟思想的形成》（1967年）和《晚期資本主義》（1972年）。後者也許是他最有影響力的書，儘管他的一些朋友有所遺憾，在該書對當代資本主義不同方面論述的卓越篇章之外，卻欠缺了綜合性觀點。這一時期的其他重要著作，包括新左派評論上的托洛茨基同尼古拉·克勞紹的辯論---它大大地把編輯吸引到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一方---以及《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解釋》（1980年），該著作是根據在劍橋大學的著名演講而編成的。

曼德爾對反叛青年一代的影響最大，他被禁止進入包括法國、美國和德國在內的5個國家。有關禁令，德國內政部長漢斯·迪特里希·根舍是這樣說的：“曼德爾教授不僅在他的教學中支持不斷革命學說，而且積極爲後者工作”。卡羅拉和恩斯特·布洛赫（德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歐內斯特和吉塞拉的親密朋友，這個時候寫信給他：“如果他們那麼害怕你，那你一定是一個巨人！你是統治階級的頭號敵人”。應該說，這一禁令並沒有阻止他幾次秘密進入法國，比如1971年，在拉雪

茲神父墓地召開的第四國際紀念巴黎公社100周年會議上，他面對2萬人，作了令人難忘的講演。

1979年，他的朋友魯迪·杜奇克去世，而更厲害的是---在悲慘情況中---他的伴侶吉塞拉在1982年的狀況，對他是嚴重的個人打擊。斯圖特吉沒有隱藏他對曼德爾無法同吉塞拉溝通並幫助她面對感情危機的批評。一年後他娶了比他小30歲的安妮·斯普里蒙特，她的堅定和獨立精神大為有助於他。此時，大多數的第四國際新一代領導人相信，在68年5月開始的週期已經結束，特別是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左派的失敗以後，但曼德爾難以接受這一新的現實：在第11次世界大會（1979年），他曾許諾，下次大會將在解放了的巴賽隆納舉行。

曼德爾一直想成為一名歷史學家---是巴布洛說服他關心政治經濟學的---但是到1986年，他終於發表了第一部歷史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意義》。雖然這無疑是一部創新和有智慧的作品，但我不認為這部作品考慮到最終解決方案的特殊性。他在1990年發表的一篇重要文章---已收入在他的德文版著作裏---〈納粹大屠殺的物質、社會和思想場所〉，只在這以後才受到批評。

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的改革，將振興厚望寄予曼德爾和迫在眉睫的“政治革命”的期待上；沒有考慮到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在令柏林牆倒塌的1989年11月東柏林大示威期間，他的熱情應會更大，他目睹這一切。他認為，這是因羅莎·盧森堡被害而挫敗的德國革命的復蘇，而且無論如何，是“如果不是西班牙革命以來，也是自1968年5月以來，歐洲的最大運動”。1990年以後，隨著德國統一和重新建立東德的資本主義，他應會感到失望。

儘管失望，曼德爾還是再出版一些重要著作：《權力和金錢，關於官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左派》，倫敦1991年），是關於官僚主義的社會根源的分析，以及《托洛茨基綱領》（《左派》，1995年），兩者都承認羅莎·盧森堡對布爾什維克批評的合法性，和1920至21年托洛茨基“代替主義”趨勢。在他的最後幾年，曼德爾用“社會主義還是死亡”的末世論取代典型的“社會主義還是

野蠻”兩難論；資本主義正在通過核戰爭或生態環境破壞導向人類的毀滅。不像斯圖特吉，我不認為這等於“狂熱救世主”論，反而是對危險的清醒估計。

斯圖特吉正確的指出，曼德爾有把身體和精神分開的傾向，導致一個非常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太多食物，沒有運動。在1993年心臟病發作後，他不得不減少活動；他還是同意---不理會他朋友們的建議---參加1994年11月在紐約進行的辯論，辯論對手是“托派”支部，專門攻擊第四國際的斯巴達克同盟，對他們的謾罵，他發表了長篇回應。斯圖特吉引用了這個時候我發給歐內斯特的一封信：“因為你的論戰，這個不起眼的美國托派將只留在工人運動的回憶裏”。他最後的政治活動是在1995年6月的第四國際第十四次大會上。不久，7月，他死於心臟病發作。他的葬禮，9月在佩爾-拉雪茲神父墓地舉行，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許多人。

最後，斯圖特吉對歐內斯特·曼德爾的非凡智慧和文學素質，以及他對人類的創造力和團結的無限信心致敬。他引用我自己對他的“人類樂觀主義”的意見，他相信人類抵抗不公正的能力。但在我看來，傳記並沒有考慮到我以下的意見：在他，意志的樂觀並不總是被補償以心靈的悲觀情緒（見M.羅伊，《歐內斯特·曼德爾的遺產》中的《歐內斯特·曼德爾的革命人道主義》一文，吉伯特·阿齊卡主編，《左派》出版社，1999）。

在任何情況下，從這一優秀作品的作者那兒，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以他拒絕宿命和絕不放棄的頑強精神，曼德爾仍將是子孫後代的一個榜樣。

*簡·威廉·斯圖特吉，《歐內斯特·曼德爾：一個反叛者遲來的夢想》，倫敦2009，《左派》（克里斯多夫·貝克和彼得·德魯克翻譯），392頁。

邁克爾·洛伊是巴黎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社會學研究部主任。他擁有多部著作，包括《切·格瓦拉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與解放神學》，《祖國或地球母親？》《眾神的戰爭：拉丁美洲的政治宗教》。

復仇的情緒不會因本拉登的死亡而結束 ---巴基斯坦左翼的觀點

法魯克·塔里克

在暗殺本拉登後的頭四天裏，巴基斯坦的大眾反應很複雜。在旁遮普省，存在對奧薩馬的普遍同情，不過許多人沒有公開表達出來。在信德省，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反應。例如，在卡拉奇，有對奧薩馬比較熱烈的同情，還有對美國攻擊的譴責。

令人驚訝的是，在奧薩馬被殺的地方開伯爾—普赫圖赫瓦省（Khaiber Pakhtoonkhawa），沒有發生多大波動。同樣地，俾路支省的反應是溫和地反對那些屠殺。然而，人們反對發生在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鎮的對那個莊園的攻擊，反對情緒在日益加大，並且蔓延到其他地區。許多宗教極端勢力逃離阿富汗，在俾路支省和開伯爾—普赫圖赫瓦省避難。2002至2008年，他們統治過這些省份。

這種原教旨主義的統治發生在穆沙拉夫將軍與美帝國主義玩二面手法遊戲的時期。一方面，他加入了“反恐戰爭”的聯盟，另一方面他利用原教旨主義的增長，以同原教旨主義者鬥爭的名義，獲取更多的美帝國主義的軍事經濟援助。本拉登必定是這時越過邊界進入巴基斯坦的。

2011年5月的襲擊讓每個人都感到吃驚，讓人們迷惑不已，說不出話來。沒有人會料到這種無恥行為，會立刻發生在大衛·拉蒙得被釋放之後，大衛·拉蒙是中央情報局特工，今年早些時候，光天化日之下，他在拉合爾殺了兩名巴基斯坦人。與對奧薩馬被暗殺的溫和反應相反，群眾對大衛·拉蒙得謀殺案的反應是如此強烈，它把政府逼入了防守位置。通過這次攻擊，看來美國帝國主義似乎推進了其對巴基斯坦的控制。

一些政黨，如伊斯蘭促進會（Jamaat Islami）和伊斯蘭教職人員大會（Jamiat Ulemai Islam），對基地組織所犯下的屠殺和暴行保持緘默，但他們抨擊美國人“侵犯巴基斯坦主權。”哈菲茲賽義德的強硬大會黨達瓦（Jamiat Dawa）是最活躍的宗教原教旨主義者，在一些地區，它吊慰本拉丹，為穆斯林亡者祈禱（Nama Jenaza）。不要很久，這些政黨定會組織對奧薩馬的同情支持，上街遊行反對美國所作的那個襲擊。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資產階級政黨，像巴基斯坦人民黨，巴基斯坦穆斯林聯盟Q和巴基斯坦穆斯林聯盟N，它們支持美國的行動，把它看作是反對宗教原教旨主義崛起的一個偉大勝利。政府還沒有拿出一個一致的解釋。相反，各級官員做出自相矛盾的說法。

巴基斯坦和美國政府的聯盟

在過去的一年，巴基斯坦和美國政府已經鞏固了他們的關係。可以看到，情報官員之間的互訪更多，給中央情報局特工提供的簽證數目也更多了。政府還讓華盛頓放開手腳發動無人機攻擊，放棄了假惺惺的譴責。那種譴責是在攻擊的初期做樣子給人民看的。看來，華盛頓已經知道本拉登在巴基斯坦。

這整個期間，美國政府向一個非常脆弱的公私合營（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提供政治支持。政府毫不猶豫地按照美國帝國主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意見採取行動。美國政府不可能有比這個政府更好的合作夥伴了，後者是由最腐敗的反人民分子所領導的。此外，華盛頓似乎已經保佑穆斯林聯盟Q --- 同穆沙拉夫將軍分享權力 --- 進入了政府。奧薩馬被打死的當天，14名來自巴基斯坦穆斯林聯盟Q（PMLQ）的部長，宣誓並同一個新上任的，人稱為“溺水之船”的聯邦部長聯合一起。

美國派海軍的海豹特種部隊捉拿奧薩馬·本拉登，公然侵犯巴基斯坦的主權，這並不會惡化兩國統治階級之間的關係。請注意，奧巴馬和他的助手們沒有說過一句反對巴基斯坦政府的話。相反，他們都讚揚了相互間的情報交流。

一個共同任務

襲擊奧薩馬一直是巴基斯坦和美國情報機構的共同任務。穆沙拉夫總統時期的軍隊首腦坎尼將軍，是三軍情報局（ISI）的前負責人。他與美國帝國主義密切合作了很長時間。早在2007年，他是第一個同貝布托談判有關同穆沙拉夫分享權力事宜的人。由於貝布托力壓穆沙拉夫辭去軍職，於是坎尼將軍接管了軍隊。在他的監管下，

巴基斯坦軍事機構開始打破同宗教狂熱分子的傳統聯繫，開展反對他們的軍事行動。狂熱分子回擊，目標針對軍事總部和殺害高級軍事人員。

軍隊階級的分化

因此，在軍官和普通士兵之間有一個兩極分化。軍官與他們的美國同行形成了密切關係。他們控制了廣大的資產，維持一個更自由的生活方式。但下層士兵仍是宗教性的，同情原教旨主義和宗教黨派，仍堅持反印度和反西方的情緒。由於這種分化，華盛頓不信任軍隊和情報機構有能力對反恐戰爭開展有力的檢控。

宗教恐怖主義不會結束

儘管有本拉登死亡的大打擊，基地組織和其他宗教極端主義恐怖組織仍將增長。托洛茨基在他出色的小冊子“爲什麼馬克思主義反對個人恐怖主義”上說，“尋找發洩出路的復仇情感，一直是恐怖主義最重要的心理源頭。”奧薩馬的死亡不會結束復仇情感。無論奧薩馬被謀殺還是身體被投入阿拉伯海，也不會制止恐怖主義。事實上，宗教恐怖主義將因爲美帝國主義的行動而成長。一部份探尋反美方式的穆斯林青年可能被吸引向恐怖主義。新的恐怖主義組織將形成。

這並不意味著宗教狂熱分子可以在巴基斯坦獲得權力。巴基斯坦軍隊是殘酷的勢力，他們已經多次證明了，他們一旦受到威脅，將會如何殘暴地使用手中的權力。巴基斯坦軍隊將與美國人密切合作，以確保狂熱分子既不能接管伊斯蘭堡，也不能讓他們的手伸進該國的核技術。

從世界範圍看，狂熱分子的個人恐怖主義威脅並不局限於一個國家。他們不像以民族解放爲名義的愛爾蘭共和軍，但像紅色旅，爲理念而戰，卻被成功地粉碎了，因爲它的社會基礎很窄。

基地組織和其他宗教的狂熱分子正在利用百萬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儘管這些狂熱分子代表伊斯蘭內部的一些不同的趨勢和教派，畢竟他們能夠在一些國家裏打下廣泛的社會基礎。

基地組織無疑是世界有史以來最成功的恐怖組織的之一。他們存在超過二十年，並幾次成功策劃擊中了其目標。他們有一個自殺志士團隊，這些志士願意通過殺人和自殺死走向天堂。儘管其主要領導人遭謀殺，但沒有他們會滅亡的跡象。不過個人恐怖主義有其局限。

個人恐怖主義的局限

國家恐怖主義不能離開個人恐怖主義。兩者具有相同的性質和方向；兩者都產生同樣的後果。然而，國家恐怖主義行爲可以有持久的地位，並用一些問題做底護藉口。

基地組織最成功的恐怖主義行爲9 / 11並沒有讓穆斯林獲益，數百萬穆斯林的生活，仍是絕對痛苦和悲慘者中的一部份。它滿足了像拉登那樣的少數狂熱分子的靈魂，但損害了數百萬穆斯林的靈魂。帝國主義則回以憤怒而野蠻的攻擊。托洛茨基是蘇聯革命的主要設計者之一，在1911年一名俄羅斯部長被殺害後，就當時的形勢，他發表了下面的評論：

“恐怖嘗試，甚至是‘成功’的嘗試，是否會把統治階級拋入混亂之中，取決於具體的政治環境。在任何情況下，混亂只能是短命的，資本主義國家並沒有讓自己依賴于政府部長們，也不能隨同他們而被淘汰。它服務的階級總是會找到新的人們；該機制會保持完好並繼續發揮作用。”

“越‘有效’的恐怖主義行爲，其影響越大，越能減少群眾的自我組織和自我教育的興趣。但是混亂煙霧一旦清除，恐慌消失，被害部長的繼任者出現，生活再次進入舊車軌，資本主義剝削的車輪一如既往地轉動，只有員警的鎮壓變得更野蠻更無恥。結果，代替點燃的希望和人爲引起的興奮的，是失望和冷漠。”（托洛茨基，1911年11月）

屠殺能結束宗教原教旨主義嗎？

細察以下引述的2009年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對華盛頓過去支持阿富汗聖戰者的一段話：

“讓我們同三軍情報局[巴基斯坦情報局]和巴基斯坦軍隊打交道，讓我們去招募這些聖戰者... 要結束蘇聯的佔領，這不是一個糟糕的投資，但是讓我們小心照顧我們播下的東西... 因爲我們將收穫。”希拉蕊·克林頓，2009年4月23日

在過去的10年，華盛頓和狂熱分子兩者都一直在收穫他們所播種的東西。一個報復導致另一個報復。

宗教原教旨主義不可能被強力打敗。美帝國主義的戰爭與佔領政策，展現的是失敗而不是成功的例子。這個教訓很清楚：“你不能殺死的理念。”相反，必有一個政治鬥爭，向普通生活的

百姓，揭露宗教原教旨主義的真正意義。

政治伊斯蘭的崛起

政治伊斯蘭的崛起，同穆斯林世界左翼政黨的日益軟弱是有關聯的。一方面，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後，社會主義好像都失敗了。另一方面，民粹主義的，反帝國主義的，有群眾基礎的政黨，如布托的人民黨也喪失了信譽。宗教似乎是唯一可用的反帝國主義平臺。在現實中，諸如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的宗教極端分子，絕不代表反對帝國主義的另一選擇。他們自己剝奪，壓迫和殺害那些不同意他們信仰的人。他們相信，要從肉體上消滅政敵。他們不是一個反對帝國主義霸權的進步力量，而是極右翼的反動派。他們想強行倒轉歷史的時鐘。宗教狂熱分子是新法西斯主義者。宗教狂熱分子和帝國主義列強相互為不斷升級的暴力提供了理由。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迴圈。

宗教原教旨主義的增長，也是對巴基斯坦的文職軍政府完全沒有解決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基本問題所作出的反應。歷屆政權一直無法結束封建主義的控制，結束巴基斯坦資本家的壓迫剝削性，結束他們屈辱工人的做法，也無法結束對該國小民族的壓迫以及中止對他們天然資源的剝奪。

平民政府失靈

巴基斯坦統治階級可悲地失敗了，未能帶來任何民主準則。因此，當文人政權被軍事獨裁政權推翻時，絕大多數人民群眾沒有抵抗。今天，文人政府的政策是由美國帝國主義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樣的機構主導的，它們造成巴基斯坦人民的苦難。戰爭與經濟的痛苦，連同每天發生的自殺性襲擊一起，把人民置於一個可怕的境地。不確定的未來已成為一個普遍心態。希望消失了。顯然，巴基斯坦政府必須改變其政治和經濟的優先事項。它必須結束腐敗，切斷把它同美國帝國主義綁在一起的紐帶。

在9/11之後，左派中間的混亂是很厲害的。有人鼓吹同北約部隊合作反對宗教狂熱分子，聲稱沒有必要另搞一套。“宗教狂熱分子是法西斯，北約強大，足以消滅他們”就是其論據。“北約正在做我們的工作。軍事解決是唯一的選擇；我們必須保持安靜，閉上我們的眼睛，與美國人合作。沒有必要建立涉及群眾的反戰運動”是其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一連串的論據。在另一邊，為了加強衝突裏主要演員的重要樣式，問題是作為“我們迎戰他們，”“善良與邪惡之戰”，“反對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十字軍”，“文明對混亂”的說法呈現出來的。政府，媒體和自由黨人，與一些進步分子攜手並進，能夠支配討論。

我們應該怎麼辦？

奧薩馬被美國人殺死，開啓了一個新的衝突時代。與基地組織以及其他恐怖宗教原教旨主義有關聯的團體和個人將利用這次事件，動員人民支持他們的反動議題。

我們要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原教旨主義，反對巴基斯坦政府做這兩種勢力的同謀。在這次辯論中，我們已經表明我們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政府和宗教原教旨主義的立場。我們必須揭露他們的宣傳和死路一條的解決方案。

- 我們呼籲建立一個打擊狂熱分子的全面廣泛的政治經濟戰略。巴基斯坦政府必須停止其對宗教伊斯蘭學校一切形式的支持。至少有百分之十的國家預算應該用於教育；所有巴基斯坦人的大學教育必須是免費的。政府本身必須同宗教的做法脫鉤，並提供宗教學校的制度性替代者。
- 我們呼籲結束屈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經濟政策。政府必須為工人農民的利益服務。
- 我們呼籲結束同美帝國主義和戰爭機器的聯繫。宗教原教旨主義的崛起，是統治精英的政府政策及其對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勢力依賴的直接結果。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和新殖民主義的鬥爭，必須是我們宣傳的主要優先事項，不向狂熱分子讓步。

大阿拉伯之春（the great Arab Spring）現在已經提出了另一種方案。自殺襲擊，炸彈爆炸，無人駕駛飛機襲擊和其他暴力手段，效力遠遠低於偉大的阿拉伯人民反對獨裁者和獨裁政權的群眾運動。阿拉伯方式的反攻，最終將帶給人民群眾以信心，全力把現存制度轉變，代之以社會主義方案。

2011年5月6日

✦法魯克·塔里克是巴基斯坦工黨的全國發言人。

穆罕默德的綠色旗幟和世界貿易的擴張

約翰·巴投

“穆罕默德，一個無名的趕駝人，開始在他家裏聚集一些窮苦的麥加人的一個世紀後，他的後繼人控制了通往盧瓦爾河的道路和印度河兩岸的土地，從普瓦捷到撒馬爾罕。” … 從此，伊斯蘭教 --- 成為具有現代性的意識形態 --- 要管轄市場的擴張，並且這樣做下去，“從東羅馬帝國的衰落，直到威尼斯，甚至英國的興起。”



穆罕默德出生在麥加，西元570年左右的時，阿拉伯中部正經歷快速發展，帶動發展的是轉運商品和資訊的商隊車流，它們活躍在從巴勒斯坦到葉門的南北軸線，以及從埃塞俄比亞到波斯灣的東西軸線。超出此範圍，就不能理解伊斯蘭教的誕生。在這個範圍的四個基點上，有兩個大帝國，即拜占庭羅馬 --- 它仍控制著大多數地中海周圍的土地 --- 和薩珊波斯，還有兩個埃塞俄比亞（阿克森姆王國）和“阿拉伯菲利克斯”（希木葉爾或葉門）文明，構成了強大的吸引中心。當時拜占庭是基督教埃塞俄比亞的盟友，而薩珊波斯成功地降服了南阿拉伯，後者從而失去了它在全島其餘部分的優勢。但是從540年到629年，拜占庭和波斯之間不斷的戰爭，減弱了他們在新月沃土爭議區的影響力，越來越多的阿拉伯裔移民移居到該地。

阿拉伯中部的貝都因部落充分發揮其中間人的作用，貝都因部落有時會遷徙，他們以麥加為中心發展了一個交易市場網路。他們與新月沃土

的許多基督教異議人士接觸（基督一性論派，聶斯托利派等），也接觸埃塞俄比亞和葉門的基督徒，後者主張基督的雙重性，即神性和人性，還與波斯的拜火教徒和猶太人接觸。[派特裏夏·科龍聲稱，伊斯蘭必定起源於阿拉伯的北方，而不是在阿拉伯中部，因為在西元7世紀的頭三分之一的時間中，那裏的貿易發展，以及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擴散，仍是非常有限的，（麥加的貿易與伊斯蘭的興起，普林斯頓大學，1987）。不過，這個驚人假說的基礎，被近年的考古發掘削弱了。]

穆罕默德的阿拉伯

“新月沃土和周邊地區提供的接觸點，比任何其他歐亞大陸類似地區的貿易路線更遠”。[霍奇森碩士的語錄，取自伊斯蘭教的風險。世界文明的良心和歷史，第1卷：伊斯蘭教的古典時代，芝加哥，1977。] 另外，它比較乾燥---除了它的大沖積平原外--- 有利於半遊牧的牧民和商人，讓他們能夠共同抗衡貴族地主的影響。這個社會化學煉金術促使了一神論宗教--- 拜火教，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興旺，因為它們較好地適應了商業階級的需求，這些階級首要的憂慮是人際關係的調節。在唯一的上帝和唯一的社區前，帶著人人平等的願望，體現同樣的公義，從現在開始，個人負責的是單獨一個生命（而不是多個轉世生命）。在大型農業國家的邊界，畜牧業者和商人經常從事掠奪，他們的社團控制著地中海和南部海域之間的交易。可以肯定的是，相比於那些偉大的農業文明，他們是矮人，但他們坐在巨人的肩膀上，有時看得比他們更遠。駱駝的馴化保證了他們的食奶，商隊（caravan，從梵文‘karhaba’ 駱駝引用而來）還提供除馬以外的一個重要軍事資產。這些部族，像他們的堂兄弟，在綠洲成立，最負盛名：他們自稱為阿拉伯人。他們喜歡的社會秩

序，等級不是很分明的，不是很兩極化的，團結一致是其特點：那裏的人認為個人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以至於群體之間的暴力行為，被它引起的報復所限制。

“在穆罕默德的童年”，霍奇森注意到，“地中海盆地和印度洋之間貿易的主要部分，通過阿拉伯人控制的陸路進行”。精神層面上，在猶太人的監護者波斯人，分別贏得反對拜占庭的一個又一個勝利後，形形色色的聖經思想在阿拉伯中部沿商隊路線蔓延。“人們便轉向普世宗教，轉向那些個人宗教，轉向那些與種族無關，旨在確保每個獨特個人得救的宗教”。[馬克沁·羅丁森，穆罕默德，倫敦，企鵝叢書，1996。羅丁森的其他語錄摘自他訂正和修改版本的卓越總結，1961年首次出版。同一作者還著有：伊斯蘭教和資本主義，紐約，萬神殿出版社，1973年；馬克思主義和穆斯林世界，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1981年；阿拉伯人，倫敦，克魯姆頭盔出版社，1981年；歐洲和伊斯蘭教奧秘，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發行，1987年；伊斯蘭教：政治與信仰，巴黎，費耶德出版社，1993年。] 在一些綠洲已經建立了猶太教，而且也有基督教，他們虔誠的隱居修士給同時代的人以突出鮮明的印象，但缺乏本地淵源。

貝都因人到現在還沒有特別的異教組織，他們一致相信的神，古老的真主，能夠撇開無數部落偶像，作為經書的真神“重生”嗎？羅丁森認為，答案與時代共鳴：“一個阿拉伯國家，以阿拉伯思想為指導，適應新的情況，但仍然接近它構築的貝都因社會環境，構成一個與強大帝國一樣被尊重的力量，那是時代的大需要。對於比其他人更知道如何做出回應的天才，道路是開放的”。這項任務落到麥加，它控制了漢志的南北軸 --- 阿拉伯西部和中部的貿易樞紐，到敘利亞，波斯和葉門的距離相等。應該說，它的禮拜場所克爾白（the Ka' Ba），已在真主的監督下，向整個地區的許多異教神靈提供了一個聖所，甚至吸引了朝聖的基督徒。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先知的第一步

西元7世紀初，在阿拉伯領土上商業往來繁茂活躍，在這個情況下，阿拉伯得益於其鄰國政治上的削弱。在文化層面上，這種活力導致了伊斯蘭前期詩歌的繁榮，促進了從各種方言開始的共同語言的發展。這些讚歌被背誦，它們是有節奏，帶有格律的。它們生動地描繪了那個時代阿拉伯人的生活，情感和理想。[阿爾伯特·霍拉尼，阿拉伯民族史，劍橋（麻塞諸塞州），哈佛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12-14頁。] 狂人和蕾拉 [安德列·米克爾阿爾&哈尼·阿拉尼，狂人和蕾拉，巴黎，南辛巴達-行為出版社，2003年] 追溯到7世紀下半葉：它喚起了似乎不可能的愛，這個愛可能導致社會越軌，瘋狂，但也導向靈性：

“晚上，她的臉就像是一個出世僧人的燈，照亮了黑暗。”

我們將看到，這些有靈感的詩人，就像基督教的隱士，與穆罕默德（我們應該叫他穆罕默德（Muhammad） --- 土耳其人則稱之為默罕默德（Mehmet），非洲人稱之為穆馬杜（Mamadou））的命運不相關聯。他出生在強大的古來什（Quraysh）部落的一個普通家族，古來什（Quraysh）部落控制了麥加聖殿，而且根據傳說還主導了漢志的主要貿易路線。他在年輕時失去了雙親，由他的祖父收養，然後他的叔叔阿布·塔里布，一個富裕的商人收養了他，再後來在二十五歲時，娶了一個比他年長十五歲的有錢寡婦海迪徹（Khadija），與她有四個女兒。

歷史學家對穆罕默德的瞭解超過耶穌 [有關穆罕默德的生平，我們是通過穆罕默德言行錄 (hadith聖訓) 獲知的，其中最古老的記錄也可能至少在事實發生之後的 120年才產生。它們受到了偉大的穆斯林法學家的驗證，這些法學家們分析他們所依賴的證詞鏈，並不總是避免矛盾，結果他們經常說：“上帝是最博學的”，這證明了他們的信譽。進一步資訊請參考：伊本·瓦拉齊(編輯)，尋求歷史上的穆罕默德，紐約，阿默斯特出版社，2000年]。他顯然被形容為具有平均身高的一個人，肩膀寬闊和骨骼強壯堅固。有一個大腦袋，長薄面，活躍的黑眼睛，他思考周到而且均衡平穩，既能耐心談判又能迅速行動。他很快成為一個成功的生意人，以至於他的語言飽含生意經：因此古蘭經就像“帳目清算”引發最後的審判(21, 1)。然而，這種物質的成功並未帶給他足夠的滿足：他沒有能力給妻子一個男性繼承人，這困擾著他；在一個年輕人崇尚非常自由的性生活的世界裏，他自願放棄任何婚外關係，這毫無疑問讓他感到沮喪；還有特別地，他苦於不能夠利用他卓越的精神和政治素質。

穆罕默德追蹤他的一神教(哈尼夫)阿拉伯前人，也追尋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神秘，他花了長時間在麥加附近的希拉山的一個山洞裏沉思。就在那裏，一天夜裏，他獲得了“黎明破曉般的真像”，正如他後來私下對他未來的妻子阿伊莎所說的那樣。他第一次聽到有個聲音對他說：“你是神的使者！(...)經過一個超自然存在的感覺，模糊的視野，聆聽簡單的短語後，一連串組織良好的長話語來臨，呈現出明確的含義，是一個資訊”。最後，那個強大的存在命令他背誦：“以上帝的名義...”他正好念出了將成為古蘭經的第一批言詞。“所有這一切發生在單獨一個男人的大腦裏”，羅丁森評論道，“但它反映在那裏，它攪動在那裏，整個世界和歷史環境的問題，讓這種精神鼓動的產物動搖阿拉伯，甚至宇宙”。

早期伊斯蘭教的社會話語

任何一神論的信仰往往都提出人人平等，順服上帝意志的原則，還有末日時與他們財富無關的拯救和審判。伊斯蘭教更是如此，它甚至拒絕在真主絕對獨一性的名義下的基督教三位一體的教義。因此，古蘭經以一個非常豐富多彩的方式忠實地呈現地獄的痛苦和天堂的歡樂。“個人(...)”，羅丁森強調，“採納一個特定和傑出的價值。他正是有了這個，才關心至高者，是至高者創造了他，將要審判他而不考慮家庭或部落的關係”。

截至6世紀的最後幾十年，霍奇森解釋說，麥加商人的斂財行為“威脅部落的團結，而且在任何情況下，破壞了貝都因人關於慷慨者的理念，對慷慨者來說，財富雖好，但相對短暫”。所以是最自由的精神，拒絕麥加社會上層的統治，第一個轉向穆罕默德：其中，有好人家的年輕人，他們反叛長輩，但還有缺乏影響力的家族的成員，非麥加人，家族外的個人，甚至自由民或奴隸。此外，先知站在窮人和孤兒的一邊，告誡富裕的古來什族人，先知輕蔑他們的傲慢：

“當心！你不尊重孤兒！
你不鼓勵人們養活窮人！
你貪婪地吞噬你的繼承物！
你對財富貪得無厭！”
(古蘭經，89,17-20)

按啓示宗教的原則，極高層次的訓令通過一個先知傳達給人，先知的地位使他合法擁有成為至高靈性力量的雄心：“一個上帝與之直接說話的人怎麼可能”，羅丁森評論說，“服從任何立法議會的決定。至高存在的指示怎麼能由麥加貴族討論？”此外，穆罕默德沒有展開“對那些有錢有勢的墨守成規者的批判態度[羅丁森甚至說：“隱式革命”]嗎？”。所以，鎮壓措施，打擊了大約四十名穆罕默德的堅定支持者，特別是最脆弱者：因此，在一天最熱的時間裏，黑

奴比拉爾被他的主人暴曬在陽光下，用岩石壓在他的胸口。在這個沉重的氣氛中，先知仍然贏得了一些的門徒，像奧馬爾·伊本·哈塔蔔，他後來接替他成了第二個哈裏發。有些人移民到阿比西尼亞，雖然大多數人仍享有其家族的支持：穆罕默德受到哈希姆·班奴的保護，尤其是受到他的叔叔，非常有影響力的阿布·塔里布的保護。但後者在619年的過世，以及他的第一任妻子海迪徹的去世，打破了這種不穩定的平衡。

在622年，當饑餓的拜占庭在末世的氛圍中被波斯人和阿瓦爾人圍困時，一小團體的信徒走上去麥迪那的道路，麥迪那在西北350公里處：這是回教紀元，即穆斯林日曆的開始。在這裏，新的社會組織由穆罕默德主持，由真主的聲音鼓勵，繼續捍衛孤兒，乞丐和旅客的利益。它主張善待奴隸，如果可能，解放他們，在信徒中，奴隸制甚至被禁止。在632年，當先知仍活在人身中，在其死亡前幾個月，領導了第一次到麥加的朝聖（朝覲），他堅持，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阿拉伯人或非阿拉伯人，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激發了伊斯蘭教徒相當普遍地排斥種族主義。

在綠色貿易旗幟下

霍奇森堅持這個事實，即信徒---那些接受啓示的人---的社團從現在起在溫瑪（umma，源于Umm，母親）社會組織內連接在一起，連接紐帶是超越部落阻礙的。在麥迪那，穆罕默德努力用明確的規則管理這個社會，但也使用經濟手段，特別是稅收手段，從而為一個新的社會秩序提供基礎。

他仲裁異教徒部族之間的衝突，並且在一開始就受益於強大猶太部落的某種仁慈的態度，從他們那裏學來的一些儀式：在中午面對耶路撒冷的祈禱和贖罪日禁食；真主也允許吃經書上的人的食物，娶他們的女人。在此期間，他為了延伸他的政治影響力，用一系列“突襲”反對從麥加（當時，私人戰爭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做法）來的商隊，以保證他支持者的獨立性。

貝都因部落內的對手似乎已經寥寥無幾：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要不改變想法，要不就遭到淘汰。女詩人阿思瑪就是這個情形，她在睡眠中被暗殺。原因就是她聲言：“馬利克和那比特（...）[麥迪那的氏族和部落]的屎窿。你聽從外國人（...）是不是有一個君子（...）會中斷這些愚蠢的期望？”（由羅丁森摘錄）。

另一方面，猶太人有更具威脅性的政治野心和更大的思想凝聚力。他們蔑視穆罕默德的宗教思想，他就挑戰他們，堅持主張伊斯蘭教的古老源頭：難道阿拉伯人不是聖經宗教的創始人亞伯拉罕（易蔔拉欣）的兒子以實瑪利的後裔？他也同他們決裂，建立齋月，拒絕一些他們的食物禁忌（但他禁止酒，這與異教有關），然後要求信徒朝向麥加祈禱。通過一系列的驅逐，徵用和屠殺，他打敗了他們，其中在627年的巴努廓萊紫的大屠殺中，有幾百人被殺死。他還承認耶穌為先知，誠然他能夠創造奇跡，但仍然只是一個像其他人一樣的人，這是他同基督徒的距離。

麥迪那和漢志北部繁忙貿易路線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資源，其主人，穆罕默德的黨，給未能用武力戰勝它的麥加富商提出了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這是因為新興的年輕國家，由於其強大的穆斯林意識形態的凝聚力，是由一個特殊的人領導的，這個人可以把長遠目標和機遇感覺調和起來。他周圍還有人給出明智的建議，特別是他的兩個岳父和接班人，阿布·貝克和奧馬爾，他們有時遭到他表弟阿里，他女兒法蒂瑪丈夫的反對。

在628年，穆罕默德宣佈，他打算領導一個和平遊行，開始對麥加的精神征服。儘管他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讓步，該事業取得了成功：到629年，穆斯林被允許進入該城朝聖。不過，在630年，他準備了巨大的軍事遠征，威脅他最後的對手：麥加貴族分裂了，屈服，然後轉變，避免了一場攤牌。麥迪那因此成為阿拉伯首都，統一在其先知周圍，在他周圍大庫萊希(Quraishi)家庭現在聚集一起。在他權力的高峰，632年6月6日，安拉的使者去世了。

在同一時間，筋疲力盡的拜占庭再次獲得了對波斯的優勢，波斯終於被打敗了。第一批哈裏發（先知的繼承人）的軍隊，因為不能再脅迫要脅伊斯蘭化的阿拉伯人，就抓住了這個機會，動手征服已知的世界。就像羅丁森講述的，他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推進：“自從穆罕默德，一個平凡的趕駝人開始在家中聚集一些窮苦的麥加人後，一個世紀過去了，現在他的繼任者主導了盧瓦爾河的通道和印度河以外的土地，範圍從普瓦捷到撒馬爾罕”。對於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來說：“不久綠旗就飄揚在一個運動上方，這個運動是個平均的，高於商業的，好戰和宗教的風暴”，它把中東和地中海世界顛倒：從此，伊斯蘭教 --- 是具現代性的意識形態 --- 將管轄市場的擴張，這樣做，“從東羅馬帝國，直到威尼斯甚至英國興起”。[Ernst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6.]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原則，劍橋（麻塞諸塞州），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86。]



古蘭經和婦女

“男人有管理女人的權威”，他們有權告誡他們，甚至打她們（古蘭經，4，34）。一夫多妻制僅限於四個女人（除了先知），前提是丈夫覺得能夠一視同仁地對待她們。當然，這只是同少數足夠富裕的信徒有關。

婦女活躍在早期伊斯蘭社會。她們質疑，建議和鬥爭。因此，對於真主只對男人說話，穆罕默德的一個妻子阿伊莎感到吃驚，發起對啓示的修改，現在則是對男女都說話。但是，作為一般

規則，她們可以繼承一半的遺產，因為她們沒有對於家庭（古蘭經，4，11）的物質責任。

婦女的性欲被普遍認為十倍強於男性。這不是受責難的原因 --- 在天堂，每個性高潮會持續至少二十四年 --- 但必須嚴格限制在父權制的婚姻中。古蘭經並沒有主張禁欲。

關於戴面紗，一古蘭經經文建議婦女用披肩（古蘭經，24，31）蓋住她們的乳房；另外責成她們穿密實她們的衣服（33，59）。它也規定，同先知的妻子講話要有幕簾隔著（古蘭經，33，53）。傳統認為婦女的身體，除了臉和手（但是，這是聖訓，它的傳播鏈並沒有建立好），必須掩蓋起來。

要處罰通姦行為，必須有四個同時的證詞作證（4，15）。古蘭經中沒有提到亂石刑，但在舊約（申命記，22，23-24）中有提到。一些聖訓提到它，但其可信度令人懷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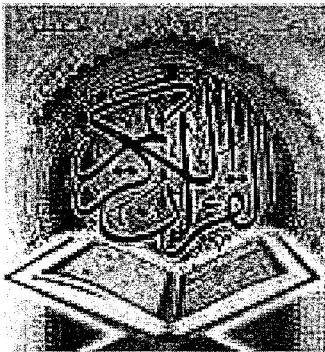
一個窮人的伊斯蘭教？

“古蘭經（...）向子孫後代傳送了一個被壓迫男人的資訊，這個人在曾經被不公正和壓迫現象弄得憤憤不平。在其混亂的文字中，有對強者的攻訐謾罵和挑戰，有為男人的公平和平等而作的呼籲。有一天，發現男人們願意抓住這些言語，利用它們做武器。

“原始阿拉伯人（...）不得不接受同那些他們曾經征服過的人的平等地位，其中許多人現在與他們完全一樣。（...）革命運動以其自身價值的名義提出這個獲勝的平等性，這種價值觀給他們帶來勝利。（...）幾個世紀以來，許多其他運動（...）要做同樣的事。（...）在這些鼓動的源頭，無論成功與否，對這些或多或少合理的，或多或少不足的觀念，在某個地方，曾有一個男人，他是庫萊希(Quraysh)部落的一個卑微家庭的平凡趕駝人。（...）

“觀念有自己的生命，這種觀念是革命性的。一旦固定在人的記憶中，寫在紙莎草紙，羊皮紙上或甚至把可蘭經寫在平坦的駱駝骨上，它們就繼續行動，讓使用它們的政治家和教士驚愕，引導他們，處理疑問，以從中消除危險後果，成就一個管理社會的良好秩序。”

（馬克沁·羅丁森， 穆罕默德 ，1994年）



古蘭經是何時以及如何寫的？

關於古蘭經最後起草的具體方式和可能時間，今天在科學家之間有相當大的分歧。它到底是穆罕默德生前完成，還是在他死後不久，或者在阿拉伯人征服200年後完成的？對於馬克沁·羅丁森：“真主感動穆罕默德背誦的那組言語，那些啓示，形成了所謂的‘頌詞’，阿拉伯語意為 qor’ân（可蘭）。它們是他生前寫在分散的文件上的，有皮革，平駱駝骨，陶器碎片，棕櫚樹莖等。在他生時，這些碎片就開始被收集在一起，把它們編成章節。（…）一本類似猶太人和基督徒的聖經的書聖訓（kitâb）編成了。（…）因此，整個啓示塑造成型，有一定的順序，有一定的章節安排可作區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穆罕默德沒有親自做這個工作，那麼這項工作至少是在穆罕默德的監督下做的。（…）”（穆罕默德，1996）。

對於約翰·旺斯伯勒：古蘭經的改寫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其標誌是與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許多衝突，其最終版本晚於西元800年（古蘭經研究，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牛津大學，1977；宗派仲介：伊斯蘭拯救史以外的內容和組成，牛津大學，1978。）。此外，派特裏夏·科龍（1987）已經質疑穆罕默德和伊斯蘭教起源于麥加了（見注1）。要瞭解更多資訊，請參閱伊斯蘭百科全書，第二版，12卷，萊頓，布里爾，1960-2005。

貿易和個人救贖的宗教

“可以這麼說，只要他天然地被捆綁於他的氏族，他的部落，他的村子，他的城市，那麼在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他就不過是一個可交換的元素，位置固定，命運給他的功能，總是相同的；人受制於這樣的生命理念，即死亡後的生命類似於此生。彼岸那邊也一樣，在那裏，此岸的社會統一性將繼續嚴格管制蒼白幽靈，領導一個萎縮的存在。在這些死後的國土，僕人的陰影將會服務于主人的靈魂，農民幽靈將會為他們培育種植土地，死亡後的工匠會提供他們所需要的一切。這個地球上的優點和缺點並沒有多大的差別。（…）

“但是當大規模國際交易的時間來臨時，其中混合著各民族，男人和想法，當社會建立的原則是以金錢度量一切，金錢經濟破除了不同民族的邊界時，在每個人都可以謀求他個人財富的地方，在這個世界的個人價值依賴於其自我努力造就自己的地方，人們開始希望每個人都會有自己裁量的命運。因此，先知出現了（…），他單獨地答應[富人] 首先在這個世界上有懲罰，然後在另外一邊。從那以後，所構成的社會和社區，告訴其成員，如何獲得在另一個世界的幸福條件，如何拯救自己個人。”

（馬克沁·羅丁森， 穆罕默德 ，1996年）

►約翰·巴投是瑞士團結運動---一個反資本主義，女權主義者和生態主義的21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成員，是團結雙月刊的主編。

俄國的宗教與無神論運動

李星譯



自從1991年資本主義復辟以來，俄國東正教會的活動驚人地活躍起來。眾多權威的民意調查表明，真正以教徒自居的人僅佔總人口5%，此外這些人中包括了大批伊斯蘭和佛教信徒。這樣算起來，東正教的群眾基礎只有幾個百分點，根本談不上什麼「全民族的精神避難所」。儘管如此，十年來教會對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影響達到了空前的程度，這顯然與推動、鼓勵宗教(主要是正教)宣傳的國策直接有關。90年代初，在葉利欽總統一手安排下，革命後沒收的大量教會財物(主要是建築物、土地)歸還原主。與此同時，正教教會被授與一系列「創收」特權：教會屬下的商業公司從事的進出口業百分之百免稅。這類「創收」已使教會成為俄國當今最大的煙、酒進口商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十年前得到類似特權的還有一系列教育發展基金。由於國家稅收受到的衝擊，90年代中期除教會外，其它機構的類似活動已被終止。「上帝的僕人們」生意越作越大，除繼續買賣其「萬寶路」「S·O·」酒之外，還從事規模宏大的宗教宣傳品(書報刊物，音像碟帶)的出版和發行；石油、天然氣、鑽石開採；銀行業。這一切自然也是免稅的。由於教會從不公開自己的財務收支狀況，很難準確估計神棍們的收入到底有多少。據網絡報紙「The telegraph」的估計，每年教會作為一個巨大的免稅區洗錢的規模從數千萬到數億美元不等。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在沙俄時期，由於19世紀以來民主知識界的積極抗爭，一百年前已經在高等院校裡廢除了神學必修課。「民主化」以後的俄國一切都要推倒重來。一年前鐵道部長阿克修年科簽字批准了歷史性的文件：在鐵道部屬下所有教育單位(大學、專科技術學校)中恢復神學必修課。也就是說，從此神學不及格的學生在這些學校裡是不能畢業的。教育部長菲利浦夫在官方的《教育方法》雜誌上宣佈：「有必要在國家教育系統徹底清洗一切有背人倫的無神論宣傳。在這方面應與東正教會密切合作。」1998年由副教育部長科西廖夫主持編寫的大學歷史教材在「回歸人倫」的努力中一馬當先：這本書從頭至尾充滿了「君權神授」「天佑吾國」之類的昏話。

在這一片神權復興的烏煙瘴氣中，左派在忙些什麼呢？全國第一大黨－俄聯共是最積極支持東正教會的主要幾個政治團體之一。2000年秋舉打的一次講習班上，該黨中央主席團(相當於過去的政治局)成員佐爾卡利采夫發言批評各教級黨組織與東正教會合作得不夠緊密。「東正教是蘇聯人民唯一的精神支柱。在同帝國主義及其買辦資產階級走狗作鬥爭的時期，沒有什麼比保衛這個主要的精神堡壘更重要的了。」他一本正經地解釋道。俄聯共杜馬議員之一阿斯特拉罕京娜數年前就準備了一個法律草案，以禁止任何無神論宣傳。「不能再眼睜睜地看看西方派來的特務毒害我們的青年了」。她憤憤不平地說。這個草案暫時沒有通過。但僅僅是暫時。

黨主席久加諾夫更與穿僧袍的打得火熱。1996年總統競選期間，這個左派候選人大聲疾呼：「……我認為國家應在精神和物質兩方面支持教會，……東正教是我國人民主要的道德勇氣源泉」。杜馬議長，俄聯共中央主席團成員謝列茲

涅夫特意告訴記者：「我定期去教堂祈禱……對此感到自豪」。另一個聯共領袖，原杜馬副議長甘梁切娃號召「所有的共產黨員……快快改悔，以贖回過去背離基督的過錯」。

較小的強硬派共產黨在宗教問題上同樣的曖昧。共產主義工人黨機關報某編輯告訴筆者說：「我明白，報紙應該同宗教作鬥爭，特別是教會……怎麼說呢，大部份同志認為應該多團結，少爭論，我們需要大聯合……」。這家報紙5年來沒有登過一篇反神權的文章。另一個名聲在外的「極左派」領袖安比洛夫更干脆要求「團結社會主義的東正教，打倒西方的、帝國主義中央情報局參養的天主教和猶太教……蘇維埃東正教萬歲」。小小的「革命共產黨」內部熱烈討論着關於「以東正教為精神食糧，開展反帝救國鬥爭」的必要性。該黨的白俄羅斯分部機關報操心的主要問題之一是如何幫助東正教堂與天主教堂爭奪信徒。

零零落落的馬列主義小組對教會神權復興的勢頭要敏感得多。如果不是這些人的努力，列寧和托洛茨基真丟盡臉面。幾年來已存在着反神權和宣傳無神論的計算機網頁（「工人民主」），無政府主義者、托派和從共工黨分裂出來的左派定期舉行過街頭宣傳，比如說在基督救世大教堂修建時期，馬列主義小組舉行過不少次抗議活動，主要是反對政府推行的強捐政策（每月從職工工資中扣除一定數目以用於修廟，並且強捐的對象不分國營私營企仙業）。2000年夏，無神論運動進入了一個較高的階段。首先是一批熱心青年成立了莫斯科無神論團體籌委會。

這批人應該說是自由主義小知識分子。他們的目光開始也落在自由派身上，希圖獲得幫助。自然是一無所獲。人權活動家冷冷地表示：「我們不搞左翼政治，「無神論客觀上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一個部份」。原來凡是碰觸資產階級國家根基的，就是左翼政治（一個插活：1998年圖拉州一家機械製造廠工人因長期拖欠工資，工廠正常運轉，就是不開支，找到杜馬著名的自由派人

權活動家亞夫林斯基，後者不耐煩地表示：「我不搞政治！「我關心的是人權問題」。工人恍然大悟：原來想吃飯就得搞政治！後來這些工人同一批馬列小組一起搞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政治，這是另一個活題了）。去年秋天在托派（「工人民主」、「左翼先鋒隊」）和其它左派小組幫助下，成立了地區性無神論團體，定期出版「無神論傳單」，舉行街頭宣傳。到目前（2001年1月份）在十多個州建立了分部。

現代無神論運動的興衰起伏讓我們看到，資本主義復辟帶來的種種腐朽醜惡現象，只能在社會主義運動的主導下才能其正受到有力的回擊。其它的潮流沒有作鬥爭的願望（自由主義者對人權廣泛受踐踏視而不見，民族主義者除了反美反帝的空談外，毫無振興民族工業的舉措）。因為什麼？害怕這種鬥爭會推翻資本主義！



印度尼西亞：記住大屠殺

亞歷克斯·德容

20世紀60年代是一個全球動盪和變化的時期。但是，在世界許多地方，那十年留下的記憶常常是繁榮和希望的時代，而印尼卻被激烈的暴力浪潮分裂成兩半。大約45年前，二十世紀的巨大罪行之一發生了：從1965年10月初至1966年3月，經過一次親共黨軍官的未遂政變後，印尼見證了歷史上最血腥的屠殺。

其主要形式是一個反共大屠殺，目標不僅是印尼共產黨（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PKI）領導人及其相關組織，而且還有他們的普通成員。成千上萬的人死於這些有目標的，系統性的屠殺。屠殺的結果是建立了蘇哈托新秩序（Orde Baru）的獨裁統治。“1965”成為了蘇哈托政權得以創建的奇跡。對它的記憶，同時被壓制和利用，塑造成形和否認：“不要談論殺戮”，“那些殺戮是一個群眾的歇斯底里階段”，“社會瘋狂”，“屠殺是因為共產黨人鬥爭而引起的”，“不要支持共產主義，牢記他們在1965年中殺死的那些人” --- 而在靜默的聲音中，有“不要支持共產主義，記住我們粉碎了印尼共產黨（PKI）”。

1965年前：危機中的社會

在六十年代初期，印尼是一個動盪的社會：政治，社會和經濟上都在動盪。印尼國家剛剛十五歲，經過四年反對荷蘭殖民勢力的遊擊戰爭並贏得獨立後，1945年8月17日正式立國。戰後的政治，在許多印尼人的生活中是一項重大議題。在1955年的首次大選中，投票率驚人，幾乎達到百分之百。印尼的政治狀態多樣和活躍，各種政黨和附屬組織遍佈整個社會：從信貸公司到各個祈禱團體，從農民工會到象棋俱樂部。一個政治中心和相關組織的結幫就成了族群黨派。族群黨派是日常生活中的事實 --- 他們不僅僅是在選舉時活躍的競選組織，而且還構築了其同情支持者全年的生活。一個

人歸屬於族群黨派的，往往是“個人的基本身份”，正如印尼專家馬克斯·蘭在他的著作“未完成的國家：蘇哈托前後的印尼”裏所寫的那樣。

印尼共產黨是最大的黨派。在1920年成立，是蘇聯共產黨以外歷史最悠久的政黨之一。在荷蘭殖民當局壓制下，在1927年糟糕的反抗後，它於日軍佔領結束時重新組織了起來。在1948年勉強逃脫印尼新政府的徹底摧毀後（在所謂的“茉莉芬（Madiun）事件”，親印尼共產黨的民兵建議的反叛後），印尼共產黨用和平憲政力量的建設戰略，在贏得支援和影響方面獲得很大的進步。印尼共產黨總書記DN 艾地制定了一個理論，認為印尼國家有兩個方面：一個是進步或“愛人民”的，與全國總統蘇加諾一致的方面，另一個則是反動或“反人民”的方面。共產黨人的任務是支持和加強國家的進步方面。該理論同列寧堅持摧毀資產階級國家和關於國家的階級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相矛盾 --- 但印尼共產黨的驚人增長似乎支持艾地的實用主義。

該黨聲稱，1959年7月至1962年10月間，黨員從150萬到增加200萬，而其週邊群眾組織人數應該由780萬上升至超過1100萬，幾年後，達到2000萬的高峰。在制憲議會的選舉中，該黨贏得了16.47%的得票率。1962年，犧牲議會集中權力在自己手中的蘇加諾，任命了他自己的內閣 --- 一個他所謂的“有指導的民主”制度 --- 給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艾地和莫·哈·魯克曼以內閣部長職位。

印尼共產黨不僅活動在政治選舉的層面上。在1956-1957年間，在印尼的幾乎所有的荷蘭人公司企業都被工人佔領。這些佔領發生在群眾動員的高峰期，由蘇加諾和印尼共產黨牽頭，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繼續在印尼經濟中的作用。然而，黨在看著正式“國有化”的公司被移交給軍隊控制：軍官被任命管理新‘國有化’的工廠，無情地在工廠鎮壓任何工會活動。

印尼社會左，右兩極分化日益加深。在右翼，份量和組織性能同印尼共產黨匹配的是軍隊。印尼共產黨的反對者培育了與軍官的聯繫，這些軍官反對印尼共產黨的政策，反對其組織民兵的建議。同時，印尼共產黨的作用受限於其與總統蘇加諾結盟的政策。蓬卡諾（即蘇加諾），就像他被人們稱呼的那樣，在右翼及其軍隊支持者和印尼共產黨及其群眾運動之間維持平衡。早在20年代後期，蘇加諾就開始使用了納沙貢（NASAKOM）口號 --- 民族主義，阿含（宗教）和共產主義 --- 以象徵共產主義與伊斯蘭教在印尼民族主義事業中結合。蘇加諾的思想把伊斯蘭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置於一個據稱包涵性的民族主義運動裏。

儘管蘇加諾持續講述“繼續印尼革命”，但社會和經濟的變化不大。一方面是蘇加諾的狂熱反帝言論，特別是針對荷蘭，英國與美國的“新殖民主義”言論，另一方面日常現實助長造成危機的一般感覺，兩者之間存在著間隔。受挫之下，黨參與了一個痛苦的文化爭端，反對所謂‘反動’或‘反人民’的藝術家和作家 --- 疏遠支持反印尼共產黨勢力的那部分知識份子。蘇加諾自己的納沙貢思想和群眾人氣有助於保護印尼共產黨免受右翼的直接攻擊。

但只要黨的行動不再服從民族團結的政策，衝突就不可避免了。在1964年和1965年，印尼共產黨無法忽視貧困農民的需求，開始在農村施行比較獨立的做法。1960年一個相當進步的關於土地改革的法“土地和作物共用法”獲得通過，其目的是消除大地主，分配土地給勞動農民，在租戶和業主之間執行收穫分享。但是，法律差不多是無用的，原因在其生效以前：該法的執行基本上都被保守的政府官僚破壞掉。印尼共產黨企圖通過所謂的Aksi Sepihak（“單邊行動”）群眾行動強制執行該法律，結果導致激烈的兩極分化。他們失敗了，因為地區的地主，往往是伊斯蘭領袖，他們和右翼政黨以及正統的穆斯林幫派桑特裏（santri）聯合，動員支持者，導致打鬥，偶爾出現人員傷亡。在像東爪哇地區這樣強烈的桑特裏地區，在1965年初，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印尼共產黨已經處於守勢。

印尼共產黨在蘇加諾身上見到了一個“反帝國主義”“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人---但在與軍隊的對抗中，這個盟友的弱點就變得明顯了。更有甚者，在面臨關於土地佔有問題的深刻分裂時，蘇加諾緊張地呼籲“團結”，使用的是其納沙貢口號：“避免國家分裂，停止歇斯底里，停止戰鬥，在旗幟上寫上納沙貢（NASAKOM）”。但它恰恰加劇了農村地區的階級矛盾，使得繼續實行納沙貢政策變得不可能。軍隊控制大型國有企業，阻撓日益左傾的蘇加諾調控經濟的嘗試。就像在土地改革的鬥爭中一樣，印尼左派發現軍隊阻礙進步的變革，而蘇加諾無法改變這一點。

從1957年年底起，印尼陷入了一個深刻的經濟危機 --- 一個不能完全歸咎於蘇加諾政策的危機 --- 進出口產品的世界市場價格的崩潰，但這是一個他無法解決的危機。通貨膨脹率飆升：印尼盾的幣值一週一周地下跌。因為錢不值錢，地主們更是決心要保住他們的財產。革命的支持者越想越沮喪，而對於他們的敵人來說，革命的危險越來越大，因為蘇加諾和他的支持者不斷地呼喚一場“革命”。蘇加諾的革命言論越來越多針對現實。矛盾和經濟危機削弱了他的權威，擔憂印尼共產黨看到了他權力的限制。

九·三零運動

1965年10月1日，大約凌晨三時十五分，士兵登上卡車，前往國防部長納蘇蒂安，陸軍司令艾哈邁德·亞尼中將住所，還有亞尼的五名下屬將軍的住所，他們有：在首都雅加達的S. 帕曼，馬斯·提托達摩·哈粵諾，R.蘇帕普托，索托炯·斯沃米哈德橋和唐納德·伊沙克·蓬甲坦。一般認為，這些將軍們有右翼情緒，敵視蘇加諾。這些士兵屬於一個名為“九·三零運動”的組織，該組織聲稱支援蘇加諾。他們稍後會聲明，其行動的目標是“逮捕”右翼將領，目的是防止他們發動反對蘇加諾的政變。不過，艾哈邁德·亞尼，哈粵諾和蓬甲坦試圖逃避被逮，在其家中被打死。這一行動最重要的目

標，納蘇蒂安逃過被逮：在納蘇蒂安的副官回來以前，在混亂中，要綁架他的人射殺了他五歲的女兒和一名警衛。

綁架者用無線電廣播讓他們公開於世。上午07點15分在國家廣播電臺作了第一次廣播，報告採用第三人報導新聞的形式。也許這是爲了讓廣播有更確定的特點---但是這可能是混亂的許多來源之一。報告中宣佈的唯一名字是總統衛隊營長翁東中校，他聲稱該運動希望避免'將軍委員會'(Dewan Jenderal)的'反革命政變'。雖然“九·三零運動”的參與者反對他們的上級軍官，但他們聲稱其行動乃是出於對最高統帥，總統蘇加諾的忠心。

在接到綁架的確實消息後，該運動的三位領導人，MA 蘇帕托準將，蘇基諾上尉和班邦·蘇蓬諾少將，試圖聯繫在其宮殿的總統。但蘇加諾不在家。如果蘇加諾會見了他們，會發生什麼呢？逮捕他，就像發生了政變那樣？或者他們的職業忠誠是真的？歷史學家約翰·羅薩認爲，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能把右翼軍官被逮捕的事實擺在他面前，要求他的支持。在稍後的廣播裏，該運動宣佈解散蘇加諾政府，結果這成了他們未能贏得那些領導人支持的臨時反應，而那些領導人則是他們聲稱要捍衛的人。無論蘇加諾對運動有什麼樣的感受，要他在政治上發聲，支持流血綁架和至少三個全國最高將領被殺，那是極其困難的。但殺人後，即便革命的象徵不追究他們，運動也沒有退路了。

九·三零運動的運作被描述爲'單邊權力改組'的嘗試。在六十年代初期激烈的權力鬥爭中，'權力改組'意味著用更友好的人替換對印尼共產黨及其盟友有敵意的領導人和政治家。在印尼共產黨決定轉變推翻政府的戰略，試圖在國家憲政體制中贏得權力後，'權力改組'成了擴大其影響力的一個重要戰術。認爲九·三零運動是拙劣的'權力改組'企圖，這個說法可以解釋該事件引發的許多困惑：爲什麼該運動前進時，獲得的軍方支持這麼少？爲什麼他們要花這麼久的時間正式宣佈組成新政府？爲什麼對一個總統表白忠誠，隨後他們又宣佈'解散'總統的內閣？

這也解釋了爲什麼印尼共產黨在一開始有些支持該運動，但並沒有爲一個嚴肅的政變企圖而動員其數量龐大的同情者。黨通過其報紙人民日報上的一篇社論表達對運動的同情。翁東和他的同伴得到了一些來自印尼共產黨下屬的運輸和通訊工會的協助，也得到了黨的青年組織'年輕人'的少數非武裝成員的幫助---但支持政變的群眾動員從未實現過。九·三零運動宣佈將'解散'政府和建立'革命力量的新組織'後，在蘇哈托少將，後來的軍事情報和戰略後備指揮部(Kostrad) 頭頭的命令下，右翼勢力，一支快速反應後備部隊迅速地壓垮了該運動。數目微小，組織紊亂以及沒有群眾支援，所以叛亂士兵無法同蘇哈托的部隊相比。

事件動起來後，該運動，其行動和它聲稱的任何動機，都消去了，被軍隊的暴力和它歸咎於運動的動機掩蓋了。蘇加諾試圖淡化這場運動的意義，說它只不過像'印尼革命海洋的一點漣漪'---但軍方決定使10月初的事件成爲獨立以來最重大的歷史事件。

殺戮場

忠於蘇哈托的部隊剛恢復其對雅加達的控制，一場大規模的宣傳運動隨即展開。軍方報紙想出了牽強附會的縮寫Gestapu稱呼九·三零運動，以便讓人聯想到納粹秘密員警蓋世太保。同時，把該運動展現爲一個共產黨人的貓爪，試圖在一場中國支援的政變中抓住權力。宣傳活動並非局限于對共產黨領導層的譴責，還把它的所有支持者投入一個邪惡的陰謀裏。根據軍方的宣傳，印尼共產黨的目標，是抓住一切權力，建立一個無神論的，罪惡的獨裁統治。散佈故事，說共產黨制定廣泛的死亡名單，準備礦坑傾倒屍體，並計畫拷打所抓者。

通過把他們描繪成對兩個權威支柱---父權和宗教---的威脅，軍隊獲得了支持。印尼婦女運動(Gerwani)是與印尼共產黨結盟的婦女組織，對印尼婦女運動成員角色的描述，尤其荒唐。印尼婦女運動成員被指在被俘的官員面前跳裸體舞，然後再把官員們閹割，丟進坑裏。隨後，據說印尼婦女

運動成員與印尼共產黨黨員狂歡。這種狂想，是一種明顯的影射，用以動員男人搜捕所謂的共產黨人。同時，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無神性質被強調，指明說共產黨對宗教是一種威脅 --- 無視許多共產黨人是實際的宗教信徒，而且黨甚至對伊斯蘭教教義做某些解釋，以便吸引人們到它的事業裏來。

軍隊明確指出，必須用暴力消滅共產黨的威脅。10月8日的軍報‘武裝部隊’宣佈：‘依牙還牙’。納蘇蒂安將軍本人在反對印尼共產黨的運動中要發揮突出的作用。在一個向反印尼共產黨的學生所作的講演中，他宣佈印尼共產黨已經‘叛國’，必須被‘消滅’。必須‘立即粉碎’印尼共產黨的支持者。對印尼共產黨的滅絕過程有不斷升級的幾個階段。首先是行政措施，禁止印尼共產黨及有關組織，停止印尼共產黨的代表資格，清除政府部門的共產黨人。官方新聞機構安塔拉 --- 被懷疑‘親共產主義’ --- 被置於軍方控制下，數十名記者被逮捕。這些行政措施，為大規模使用暴力騰出了場地。

亞尼死後，軍隊命令必須傳給蘇哈托將軍，他有效地保持著個位置，即使蘇加諾任命了普拉諾托少將為新的陸軍首長，情形也依舊。危機期間，蘇哈托同蘇加諾會談五小時長後，獲得了‘恢復安全和秩序的’責任。兩個星期後，蘇哈托正式控制軍隊，並從那裏登上了國家元首的地位。

從一開始，軍隊就掩蓋其蹤跡，使子孫後代難以發現誰該負什麼責任或事件的前因後果。即使軍隊報紙和官員號召‘粉碎’印尼共產黨，軍隊內部的指示，也只是非正式地做轉達。大部分的屠殺由平民實行，由軍方組織和鼓勵。這一大規模屠殺階段開始於政變一周後，時間在10月8日，以反印尼共產黨的伊斯蘭團體為主的群夥，放火燒了印尼共產黨的雅加達總部。陸軍特種部隊武裝和訓練了反共青年團體。軍隊和青年團體一起工作，採用在被毀的印尼共產黨辦事處獲得的名單，跟蹤印尼共產黨黨員。十月末，撒沃·厄德熙中將在同聯合安全工作人員的一次談話中強調‘心戰’的重要性 --- 通過小冊子和‘傳播資訊’進行心理戰。在他的回憶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錄中，他寫道，軍隊‘鼓勵反共的平民協助工作’，並談到了培訓右翼團體，送他們去殺害共產黨人。軍隊利用民間團體和間接的命令，他們知道，蘇加諾仍然支持印尼共產黨，許多人仍然同情支持這一聯盟。未遂政變和第一波殺人潮之間的時間，被軍方用於採取行政措施，以削弱共產黨各幫派的組織結構，擴大軍隊對媒體的影響和傳播反印尼共產黨的宣傳。只有在這之後，屠殺才開始了。例如，在巴厘島‘攜帶死亡名單的部隊的抵達’擔任了‘推動屠殺的關鍵作用’。

殺人高潮發生在1965年12月，未遂政變後的兩個月，然後規模不斷減少，直到1966年3月。到底有多少人死亡仍是一個未知數：保守估計最低在500,000；其他估計總數為一百萬甚至二百萬。

大規模屠殺的計劃性系統性並不意味著沒有其他或多或少自發的作用在其中。一些華人受害，因為他們被視為外國人，或者像在其他東南亞國家，受到貿易剝削的牽連。狂熱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攻擊作為‘神的敵人’的印尼共產黨的支持者。但是，這些宗教和種族衝突是政治清洗的副作用。大規模屠殺是由軍隊對政治對手發動的攻擊 --- 在印尼共產黨人已經不受法律保護的情況下，其他的攻擊動力就肆無忌憚了。一致的看法是，並無太多證據證明許多人被殺害於搶劫或私人恩怨：絕大多數殺手的殺人動機確實是殺‘共產黨員’。

然而，大規模的殺戮提出了一個‘政治整肅’理論的問題。在其他國家，如果一個軍事獨裁政權上臺粉碎強大的左翼運動，被殺死的人數則遠遠小得多。皮諾切特的獨裁統治期間，數千人被殺死，由阿根廷軍政府造成被害者高達30,000 --- 但即使考慮到印尼的大尺寸，這還是有一個50萬到100萬的質的區別。為了解釋屠殺的規模，必須要把清除放入考慮。左翼運動越深入，用於粉碎它的暴力就越激烈。印尼從未見過那種困擾如此多的拉美軍政府的抵抗，而且左派也不能在類似於拉丁美洲的規模上恢復。從這個角度來看，蘇哈托和他的同伴只是比拉美獨裁更有效率。

受害者數位越大，肇事者的數字必會越高。考

慮到殺戮發生的時間較短，並且許多人是被原始的武器和工具殺死的，那麼肇事者數目必須很高 --- 安德森估計它必須數以萬計。所有這些人的動機是什麼？他們不可能全部直接由部隊組織，一定有一個與‘幕後’動機有關的重要因素。

外國列強的作用

破壞‘共產主義陣營’以外的最大的共產黨是西方政界積極歡迎的。美國國務院負責印尼情報的職員霍華德·費德斯佩爾回顧大屠殺時，指出‘只要他們是共產黨人，就沒有人關心他們是被屠殺。’事實上，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鼓勵創造導致暴力衝突的條件。這種干預也不是新事。茉莉芬事件後，蘇加諾本人幾乎粉碎印尼共產黨，這個事實是美國第一個支持他反對荷蘭的重要原因。當蘇加諾做得越來越激進時，他們轉而反對他。

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和林登·詹森首先實施了經濟、技術和軍事援助，以鼓勵軍隊在印尼的經濟和政治生活中，作為反對印尼共產黨的力量，發揮更大的作用。在1964年中期，美國更進一步，積極嘗試挑起軍隊和印尼共產黨之間的衝突。美國官員意識到蘇加諾不會放下與印尼共產黨的聯盟，他的聲望弄得像軍事政變這樣的直接行動非常危險。但一個類似親印尼共產黨的失敗政變，這樣的事件將是完滿的藉口。美國人並不是試圖挑起印尼危機的唯一者：甚至更早，英國已採取政策，要在可能的情況下，挑起一場‘導致長期內戰或無政府狀態的權力鬥爭’。

儘管如此，1965年底發生的事件讓西方情報機構感到驚訝。並不能真正證明這樣的說法，即整個九·三零運動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蘇哈托設置的一個陷阱。但是，像美國助理國務卿喬治·鮑爾這樣的人立即意識到‘如果陸軍動起來，他們有實力用印尼共產黨擦拭地球，如果他們不動，他們可能就不會有另一個機會了。’在這一點上，西方各國政府最擔心的是，軍隊會動得不夠快，如果它動起來，它可能不會消滅印尼共產黨的社會基礎，留下左派死灰復燃的可能性。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都

為軍隊反印尼共產黨的宣傳運動迅速提供服務。當軍隊確實著手大規模屠殺運動這一點已經明確時，美國大使館開始討論向蘇哈托和他的同夥提供物資援助。當可怕的報告蜂擁而入時，他們仍然擔心殺的人不夠。在印尼以外，西方對大屠殺的官方反應主要是沉默。一個有限，但有政治意義的援助流，包括提供小型武器和現金給軍官們，給了將軍們一個信號，他們可以依靠西方的支援。美國官員提供了確定數千名印尼共產黨領導幹部的名單給印尼軍隊，後者使用它們追查印尼共產黨成員，把他們逮捕和殺害。由於印尼共產黨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衝突中，已越來越傾向於中國，蘇聯知會將軍們‘如果要在印尼共產黨和非印尼共產黨之間作選擇，蘇聯將選擇後者’。對於西方強權，摧毀印尼共產黨，對於確保該國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一體化是必要的。而且他們也成功了：在蘇哈托時期，印尼忠實地遵循西方批准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改寫歷史

在評價1965年大屠殺和制訂替代新秩序的話語權上，諸多問題之一是這個話語權本身就是矛盾的。當然，這個政權可以不承認它是一個大規模流血的产品。同時，它在關心地提醒大家，如果想成立任何一種反對黨，它是什麼都作的出來的。該事件的官方版本是簡單的：九·三零運動是印尼共產黨計畫讓自己抓住所有權力和建立獨裁政權的前沿行動。軍方稱，由於迅速採取行動，它已經‘挽救了國家’。這種歷史的解釋一次又一次地重複在教科書，紀念碑中，顯示在每年紀念將軍死亡的電影中。1965年的官方和半官方記錄，如‘印尼民族史’和所謂的1965年‘白皮書’，無視九·三零運動暴力之後的殺戮行為。官方歷史上最偉大的名字是努格羅霍·諾托蘇散托，八十年代以前他是陸軍歷史中心（Pusat Sejarah Abri）的主任，然後成為教育和文化部部長。他編輯的‘印尼民族史’的學校課本，是如此地反智識常理，其反共立場是如此明顯，以至於它們刺激得印尼學生對任何歷史都

不相信。對於該政權，冷漠和玩世不恭 --- 而不是熱情地認可其歷史觀--- 很可能就足夠了。

官方的歷史把軍隊置於同印尼民族敵人鬥爭的悠久傳統的中心。荷蘭殖民主義當然是其中之一，但‘共產主義’變成了另一個。茉莉芬事件被描述為對反荷蘭殖民者鬥爭的背叛，當然，九·三零運動被描繪成是另一個‘叛國’的例子。印尼共產黨和其他左翼團體在印尼獨立運動中的重要作用被埋葬了。

這並不意味著對1965年大規模屠殺的記憶被抹殺了。相反，關於屠殺的記憶落入了謠言的領域。其結果是該政權不承認大屠殺的責任，卻可受惠於活生生的恐懼。折磨人的流血故事流傳在沒有發生過殺戮的地方，增加更多的混亂。

一個國家紀念碑，被稱為盧邦·布阿亞或鱷魚坑，建立在棄置將軍屍體的現場，以紀念那些將軍。它有6個單獨的雕像。指揮官亞尼，站在中間，用手指著坑，仿佛提醒觀眾發生了什麼。大型嘉魯達神話鳥，用作印尼民族的象徵，盤旋在軍官們頭上，把將軍們同全國連接起來。一個青銅橫幅講述了綁架，謀殺和軍隊崇高作用的官方版本。干預前，有混亂，謀殺 --- 然後秩序恢復：國家是和平的，由軍隊保護，發展，婦女再次是賢慧的母親。在附近的一個博物館，西洋鏡重複官方的故事，包括可怕的酷刑。像亞尼的汽車，綁匪所使用的一輛卡車這樣一些遺物，被用來強調現場的真實性質。

對於新次序，1965年不僅僅是它誕生的時刻：當它必須處理反對派時，就調用‘共產主義威脅’做它鎮壓的理由，並作為新次序連續性的論據。奇怪的是，這意味著這個最反共的政權不可能宣佈對其痛恨的敵人的最後勝利。印尼成為這樣一個國家，在那裏共產主義的幽靈不會離開，甚至九十年代初蘇聯集團在全球崩潰後也不會離開。這種威脅必須被一次又一次的調用。1965年後，印尼共產黨被打跨驅散 --- 隨著領導層消失和蘇加諾的倒臺，它的成員和支持者失去了政治指南針。蘇加諾統治突然垮臺，讓整個印尼共產黨的做法遭貶。印尼共產黨是一個為了在印尼政府規定的限制內做

鼓動建立的組織，對於任何一種地下抵抗，印尼共產黨毫無準備。雖然在新秩序期間，一些地下活動繼續進行，組織任何形式抵抗的嘗試則非常少而虛弱 --- 1965年以後，軍隊反對共產黨的行動不是平定叛亂，而是追捕失敗運動的倖存者。

誇大印尼共產黨的能力，總是同一個現在確實已成為幽靈的共產主義威脅鬥爭，這樣做仍然合乎軍隊的利益。共產黨敵人是什麼樣子，是由軍隊決定的。這有可能使他們指責最不喜歡的候選人是‘共產黨人’ --- 這不啻是一個死亡威脅。由共產主義集中體現的，對‘國家安全’的持續威脅，在軍隊一個‘雙重職能 (dwifungsi)’的教條中，在政治和國家安全兩方面，發揮有重大作用。不停的強調國家安全的持續威脅，在1978年軍方開辦的國防研究所 (Lembaga Pertahanan Nasional-Lemhannas) 上正式成形。這個‘軍事教育研究所’設立了一個項目，名為全國警戒進修班 (Penataran Kewaspadaan Nasional-Tarpadnas)，目的是對官員和平民做有關國家安全威脅的教誡。

‘進修課程’部分地是對蘇哈托政權的一個學生抗議活動的反應。來自1979年的一個課程檔表示，一個‘新左派’已踏著印尼共產黨的腳步，在組織共產黨活動，現正在動員學生和知識份子。據國防研究所說，1965年以後的印尼共產黨已形成了‘無形的組織’ (organisasi tak terbentuk)，由試圖滲透到合法機構的‘細胞’組成。

蘇哈托政權展開了印尼社會深刻的社會政治重塑。政治體制，變成了一種三角形，從業集團黨 (Golkar) --- 執政黨，1964年由軍方創立，用作反共產主義團體的保護傘 --- 牢固地處在頂部。下面是僅有的其他兩個合法政黨，所有其他的黨派都被迫與這兩者合併：一個是‘伊斯蘭的’，另一個是‘世俗的’。即使在蘇加諾的‘指導性民主’日益專橫的統治期間，政治辯論也已經相對自由，印度尼西亞社會也越來越經常地看到群眾政治動員。蘇哈托政權希望的是完全相反的東西。新秩序的政治設計師，阿裏·穆托坡將軍在他的書‘加速現代化發展的25年’中，概述其原則。對於蘇加諾年代，他

形容寫道，‘人民群眾，特別是那些在鄉村的人，總是政黨政治和意識形態利益的犧牲品’，這些政黨帶領人民‘忽略日常生活用品，忽略發展和改善自己物質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相反，新秩序將遵循‘非政治化’的原則，把‘受政治操縱的人解放出來’，這樣人民就會‘全心全意努力發展’。

這總結了新次序意識形態的鮮明特性：以深深的精英主義態度對待下層階級而且迷信‘發展’。在村莊的人民中，蘇加諾和印尼共產黨的支持者最多，在將軍們看來，他們落後，缺乏發展。他們不應捲入政治，而應努力‘發展’國家。家長式的精英主義會提醒人們激烈的政治兩極化的危險，提醒‘人們瘋狂時’會發生什麼事，以使其把最大群人口拒之政治活動門外的做法合理化。

這些想法並非憑空掉下來的：像將軍們那樣有教養的城裏人對農村人的偏見，並不是新的。而且，也沒有人抱怨政治混亂：蘇加諾本人曾為在‘指導性民主’的說法下對民主的限制作辯解，說政治分歧正在席捲全國。軍隊的民族主義論調，即直接把敵人置於民族之外，也是老調。印尼共產黨已經淡化了印尼內部階級鬥爭的重要性，因為這樣的政策同蘇加諾強調的國家統一有矛盾。

蘇哈托把自己命名為‘發展之父’：對於那些從中獲利者，經濟發展往往是充足的理由，讓人接受軍人對政治權力的壟斷，接受蘇哈托對權力和特權的大肆濫用。即使是曾支持蘇哈托政變的伊斯蘭團體也被繳械，離開了政治。從1975年新秩序政權最後形式篤定，到1998年它垮臺的幾十年間，主導的話語，是一個不斷上升的普遍繁榮，為了這個繁榮，理應接受軍隊對國家的控制並抑制異議等行為。在蘇哈托統治期間，估計有超過2000本書遭取締，它們的大多數與‘1965’有關。印尼民族主義，從蘇加諾的‘反帝國主義’的，第三世界多樣性的民族主義，轉變成一個注重全國合作發展的民族主義。

一個新的故事？

1998年蘇哈托的垮臺和印尼民主化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Reformasi’）的嘗試，極為有助於印尼人給‘1965’另一種解釋的能力。但是，在歷史的撰寫中，要給印尼左派任何一種‘平反昭雪’，仍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雖然那個政權本身垮臺數年，新秩序的許多支持者仍然在掌權。經過30多年的不斷重複，新秩序版本的歷史已經根深蒂固。一代又一代的精英由‘新秩序即-社會秩序’孵育出來。雖然蘇哈托是新秩序政權的無可爭辯的領袖，但他由一個利益聯盟支持著。蘇哈托本人倒臺，民主正式得以恢復後，這些人只是將自己重塑成‘改革者’和‘民主派’。前新秩序的支持者通過運用更多時尚的修辭，主導著印尼的‘民主’的機制。

1999年10月20日至2001年7月23日，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21個月的總統任期，這個例子很有啟發性。雖然他是伊斯蘭教士聯合會（Nahdlatul Ulama）的主席，但瓦希德本人是一個進步的自由主義者，是第一個為那些殺戮道歉的全國性政治人物，不過伊斯蘭教士聯合會是一個穆斯林宗教組織，其青年支派Anser在1965的殺戮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改革印尼國家的試圖，不斷受挫於新秩序的餘孽。他試圖正式解除1966年建立的對共產主義的禁令，這成了他最具爭議的行動之一：它遭到了敵意和失敗。軍事和政治對手之間的一個聯盟剝奪了他的權力。

不願面對過去，不僅是數十年長期灌輸的結果。許多普通的人是1965年大屠殺的參與者。對65年的任何重新檢查，將引生焦慮甚至罪惡感。還有恐懼：就是新秩序的宣傳，說存活下來的共產黨或他們的子孫有一天會報仇。

於是，正統民族主義的歷史學派在後改革時代仍然占主導地位。‘國家歷史’的作家，拒絕面對1998年以後自由得多的媒體所作的揭示。在1999年年底，教育部發出的教師指南，以應付‘官方’歷史和‘媒體’記錄之間的差別。該指南是由諾托蘇散托的一個前門生編纂的。它的理由是，‘不確定性’將導致‘民族團結的消極後果’。

如果有一個團體有興趣於歷史的重寫，那就是受害者和追逐他們足跡的左派。應該牢記的是，新

秩序政權的垮臺是社會動盪和亞洲經濟危機特別尖銳的表現相結合的結果。就其本身而言，零散的反對運動不會有力量向蘇哈托提出一個真正的挑戰。改革期間，左翼領導力量是人民民主黨（PRD），它的活動成員從來沒有超過幾百人。儘管如此，它仍經常作為印尼共產黨的新化身而遭受襲擊。即使在蘇哈托倒臺後，人民民主黨（PRD）領導人也被逮捕和受酷刑。回溯革命社會主義領袖陳麻六甲幾乎傳奇的人生，印尼畢竟知道印尼左翼歷史作品的一個傳統。但印尼的左翼運動脆弱，迄今未能真正挑戰新秩序的正統性。然而，改革開啓的空間，允許幾十本有關1965年的書出現，其中許多書批判新秩序的觀點。對新秩序歷史的批評和恢復印尼左派的嘗試，不只是局限于書本，還包括期刊，展覽和紀錄文獻。

在這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小說家普拉莫底亞·阿南達·托爾。1965年前他已經是重要作家，他因為是共產黨的人民文化研究所（Lekra）的成員而被捕，在他14年的監禁期間，仍艱苦卓絕地寫作。他的作品大部分是有關歷史的，顯示‘老百姓’創造歷史的作用 --- 直接同新秩序的精英主義相矛盾。從監獄釋放後，普拉莫底亞連同另外兩名前政治犯，創建了米特拉出版社。前政治犯在印尼仍是賤民：他們的護照載明前囚犯的身份，他們被要求定期向警方報告。儘管如此，普拉莫底亞，哈斯伊姆·拉赫曼和約瑟夫·埃薩克，都是‘蘇加諾主義’的左翼，無視禁止出版前政治犯作品的禁令，出版物中就有普拉莫底亞的小說。米特拉的出版物在創造正統說法的替代品上，發揮重要作用。

倖存的印尼共產黨成員和支持者書寫的自傳表明，即使在新秩序的影響力強大時，另一種不同說法仍然還存在著 --- 雖然只是一點點。但這種記憶有其自身的問題。其中許多記憶，是在事件發生幾年甚至幾十年後寫的。因此，它們可能會更多地反映人們對隨後改革（Reformasi）的感覺，而不是他們如何經歷1965年及其創傷的。而政治並不局限於國家和國家認可的歷史宏觀水準。這些文章是對新秩序話語權的挑戰，但處在一個印尼共產黨被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妖魔化和反共產主義思潮很強烈的環境中。這使得他們的作家採取防守姿態，避免例如1965年之前印尼共產黨及其夥伴參與鎮壓和恐嚇政治對手的情況。印尼共產黨的活動，首要的是合法的，而且是支持合法總統蘇加諾的。

這個防禦姿態掩蓋了印尼的矛盾，而這些矛盾能夠解釋‘1965’。挽回印尼共產黨的願望也導致了否認共產黨參與了或支持過九·三零運動的任何可能性。取而代之的說法把蘇哈托描寫為邪惡的主謀，陰謀策劃了整個事件過程。就像新秩序編織的故事那樣，這是一個政治上有用的神話 --- 但它也弄混了在這些悲慘的日子裏發生的事。

1999年，記者策劃一個展覽，叫做‘日惹索羅攝影記者的三個秩序展’，是由記者和學生活動分子舉辦的。三個秩序，指的是蘇加諾的舊秩序，蘇哈托的新秩序和改革時代。最令人注意的一張圖片是殺戮開始前不久拍攝的。它描述了在日惹的一個印尼共產黨集會上的一群年輕人。舞臺不可見，只看到一群聽眾。他們看去輕鬆，甚至快樂。在照片的中心，一個年輕女子看著鏡頭：她在微笑，似乎充滿生機。正如一位作家對畫面所描述的：‘這張照片中，沒有什麼險惡的東西，沒有什麼符合新秩序政權持續描繪的共產黨邪惡形象。’

對圖片的反應是後改革次序時代對1965年態度的快照。參觀者對圖片中的人們感到同情 --- ‘邪惡共產黨’再次成為人類了。但是，這同情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否認遇難者的部分身份：所描繪的理想主義青年應該是‘並不真正知道’印尼共產黨的計畫，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們想法的禁忌如此強烈，以至於無法調和他們是‘就像我們’一樣的人，又是共產黨人的想法。承認1965年受害者的人性無疑是重要的第一步。但是記住人的悲劇，並沒有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對於印尼社會，要從心底接受它的過去，接受受害人的政治信念，對於他們的生和死是重要的，也需要得到承認。

■ 亞曆克斯·德容是第四國際荷蘭支部，社會主義替代政治（SAP）黨的領導人。

國立第六中學第四分校

林東

四川羅江是個美麗安靜的小城，座落在紋江河畔。六中四分校借用城內的文武廟，山陝會館、城隍廟和三聖殿做校舍和學生宿舍，老師到民家租賃住房。

六中四分校從入川後的一九三九年三月開學上課到一九四二年二月，被國民政府教育部以“赤化”為藉口撤辦並取消，共存在三年。一九三九年、一九四〇年兩年，我在六中四分校讀完初中二和初中三，初中畢業後，於一九四一年初離開羅江。

略記幾位對六中四分校影響大而難以忘懷的師長。



白天就成了讀書的課堂。他說：“知識是光，無知是暗”。他把五四時代北京大學的民主、自由精神灑落到我們的心田裏，他反對填鴨式的呆板教學方法，他主張自由學習，自由研究，自由閱讀。他教我們自治，一切實行民主，在他的倡導下，六中四分校成了一個自治、民主、自由的園地。受到六中守舊勢力的嫉恨，於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以“縱容左翼師生”罪名，被調到國民黨中央訓練團接受審查。經六中四分校師生向教育部抗議交涉，孫校長終於十二月一日平安回校。他講述在重慶所受困苦，聲淚俱下，莫須有三字害人以至於此，可謂毒辣之至。四分校全校師生開歡迎大會，特定名為“孫校長受訓畢業返校歡迎大會”。大會開得隆重而熱烈，在最後的餘興節目中，李廣田老師即興作歌，歌詞唱出了我們學生的心音：

第四分校 一二一
永遠前進 一二一
一個步伐 一二一
一個意志 一二一
向著自由 一二一
向著光明 一二一
前進前進 一二一

孫東生

北京大學畢業後，任山東省立濟南第一初級中學（簡稱濟南一中）校長。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為了抗日救國，不做亡國奴，他毅然拋下妻兒，率先領導濟南一中二百多師生離開山東，歷時一年多，步行五千里長途跋涉，於一九三九年初到達抗戰大後方的四川羅江。他用“走萬里路，讀萬卷書”的豪情激勵我們堅持讀書學習，他吟詠陸遊的詩句鼓舞我們奮發圖強。一路上，幾次停頓下來，借住大殿或廟宇，地鋪睡覺，

歌詞中的“一二一”寓意是一九三八年在湖北鄖陽時，濟南一中師生遭到一股守舊黑暗勢力的圍攻和毆打，為避免衝突擴大，孫校長被迫帶領濟中二百多師生於十二月一日離開了那個險惡的環境，先行入川。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孫校長遭受審查磨難後勝利返校，才又有今日一會，十二月一日成為六中四分之紀念日，“一二一”又是前進的口令。

孫校長也曾賦詩抒發情懷：

會，十二月一日成爲六中四分之紀念日，“一二一”又是前進的口令。

孫校長也曾賦詩抒發情懷：

十二月深夜裏別了泰山，
十二月深夜裏又渡過了漢江。
我們三百人一個微笑——
對著，
凶險的波濤，
無情的風霜。
十二月深夜裏逃出了泰安，
十二月深夜裏離開了鄖陽。
我們五千里一個步伐——
跋涉，
在黑暗裏掙扎，
向著自由，
向著光。

“別了泰山”，“逃出了泰安”，說的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機大舉狂轟濫炸泰安城，我們飽受殘酷的戰爭洗禮，當天晚上，孫校長率領我們倉促逃出了泰山腳下那座還在炸彈硝煙中燃燒的泰安城，走上了抗日救國、求生存、求索自由和光的途程。

一九四〇年四月，國民政府教育部硬是撤銷了他的六中四分校校長職務，委派他做中學教育督導員，企圖把他與四分校的師生剝離開來。他不屑於接受這一指派，一九四一年初他去成都四川大學教書。

他愛誦愛國詩人陸遊的詩句，他的一生也正是：“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他信守五四精神的一生，先在國民黨的政治體制下，後在共產黨的體制下，都不討好。

李廣田

一九二八年在濟南師範讀書，被軍閥張宗昌的特務隊逮捕，遭受苦刑月餘，國民革命北伐軍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打到濟南才獲釋。一九二九年考入北京大學外文系，與同系的卞之琳和不同系的何其芳結識，三人成爲文友，秉承五四文學革命精神，創新風格，寫詩寫散文，都成了現代知名的文學家。

一九三五年大學畢業，到濟南一中教國文課。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濟南危機的時候隨濟南一中遷移到泰安，十二月二十四日，正是冰天雪地的時候，在敵機狂炸中又離開了泰安，輾轉南下，由河南而入湖北，在漢江左岸的鄖陽住過半年，又同濟中二百多師生徒步入川，在羅江六中四分校仍教國文課。他又先後引薦著名作家陳翔鶴和四川詩人方敬到四分校教國文課，一個近三百學生的初級中學，竟聚集了三位思想進步的著名文學家教語文課。

李老師選編中國的和外國的文學名著以及反映抗日戰爭的好文學作品作教材，因經費限制，不可能把他編選的教材印成講義，他就在課堂以讀代授，讓我們靜心聽講。凡詩歌、戲劇、散文、小說等，均可在課堂上生動地朗讀，使我們對作品更深刻的感受和理解。

他全文朗讀魯迅的《阿Q正傳》、《狂人日記》、《祥林嫂》等，引導我們認識魯迅精神，要像魯迅那樣地，到黑暗中去，去發掘更多的黑暗，去與黑暗作大的鬥爭！或者到光明處去，去學習戰鬥的方法，預備和黑暗作更大的鬥爭！他引用杜甫的詩句：“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後說：“屈原《離騷》，魯迅全集是我們文學之江河。”

他講解高爾基的作品，介紹我們閱讀《母親》、《我的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等。他在課堂上朗讀瞿秋白翻譯的《海燕》，最後他激情地提高朗誦的聲調：“讓暴風雨來得更厲害吧！”他指出海燕、鴨、鵝、企鵝等是形象地表現了在社會革命風暴中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群相。李老師鼓勵我們要像高爾基那樣地在生活中勤奮學習，深入社會，瞭解社會，參加一切實際生活，充實自己。

他對舊俄時期作家的作品作了介紹講解，他

用了三個多星期的課堂時間，全文朗讀了魯迅翻譯的果戈理《死魂靈》和《塔拉斯布爾巴》的片斷，果戈理對世事人情的洞察入微的描繪，使我感受到什麼才是藝術。那時期我讀了屠格涅夫的《羅亭》、《父與子》、《處女地》、《前夜》、《門檻》等，讀了托爾斯泰的《復活》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污辱與被損害的》和《窮人》等。

他朗讀講授俄國十月革命後蘇聯作家的作品，如《第四十一》、《不走正路的安德倫》、《鐵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夏伯陽》、《被開墾的處女地》等，使我們瞭解俄國十月革命和革命者為理想和信念而勇於獻身的崇高精神。那時我正處於叛逆性的年段，安德倫的行為在我心理上引起共鳴。李老師講解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時，他指出：在這書裏刻畫出一個在革命中成長，被革命的現實生活鍛煉成鋼一般堅強的青年戰士的形象，而這就是作者自己。

他把十九世紀法國、英國等國的著名文學家的作品介紹給我們，他認為閱讀著名作家的小說，可以間接獲得對社會生活的理解，可以擴大對人生的視野。他說巴爾札克的《人間喜劇》系列小說，是用藝術的畫筆描繪了資本主義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社會生活畫面，就像馬克思用理性的手術刀解剖了資本主義社會。那時我正讀過《共產黨宣言》，因此，我很有興致地閱讀了《高老頭》、《歐也妮·葛朗黨》等幾部巴爾札克的小說。

他從《全民抗戰》、《抗戰文藝》、《文藝陣地》、《七月》等文藝刊物上選好的作品朗讀講解，如張天翼的《華威先生》，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秸》，艾青的《他死在第二次》，高藍的《哭泣女莎菲》，天藍的《隊長騎馬去了》，還有柯仲平的詩等。

他主持編校刊式的文藝刊物《鍛冶廠》（一九三九年六月到一九四〇年七月共出過十期，不容於國民黨統治當局而被迫停刊——國民政府教育部多次派員到六中四分校檢查思想，提出“思

想之糾正”）。刊名是李老師起的，借用俄國十月革命初期蘇聯一文學團體的名稱，李老師希望我們青年人在艱苦抗戰的時代，經受住鍛煉，都能鍛冶成有用的鋼材。

他還主持編輯《在風沙中前進》，收錄了十七位同學的三十篇作品，共計十多萬字，是從山東到四川五千里路途上所見所聞的實錄，青少年特有的敏感和正義感，對看不慣的種種社會醜惡腐敗黑暗現象，毫不留情地揭發，大加口誅筆伐，因之找不到敢於出版的出版商。

他每天還要抽出很多額外的時間，甚至直到深夜，閱讀和批改愛好文學的學生們的課外習作稿，化盡心血，像農民精心耕耘自己的土地那樣，勤奮地澆灌文學幼苗的成長。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浪潮，國共合作的政治形勢惡化，受此影響，六中校本部的三青團製造事端，迫害思想進步的師生。四月，李廣田老師被迫離開了四分校，先是去西南聯大敘永分校教書，後去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任教。抗日戰爭結束後，一九四六年秋隨校復員，先在天津南開大學執教，後到北平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授。一九四八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新中國成立後，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一九五二年調任昆明雲南大學校長。有種說法，這職務是毛澤東指定的，一九五六年當選為中國共產黨“八大”後補代表，列席“八大”。文革時期，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受迫害慘死。一九七八年平反昭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先後出版了《李廣田散文選》、《李廣田文學評論選》、二集《李廣田散文》（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名人文庫叢書）等。

方敬

在當時的報刊上，早已看到他的詩作，知道他是位著名的四川詩人。經李廣田老師的邀約，一九三九年八月五日到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在六中四分校工作了十個月，教初中一年級兩班的國文課。

一到校就寫首詩《一個贊禮》作為見面禮。

詩的首節和末節抄如下：

親愛的弟妹們，
你們年紀輕輕的
就遇見黃海掀起
狂濤怒浪無情的卷打
你們的鄉裏，
於是你們只得離去
那文化燦爛的土地，
出產萍果桃李的土地，
有著古樸民性的土地，
染著“五三”的血的土地。

親愛的弟妹們，
你們終於輾轉來到了這大後方，
來到偏僻但很溫暖的土地，
有著手足之情的土地，
文化的新壟的土地，
建立一個鍛冶廠。
讓理論與實踐配合著，
讓每門功課開著花，
讓大眾壁報開著花，
讓各種集會開著花，
讓話劇公演開著花。
在真理的熔爐裏，
鍛煉著鋼的鏈索，
鍛煉著民族的命運，
而它美麗的未來
閃爍在你們工作時的微笑裡，
休息時的歌聲裡。

看上去，方老師的年齡比李老師小，像剛出校門的大學生。他愛說：“我不是來教你們的，我是來向你們學習的，向你們的生活學習。我將從你們那兒得到的一定多於你們從我這裡學到的。”我們貼滿牆上的壁報，他都一一細看，參加我們的各種集會——專題討論會、生活檢討會、詩歌朗誦晚會等。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一九三九年底我就聽說劉守身、張繼乾是共產黨，我不知道，也不會想到，方敬老師是他們的入黨介紹人。事隔半個世紀後，一九九〇年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德陽市中區黨史資料》書上，有方敬老師於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在德陽市中區委黨史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他說：“我到羅江四分校時，黨組織對我是這樣說的：‘抗戰了，要大量地做青年工作和統戰工作，還要建黨，發展幾個黨員，播下種子。羅江地方雖小，但在西北、西南交通要道上，流亡出來的國立六中的群眾基礎好，四分校進步力量很大，校長也還民主。很重要，你去，去工作一年。’於是我就照這個指示在羅江工作了一年。”

方敬老師在六中四分校，實際活動了五個月就完成了建黨任務，吸收了三名學生入黨，組成一個黨小組。他們是：與我同年級的劉守身，比我低一學期的張繼乾，低兩學期的石仁厚。在同本《黨史資料》書上，載有劉守身於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在鄭州的訪談記錄，他說：“一九三九年八月底，中共成都市委派方敬同志來到四分校，他與李廣田老師熟悉，通過李廣田老師的介紹掌握了一批進步同學的情況，其中對我、張繼乾、石仁厚三人又作了近兩個月的考察，前後同我們談了三次話，最後一次他才公開了他們的身份，問我們想不想加入共產黨，我說：‘我們早就找黨了’，我們三人都寫了申請書，批准後，十一月份由方敬領導我們宣誓。”劉守身還說：“一九四〇年六月，中共成都市委調走了方敬，方敬走的時候對我們說：‘今後你們幾個在這裡堅持工作，上級黨會經常派人與你們聯系，既要大膽，又要注意隱蔽。’方敬走後由張繼乾和我交替著與上級組織派來的人定期接頭。”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方敬老師離開了六中四分校。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變”後，白色恐怖，政治形勢緊張，學校裡有捕人的傳聞，二名共產黨同學離開了學校。劉守身去了北方，張繼乾回到被日軍占領的山東老家，後被敵偽殺害。石仁厚是四川人，去成都轉校。

新中國建立後，方敬一直任西南師範學院院長。



陳翔鶴

由李廣田老師邀約引薦，於一九三九年四月到六中四分校教初中三年級一班的國文課。李老師告訴我們：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陳翔鶴在北平組建“沉鐘社”，魯迅說是：“中國最堅韌、最誠實，掙扎得最久的文學團體。”

到四分校之前，陳老師在成都幾所中學教國文課。據陳老師講：成都共有七十多所中學，無論是高中還是初中，幾乎都是以《古文觀止》、《經史百家雜抄》、《古文辭類纂》等為國文課教材，不准教白話文。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強迫青年人讀經復古，禁錮青年人的思想。

在四分校，陳老師看到學生們自由組織各種社團，出壁報，看到學生們的救亡歌詠隊和抗敵話劇團到街頭或下鄉宣傳活動，他高興地說：

“在這裡聽不到也看不見在成都中學校裡的那種‘之乎者也’，‘咿咿呀呀，天下太平，懿輿盛哉，主子萬年’的怪聲現象了。”

他協助李廣田編輯《在風沙中前進》的三十篇稿件，並寫了《序言》。

序言裡寫道：“在他們的流亡中，他們看見了沿途的破產荒涼的農村，胼手胝足，勞苦終日不得一飽的大眾，以及兵匪、煙毒、疫癘、貪官

污吏、土豪劣紳、苛捐雜稅，將國家弄得極端貧乏的每一個中國角落裡，都使得他們大大地睜開了眼睛。”“近一年來，他們每個人都幾乎從這裡而成長了起來，起初是敵人的炮火、飛機和炸彈，其次是他們在饑渴勞頓中所跨越過的魯、豫、鄂、陝等省區已行破產而且落後，一座座大小城鎮和農村。”“中國勞苦大眾的生活水準實在降落到悲慘得無可再悲慘的境地——這些都是從這些青年的忠實敘訴可以看得出來。”“雖然他們所描寫的幾乎全部屬於黑暗和悲慘方面，不過在本質上，他們卻仍舊那樣的結實而樂觀——不怕省破家亡，不怕挨凍受餓，勞頓疾苦，也不怕四周一切充滿陰暗的景象，跌倒了馬上就會起來，經過一宿之後，又會充滿元氣地向前行進，這種強健的精神，是只有在一般富有生命力的頑皮孩子的身上，才能以找尋得到的。而且，或許也即是我們的時代之所以快要成為一個真正‘新時代’的主要原因了。”他還寫道：“他們太年青了，關於中國社會的種種‘玩意’，和人世的一切都是何等的艱難的而且複雜，他們似乎還不懂得，所以有時，就連對於他們直接負責的人，也不免毫不客氣地要加以‘口誅筆伐’，略有微辭。自然，他們都是富於向上性的，因此才有如此的事事力求‘完美’的要求。”

面對眼前這群從抗敵烈火中成長起來的青年，陳老師在序言裡感喟自問：“他們的前途，將來又會變成怎樣的呢？”陳老師自己作答：

“從事實上看來，恐怕以後要使他們再行閉上眼睛，那一定是頗為困難的了。”

在序言的最後，陳老師寫道：“所以，在這裡，我即想‘借花獻佛’，將這本小書，謹獻給一般已經睜開了眼睛的一切人的眼前。”“而同時，我更不會忘記，想借本書的力量，聊當作一個耳光，來重重地打在一切冀借盲目‘復古’之力，打算將中國全體青年悶殺，以達到自己升官發財之道的豬狗們肥胖的臉上！”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三青團控制了六中四分校，

三月，陳老師被辭退，他在六中四分校工作了整整兩年。

新中國建立後，他在北京主編《文學遺產》，專門研究我國的古典文學。文革時期，遭迫害致死。

陳老師是五四時期民主思潮中睜開了眼睛的一代人，半個世紀後，卻因他終生渴求民主自由不再閉上的眼睛，受到反五四精神的造神、偶像崇拜惡浪的沖擊，而遭厄運。

一九七八年，平反昭雪。

閻子桂

在北平讀大學時參加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一九三六年回到濟南在私立齊光中學教書，一九三七年秋季開學轉到濟南一中教書。“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後，隨濟南一中流亡到四川。一路上給學生講解抗日戰爭的性質和形勢的變化，指出抗戰速勝論是盲目的樂觀主義，抗戰必敗論是盲目的悲觀主義，批判唯武器論，宣傳陳獨秀在《我對抗戰的意見》中的十項主張。

一九三九年三月到一九四〇年十月，他在六中四分校擔任公民課教員。他不用正中書局的公民課本，上課時帶著《大公報》、《新華日報》、《中央日報》，手裡拿著一支粉筆，在課堂上講解國際國內形勢。他指出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戰爭是爭取民族獨立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的抗戰是正義的，日本的侵略是反動的。一九三九年九月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性質是一樣的，仍然是帝國主義大國為爭奪世界控制權的不義戰爭。

他在課堂上公開講“僱傭勞動與資本”，揭示資本積累和資本家獲取利潤的秘密—剩餘價值。他講解“唯物辯證法與唯物史觀”，闡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在不斷地發展中前進，新社會將取代舊社會。

從湖北鄖陽到四川羅江的二年多的時間，直接或間接受閻老師思想影響的學生共約五十多人，他們成立了“真理讀書會”，他們讀馬克思、

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的書。在羅江，他們利用星期日，到城外的山林裡或紋江河岸的石灘上，聽閻子桂講解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和《中國革命問題》等，對於中國革命和中國抗日戰爭，他們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論觀點，認為以國民黨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不能完成反帝的民族解放任務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只有中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完成民族解放任務和民主革命任務，而無產階級專政又不可避免地侵犯資產階級所有制而提出社會主義革命要求，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一切經濟發展落後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存在著革命發展的不斷性(連續性)。

閻子桂鼓勵讀書會員到工廠去，到工人中間去，從事工人運動，求索和實踐中國革命的道路。在閻子桂和梁貽(他們都是抗日戰爭前參加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的一代托派)的策劃和安排下，一九三九年十月，“真理讀書會”員孟憲章、楊壽元、曹慶華、孫鴻智等十多名同學離開羅江去了重慶，他們是第一批走向工人的讀書會員，都進工廠當工人做工，只孫鴻智一個人退卻又回到學校讀書。一九四〇年夏，國立六中綿陽校本部(高中部)的三青团迫害進步老師和進步學生(在當時被通稱“左傾分子”或被疑為異黨分子)，讀書會員傅國良被捕，又有第二批“真理讀書會”員範文華、蘇學常、康至全、劉志超、陳汝林、任玉璽等十多人離開綿陽(讀高中的)和羅江(讀初中的)去了重慶，多數進工廠當工人，閻子桂也於一九四〇年暑假後秋季開學時離開羅江四分校去重慶。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變”發生後，國共兩黨關係交惡，政治形勢緊張，六中校本部和各分校都嚴禁學生讀課外書和進步報刊，監控和迫害思想進步的師生，一九四一年暑假又有第三批真理讀書會員離校去重慶，他們是在梓潼六中一分校讀高中的李雨亭、隗寬、王學誠、單松岑、王香臣、張洪仁、杜文林、蔣復學等十人，多數進工廠做工。

一九四一年十月和一九四二年二月，重慶托派組織遭受國民黨特務先後兩次破壞，逮捕了楊壽元、曹慶華、張洪仁、任玉璽、杜文林、趙鳳田等十人，組織領導人梁貽、王振華也先後被捕。

閻子桂和妻杜銳逃離重慶去西安避難，由大學時的同學白某人推薦到中央軍校王曲分校當經濟學教官。

一九四七年，閻子桂考取公費去美國留學，以後流落海外，不知所終。

瞿亞先

音樂老師。抗日戰爭前，“濟中”在濟南時，校園裡同時懸掛一面國旗和一面紫色的校旗。校歌是李廣田老師作詞，瞿亞先老師作曲的。歌詞：“我們是紫色的一群／我們是早晨的太陽／我們是迎日的朝雲／我們是永久的少年人／……／看佛山常碧／明湖常清／趵突水常噴／……／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我們的精神長存／”。為什麼把紫色定為校色，我沒有聽到任何解說，當時，我知道距“濟中”近的正誼中學的校旗是綠色的。

抗日戰爭爆發後，“濟中”被迫撤離濟南，開始流亡，李廣田老師和瞿亞先老師又合作了一首歌曲，歌詞：“咚咚咚咚／戰鼓／噠噠噠噠／軍號／全國同胞／時候到了／……／聽信號／聽信號／……／抗日的時候到了／抗日的時候到了／”。那時我們最愛唱的是“義勇軍進行曲”（即現在的國歌），是抗日戰爭前，田漢為一部電影作的插曲。這首歌的歌詞和曲調同法國“馬賽曲”相似，都表述了為獨立、為自由，戰敵必勝的決心。流亡到泰安，聽到平津大學生們唱那首感人淚下的“松花江上”，瞿老師領唱了一遍，我就會唱了。流亡到河南許昌，瞿老師教我們唱“大刀進行曲”，曲詞：“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全國武裝的弟兄們／抗戰的時候來到了／抗戰的時候來到了／前面有東北的義勇軍／後面有全國的老百姓／咱們中國軍隊勇敢前進／看準了敵人／殺一／大刀向／鬼子

們的頭上砍去／殺一／”。這首粗狂勇猛的歌曲，據說是駐防平津一帶的中國軍隊首先唱起來的。自從“九一八”事變，日本侵佔東北後，得寸進尺，又企圖侵佔華北，全國人民要求抗日救亡，南京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退讓，駐守華北的中國軍隊最受氣，經常遭受日本駐屯軍的挑釁，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盧溝橋駐軍吉星文團的士兵抗擊日軍侵略挑釁，“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大刀進行曲”中的兩聲喊“殺”，象徵性地釋放了積壓在中國人民心頭的憤怒，這首歌曲成了抗戰時期最流行的歌曲。我在這裡走筆多寫幾句：揭開了八年抗日戰爭序幕的吉星文團長，沒有捐軀抗日戰場，卻在一九五八年“炮擊金門”時，被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炮彈打死在金門島。

一九三八年春節過後，濟中流亡到河南南陽地區的餘旗鎮（今餘旗縣）住了四個月。瞿老師組織“濟中抗敵救亡工作團”，分歌詠組和話劇組，上街宣傳，喚醒民眾抗日救亡，演出了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當兵去”等，正是戰雲密布，保衛大武漢時，教我們唱黃自的一支抗戰歌曲，歌詞有：“旗正飄飄／馬正蕭蕭／好男兒／好男兒／報國／報國／在今朝／國亡家破／禍在眉梢／要生存／……”，高年級的好幾位同學，投筆從戎，去了武漢中央軍校。

徐州和鄭州先後失守後，流亡到河南各地區的山東學生，集中遷移到湖北的鄖陽，成立國立湖北中學，瞿老師把“濟中抗敵救亡工作團”改組為“狂飆劇團”，又增加排練了“荒漠笳聲”，“盲啞恨”，“淪亡之後”等十多幕話劇輪番演出，活躍了山城的抗戰氣氛。在鄖陽的半年裡，瞿老師教會我們許多新歌，其中我最喜歡唱的是“我們在太行山上”和兩支舊俄時期的歌曲：“工人歌”和“伏爾加河船夫曲”。

“在太行山上”的歌詞有：“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縱情歌唱／看吧／千山萬壑／銅壁鐵牆／抗日的烽火燃燒在太行山上／氣焰千萬丈／聽吧／母親呼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

場／我們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強馬又壯／……敵人從哪裡來／我們就打到哪裡去／敵人從哪裡進政／我們就叫它在哪裡滅亡／……。”一派民眾轟起抗戰的景象，令人神往。我在國民黨抗戰的後方看到的是保甲長抽拉壯丁現象，壯丁逃跑，抓回被槍斃。看不慣醜惡的社會現實，神往自由民主的新天地，在鄖陽時期，數學老師宓仁甫和濟中校長的兒子孫冠文及他的同學劉桂華、劉振羸、俞新民等多人去了延安。俞新民比我高一年級，我與他相識，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一本黨史資料上看到他的名字，是某高校的黨委書記。國共合作抗戰初期的一九三八年前後，社會政治生活尚活躍，有相當程度的自由氣氛。一九三九年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後，才又祭起了防共反共的法寶，以維護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制。

“工人歌”的歌詞：“生活像泥河一樣地流／機器吃我們的肉／煤煙塗黑我們的臉／火沴燒焦了我們的心窩／沴後引起心中煩愁／無處洩恨無奈何／常見父親打兒子／丈夫打老婆／全世界的工作兄弟／我們處處受痛苦／我們天天被人剝削／這是最大的恥辱／各地朋友拉起手來／團結聯合一條心／爲了光明的新社會／快把鬥爭來展開／”。在我們學生中，一些信仰了馬恩列托學說的同學，進工廠當工人，從事工人運動，用這支歌很快就與青年工人唱到一塊。

武漢失守後，我們的學校又奉教育部命，遷移到四川綿陽地區，成立國立第六中學。瞿亞先老師率領二十四人的“狂飆劇團”經陝南到四川，一路上每到達一個城鎮都演出三天，有傷兵醫院的地方，還要到醫院慰問演出。

一九三九年二月，到達四川綿陽地區的羅江縣，以“濟中”師生爲主體的國立六中四分校設在羅江，是六中的一個初中部。瞿老師在四分校仍任音樂教師。一九三九年上半年，他把一些喜歡唱歌又唱得好的同學集到一塊，利用星期日排練冼星海和光未然合作的“黃河大合唱”，在學校裡舉行過一次演唱會。女聲獨唱“黃河怨”的

是高我一年級的陳懿爲同學，他的長相和聲調都像女性，在“狂飆劇團”專門扮演女角色。當他唱到“……丈夫哇／在天邊／地下呀／再團圓／……”時，四十多歲的胡幹卿老師竟激動得哭倒了，瞿老師趕快跑來扶了胡老師離開演出場。兩天前，胡老師收到山東寄來的家信，他的老妻病逝。流亡在數千里之外，誰都有思鄉之情，何時才能與家人團聚？陳懿爲演唱得又是那麼進入角色，低沉的哀怨傾訴，“地下呀／再團圓／”，聽了，我心裡也感到很不好受。

瞿亞先老師除了教音樂，他還喜歡油畫，他不吸煙，不喝酒，他唯一的消遣是找人搓幾圈麻將牌。一九四〇年暑假，他主動辭職，學生們都不明白什麼原因，要求他不要走，他還是離開了，他去四川省立重慶中學教音樂課。

孟浪少年時，唱著瞿亞先老師教會的歌曲，走進了抗日戰爭的時代漩渦。如今已是垂垂暮年，低聲哼唱幾句那時會唱的歌詞，彷彿又回到了往事並非如煙的青少年時代。



Ai Weiwei should be immediately released unconditionally

Zhang Kai

On 3 April, Ai Weiwei, a human rights defender and a dissident artist, was arrested in Beijing airport. Until 20 May, through Xinhua News Agenc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stated that based on a primary investigation, Beijing Fake Cultural Development Limited, a company Ai controlled, evaded taxes and intentionally destroyed accounting documents. Hence, he was under house arrest (quoted from *Ming Po* dated 21 May).

These are false allegations and intentional punishment by the authorities.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Beijing Fake Cultural Development Limited is Lu Qing, Ai's wife. Hence, it should be Lu to be interrogated about tax evasion. Furthermore, although Ai has his own rights of meeting his spouse, his wife was allowed to visit him only 15 minutes on 15 May. Liu Xiaoyuan, Ai's attorney, pointed out that house arrest outside one's house is illegal. Ai could have his house arrest in his own legal living place. This is clearly written in the regulations of criminal cases. Liu also disclosed that Ai was restricted from fre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Furthermore, Liu refuted that legally speaking, if one goes to the taxation authority to settle tax evasion and to pay penalty fee, he is entitled to go home.

Under the rule of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there are numerous wrong cases. Ai is one of the victims. This has aroused sympathy from outside and inside China. In Europe, several sculpture exhibitions were held to reques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release Ai. The editorial of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dated 12 May, euphemistically supported him that "we cannot do it better, so we present 12 iron animals and porcelain melon seeds which symbolize your condensed life". Actually, '12 animals' and 'melon seeds' are among Ai's renowned sculptures. The editorial statement in the website was soon erased. The editor was assigned to another post.

Wheneve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violate the rights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publication, they claim that everything is based on the law. This discloses that the authoritative bureaucracy is beyond the law. Chinese people can indeed enjoy real democracy only if this bureaucracy is removed.

Postscript: On 22 June 2011, partly due to overseas and domestic pressure, the Chinese legal authorities released Ai on bail, who had been in detention on charges of tax evasion for 81 days. The state media claimed that he was willing to pay any back taxes and his attitude in confessing his crimes was good. In fact, Ai had suffered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so he was forced to confess. And, Ai is not the supposed criminal even thoug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declared that the investigation proved that Beijing Fake Cultural Development Limited evaded taxes and intentionally destroyed accounting documents.....2011.6.23

China Should Learn from Japan's Nuclear Disaster

Jun Xing

On 11 March, following an earthquake and tsunami, Fukushima Nuclear Power Plant exploded. The disaster is ranked the most serious level, i.e., the seventh level. The surrounding area within 30 kilometers is contaminated by nuclear radiation. It is not apt for human beings to live there in 20 years. Economic loss was estimated to be over USD 300 billion. This has become the most serious disaster in the history of Japan. Large volumes of radioactive water were poured into the sea and pollut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Tokyo Electricity Company optimistically estimated that nuclear leakage would stop at the end of 2011.

Previously, several serious nuclear disasters happened. For example, Three Mile Island accident of 1979 in Pennsylvania of the United States; Chernobyl disaster of 1986 in Ukraine, where steam explosion and meltdown led to the evacuation of 300,000 people and the dispersal of radioactive material across Europe; and in 1999, the disaster of Tokaimura uranium processing facility in Ibaraki Prefecture of Japan. According to Greenpeace, in the 57-year development history of nuclear power, 285 cases were classified no 2 or above in the scale of nuclear accident.

Particularly after the Chernobyl disaster, more and more people oppose nuclear development and demand shutting down nuclear power plants. In 1986,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clared to build a nuclear power plant near Daya Bay. 116 civil organizations joined together to form an alliance. They mobiliz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to sign a petition opposing the nuclear plant. Unfortunately, they failed to stop it. *October Review* of 1986 published several articles to declare its opposing position (see issues no 113-116, etc.).

The official experts openly guarantee the safety of nuclear energy, but it is not convincing. With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re are already 10 nuclear power plants. Daya Bay nuclear power plant, with a distance of 50 kilometers from Hong Kong, was found to have a radioactive leak in 2010. According to Wen Hongjun, former director of Economic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China Nuclear Dynamics Organization, there are two potential risks in the nuclear industry: one, too many nuclear plants and people do not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operation; second, the quality of nuclear facility is questionable.

十月評論 2011年第1期

After Japan's nuclear crisis, lots of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gone to demonstrations. For example, on 26 March, 100,000 people of Berlin demonstrated on the streets. On 30 May, German government declared to close all nuclear plants by 2022.

All Hong Kong people are close to several nuclear plan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Once a radioactive leak from any plant happens, no one can escape. Thus, Hong Kong people should come together to oppose nuclear energy and request Chinese government to stop the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plant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renewable energy such as hydropower, wind power and solar energy.

Nuclear Contamination and Water Crisis

Qing Yan

Nuclear power plants are throughout the whole of Japan. Starting from the 1970s, Japan has adopted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which led to an enormous demand of energy. In order to reduce its dependency on imported oil, Japan built a lot nuclear power plants along its coastal areas. Fukushima, where the nuclear power plant caused a radioactive leak, is the base of manufacturing electronic chips and automobiles. China, named as 'the world factory' and ranked a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ic entity surpassing Japan, should learn from Japan's tragedy.

On 16 March, Wen Jiabao, the Premier of the State Council, stress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xamine rigidly the existing nuclear power plants, evaluate the new proposal of nuclear projects, formulate the regulation of the safety of nuclear energy, and improve the middle and long term planning. Before the approval of safety, all nuclear projects have to be suspended. According to the new statistics by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there are 37 nuclear power plants in progress in Asia, among which China has 26, most of them being situated along the coastal areas.

According to Wu Libo, researcher of Energy Economy and Strategy Research Center of Fudan University, nuclear power is only 1.12% of energy consumption of China. In fact, most energy supply comes from thermal power. Over the past 30 years of implementing the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 China had speedily promoted market economy and consumerism which led to an increasing consumption of energy such as coal, crude oil, natural gas and hydropower.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China Automobile Industry Association, China has become the first largest automobile market because it has produced 13.791 million cars and it has purchased 13.6448 million cars at the end of 2009. Moreover, in 2007, in every 100 village families, there are 26.1 sets of refrigerators and 8.5 sets of air-conditioners. Meanwhile, in every 100 urban families, there are 95 sets of refrigerators and air-conditioners.

On the other hand, severe drought has plagued the middle and lower streams of Yangtze River, which aroused a series of crises such as shortages of grain, electricity and water. On 18 May, Wen Jiabao pointed out that the Three Gorges Dam has yet to solve problems such as migrants' stabilit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disaster precautions. It also affects the shipway, irrigation and water supply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streams of Yangtze River. The Working Plan of Post-Three Gorges Dam Project stated that the total investment for the follow-up is RMB 123.89 billion. However, some data show that the project has used an investment of RMB 184.9 billion at the end of 2009.

According to the Office of National Precautions of Flooding and Drought, up to mid May, the affected arable land was 98.12 million mu, mainly in provinces like Hubei, Gangsu, Jiangxi and Hunan.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drought was not merely natural disaster. It is because some rivers and lakes were illegally dredged which led to the degradation of water level. And there are many dams built along the main rivers of provinces like Jiangxi, Hubei and Hunan. Wang Jingquan, an inspector of the Office of Flooding and Drought Precautions of Yangtze Water Committee, mentioned that in March and April, the Three Gorges Dam was just mainly for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 Lot of water was used. This made the drought become worse and worse.

The Three Gorges Dam has become profit seeking through generating electricity. Moreover, Three Gorges of Yangtze Corporation and Yangtze Electricity Company set up Hubei Qingneng Property Group to make more profits through the speculation of property. They own 100% of shares of 6 real estate companies in Guangzhou, Hubei, Beijing and Zhuhai. In a word, Three Gorges of Yangtze Corporation has become a governmental enterprise which is largely involved in hydropower business and property speculation.

In conclusion, if human beings still ignore the problems caused by modernization and the extraction of resources, and worse still, market economy and consumerism has become the only choice, the next generations will definitely suffer.

Hong Kong

- | | | |
|---|--|------------|
| 2 | HKSAR government stirs up a spiral of violence..... | Zhong Ming |
| 4 | Enthusiastic mass participation in June-fourth Candle Night Vigil..... | Zhen Yan |
| 5 | Practise minimum wage policy and fight for labor rights..... | Zhen Yan |

China

- | | | |
|----|--|----------------|
| 6 | Ai Weiwei should be immediately released unconditionally..... | Zhang Kai |
| 7 | China should learn from Japan's nuclear disaster..... | Jun Xing |
| 8 | Nuclear contamination and water crisis..... | Qing Yan |
| 11 | Longing for June-fourth..... | Chan Chong Hai |
| 13 | The Chinese equation..... | Gilbert Achcar |
| 15 | China's rise amidst the crisis: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apitalist power..... | Jean Sanuk |

Historical Research

- 20 Fictitious legend of the Ming Dynasty still existing today.....Wu Xuanren

Special Issue: African Revolution

- | | | |
|----|--|--|
| 24 | In Tunisia and Egypt the revolutions are underway..... | Statement by
the Bureau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
| 27 | Tunisia, Egypt: a revolutionary process of world scope..... | Fourth International |
| 30 |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Report approved by the IC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 François Sabado |
| 36 | An overview of the January 25th revolution: “For Dignity, Democracy and Social
Justice”..... | Alaa Shukrallah |
| 39 | Egypt 2011: a historic revolutionary process..... | Chedid Khairy |

International

- | | | |
|----|--|-------------------------------------|
| 47 | Final declaration of the Assembly of the Social Movements..... | Assembly of the Social Movements |
| 49 | “The crisis is combining with the climate and food crises”..... | “Rouge” interview François Chesnais |
| 50 | The Oil-Food Price Shock..... | Michael T Klare |
| 52 | Who decides what we eat?..... | Esther Vivas |
| 53 | A retrospective look and solidarity news..... | Pierre Rousset |
| 55 | A systematic biography of Ernest Mandel..... | Michael Löwy |
| 58 | Feelings of revenge will not end with Osama’s death – The Left view from Pakistan..... | Farooq Tariq |
| 61 | The green banner of Mohamed and the expansion of world trade..... | Jean Batou |
| 67 | Russian religion and movement of Atheism..... | tran. Li Xing |
| 69 | Indonesia: Remembering mass-murder..... | Alex de Jong |

Memoires

- 77 The Fourth Branch of National No.6 Secondary School.....Lin Dong

Article in English

- | | | | | | | |
|----|---|--------|----|-------------|----------|-----------|
| 85 | Ai Weiwei | should | be | immediately | released | |
| | unconditionally..... | | | | | Zhang Kai |
| 85 | China should learn from Japan's nuclear disaster..... | | | | | Jun Xing |
| 86 | Nuclear contamination and water crisis..... | | | | | Qing Yan |

- 香港 2 特區政府一手催生的暴力漩渦.....仲明
4 六四燭光晚會 民眾熱烈參與.....振言
5 落實最低工資，續爭保障勞工權益.....振言
- 中國 6 立即無條件釋放艾未未和維權異議人士!.....張開
7 日本核災難對中國的警示.....軍行
8 核污染與水危機.....青岩
11 對陸月肆日的思念(來論).....陳中禧
13 中國的力量平衡.....吉伯特·阿恰
15 中國在危機中崛起——一個新資本主義強權的出現.....讓·散努克

歷史研究

- 20 烏有的“大明順天國”吃香到今(來論).....吳萱人

非洲革命特輯

- 24 突尼斯和埃及革命向前邁進.....第四國際書記局的聲明
27 突尼斯和埃及：世界規模的革命進程.....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會議通過
30 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贊同.....弗朗索瓦·薩巴多
36 突尼斯1月25日革命概述：“爭取尊嚴、民主和社會正義”.....阿拉·舒克若拉
39 埃及2011年：一個歷史性的革命進程.....舍蒂·凱瑞

- 國際 47 社會運動大會的最後聲明.....社會運動大會
49 “這場危機結合氣候和糧食危機”.....'紅色'雜誌採訪 弗朗索瓦·切斯奈斯
50 石油糧食價格的衝擊.....邁克爾·T·克雷爾
52 是誰決定我們吃甚麼？.....埃斯特·威瓦斯
53 往事回顧與團結新聞.....皮埃爾·魯塞
55 歐內斯特·曼德爾全傳.....邁克爾·洛伊
58 復仇的情緒不會因拉登的死亡而結束 --- 巴基斯坦左翼的觀點.....法魯克·塔里克
61 穆罕默德的綠色旗幟和世界貿易的擴張.....約翰·巴投
67 俄國的宗教與無神論運動.....李星譯
69 印尼：記住大屠殺.....亞歷克斯·德容

歷史回憶

- 77 國立第六中學第四分校.....林東

- 英譯 85 Ai Weiwei should be immediately released unconditionally.....Zhang Kai
85 China Should Learn from Japan's Nuclear Disaster.....Jun Xing
86 Nuclear Contamination and Water Crisis.....Qing Yan